

《记忆》九十六期 （2013 年增刊之二）

文艺创作专辑

目 录

编者的话：审美地写

【小说创作】

任国庆 扛刀的故事
 山乡的戏
 远山

【散文创作】

胡鹏池 林彪素描
 一个地主儿子的大学梦
 李楞子与外祖父——一个贫农鳏汉与一个地主老头的故事

【文坛往事】

山 月 父亲，人变鬼、鬼变回人的跌宕人生

【作家与作品】

姚蜀平 《悲情大地》作者简介
 《悲情大地》故事梗概
 《悲情大地》后记
 《悲情大地》节选

【评论】

陶东风 一部描写文革的百科全书式小说——读姚蜀平的《悲情大地》

何启治 《似水流年》——文革浩劫的悲歌（节选）

《悲情大地》读者评论摘选

【编读往来】

1. 《记忆》编辑部致歉
2. 小邓鹏照片及简历
3. 小邓鹏来信
4. 何志雄谈向前的博论

编者的话：审美地写

作为一个言说平台，《记忆》以前仅限于谈论历史，现在扩展到文学。文学虽然边缘化，但要自由言说，仍需要平台。

本期是《记忆》第一次为文学搭建的平台，它向大家介绍三位作者（任国庆、胡鹏池、姚蜀平）和他们的作品。这三人有三个共同点，第一，他们都不年轻（两位是40后、一位是50后）。第二，他们的职业都远离文科（一位是退休工程师，一位是科学史学者，一位是在职的计算机工程师）第三，他们都是业余写作。

此三人用自己的创作实绩打破了一个“神话”：上了年纪，搞不了创作。

事实上，年纪，对有志于文学的人来讲是财富。它代表着创作不可或缺的阅历和经验，它意味对人性的体悟，对事物的洞察。经历过新旧时期非常变化的人们，虽然不再年轻，但是，凭借着这些年轻人所没有的“资本”，这一代人很可能会成为改变“犬儒”文艺的潜在力量。

当然，要把潜力变成实绩，还需要补上两门课。一是手艺，二是心态。

手艺：谋篇布局的技巧，驾驭文字的能力。心态：写作态度、思想境界。

手艺好学，心态难得。

文学，有各种写法：批判地写、暴露地写、歌颂地写、犬儒地写、游戏地写……

一位大洋彼岸的朋友告诉我说，真正超迈的，是审美地写。我赞成这个说法。

审美地写，是自由的写。它不考虑禁区，不打听精神，不关心评委的口味，它甚至不在乎活着的时候能不能发表，因为它知道古代有一个“铁函心史”，知道古人说过的“藏诸名山，传之其人。”

审美地写，是真实的写。它拒绝“伪现实”，摒弃“新犬儒”。它回避黑白分明，放逐非善即恶。它主张冷静、客观且不动声色。

审美地写，是艺术的写。它要“言有尽而意无穷”，要“语不惊人死不休”。

审美地写，是无功利的写。它不关心“以文载道”，不关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双丰收”，它不以跻身“主旋律”为荣，也不以成为所谓“负能量”为耻。它在写作中观照世界，在写作中完成人生。

本期只是一个开始，“文学创作专辑”还将继续。

2013年4月6日

【小说创作】



任国庆

天津人，69届初中毕业。1970年到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当兵团战士五年，后转到在河北省青龙县双山子公社岭下大队插队落户三年。1982年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曾在河北省廊坊市万庄中学和天津外国语学院任教。1993年赴美，现在美国骑士资本市场做计算机工作。

扛刀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一九六零年。人们都会记得，那一年发生了什么事。那天，唯钧到我家来的时候，全家人正在扛刀。

扛刀的事近年来不大听说了。那时候可是常事。两个街坊一见面，一个问：“吃了吗您啦？”另一个说“吃嘛？这不正扛刀了嘛！您啦吃了？”一个说：“一样一样，也正扛着呢！”现在如果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叫“辟谷”。其实大相径庭。

爸爸见唯钧来了，就去开门。一晃一个瘦高个儿就走了进来。爸爸说：“唯钧来了，吃了吗？”唯钧说：“吃了吗，我吃嘛？我上哪吃去？我先问问你吃了没？”话里分明带了几分火气。

唯钧见爸爸被问得有点儿窘迫，就说：“这也没有嘛不好意思的。你不看看今儿个是嘛日子，月底，又是个阳历大尽，三十一号。这定量可是按月给的，这‘大尽’平白无故地多出一天来。今儿个你要是吃了那才怪呢。这日子有几家吃了的？”爸爸见他话里带了些火气，就说：“唯钧今天哪来的无名火？不是因为又扛刀了吧？既然大家都在扛刀，又不是你一个人，也就没什么了不起的了。先请坐，喝杯茶。今天我们做个伴儿，一块儿扛刀！”

唯钧见说，摇着头坐在一把椅子上说：“有句话叫闲饥难忍。今儿个不光是没吃的，还是个礼拜天。饿着肚子怕放假，你说这一天又没吃的，又没事干，就这么干熬着！打昨天晚上我就愁的慌，明天这一天可怎么过！我想了半宿，最

好的法子就是找你来。”爸爸说：“找我？我也没有吃的呀。”唯钧说：“你要是有吃的我就不来了。我就知道你也在扛刀，才来找你。是找你下棋。别人棋太臭，占不住心。咱俩棋逢对手，棋上那么一较劲，别的就都忘了。几盘棋下来天就黑了。曹孟德说，‘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咱们别说‘杜康’，连谷糠，稻糠都没有。这就叫‘何以解忧，唯有象棋’。”爸爸说：“好主意好主意！昨天我也愁了半宿，怎么就没有想出这么个好主意来？快，快，快，摆上摆上。”说着就支棋桌，放棋盘，摆棋子。妈妈见说要下棋就去沏茶。

唯钧和爸爸一边摆棋一边说话，他把棋子在棋盘上摔得“啪啪”山响。唯钧说：“其实啊，这也不过是没辙的辙，自个儿糊弄自个儿。照样还得扛着，忍着。”爸爸说：“大家还不是都这样，不忍着又能怎么样？”唯钧说：“你还别说，就真有那不忍着的。昨天，和平路糕点店一开门，里边就横着个死人。把大伙都吓坏了。那人肚子鼓得这么高。两手抓着点心，嘴里塞满了点心，兜里装满了点心，都是一百多块钱一斤不要粮票的。那是计划带回去吃的。没想到还没走出去就给撑死了。这倒应了那句话‘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这不都邪了吗？”

爸爸说：“这还有邪的呢。俗话说‘撑不死的鸭子饿不死的鸡’听说过吧？可现在就不灵了。今天早晨同院王婶的鸡就给饿死了。”唯钧说：“鸡那东西吃石头子都能消化，怎么还会饿死呢？”爸爸说：“这就新鲜了吧？不信问你嫂子。”

妈妈端着一壶茶正好走过来，把茶壶放到桌子上说：“那是同院王婶的一只母鸡，早就不下蛋了。早上刚打开鸡窝还好好好的，在院子里东刨刨，西刨刨找食吃。一会儿，打个扑愣就死了。这下子可把几个孩子都乐坏了，以为能吃上一顿肉了。你想，饿死的鸡能有多少肉！死在地上，一阵风刮出去老远。王婶熬了‘浮喇浮喇’的一大锅汤，清汤寡水的连个油星都找不着。一家子围着桌子灌大肚儿。你们先喝着，我出去一趟，一会儿就回来。”说完提着篮子买东西去了。

唯钧和爸爸知道妈妈去买吃的，棋走的就心不在焉了。半天，妈妈才从外边回来，篮子里有一个拳头大的青萝卜，显得篮子空空荡荡。妈妈小心翼翼地把萝卜拿出来，洗净，切成长瓣。看得出是一双灵巧的手在摆弄一件珍贵的东西。一会儿，一盘崭青碧绿的萝卜端了上来，放在棋桌上。妈妈说：“唯钧啊，实在对不起了，没什么吃的东西。凑合着吃点儿萝卜吧。”爸爸一见青萝卜就直摇头：“咳！买点儿嘛不好，偏买青萝卜？”唯钧说：“青萝卜有嘛不好？”爸爸说：

“这萝卜特别是这青萝卜是消食的。我们空着肚子吃萝卜，不是越吃越饿吗？”唯钧说：“这你可就错了。青萝卜是消食的一点也不假。要是我刚吃完一顿鸡鸭鱼肉，我可不吃萝卜。好么，一会儿都给我消下去了，我白吃了！可是现在我肚子里根本就没食，我还怕它消吗？现在，有些事你可能不知道。你到外边看看，水果店里苹果，香蕉，橘子，鸭梨，样样都有，真的是‘市场繁荣，物价稳定’吧？你可别细看，细看都是泥的，蜡的，磁的，吃不得。糕点店里，小八件儿，萨其玛，核桃酥，白皮儿，曹子糕一样不少，真的是‘品种多样，供应充足’吧？你也别细看，细看也都是泥的，蜡的，磁的，不能吃！现在能买到能往嘴里搁的东西就不容易了。再说了，现在谁家来了客人还舍得上吃的？”爸爸说：“一个萝卜没那么了不起。萝卜是为你买的，只要你不嫌，我们就吃！”唯钧说：“还等嘛？吃！”爸爸说：“吃！”说着好像做了什么重大决定。

唯钧先拿了一片递给了我，说：“慢慢儿吃，啊。吃快了一会儿就没了。”然后自己也拿起一片。我便学着他们吃萝卜的方法：小口咬萝卜，大口喝茶，吃起来。功夫不大，几个人就开始一趟一趟跑厕所，朝天打臭嗝——无论如何屋里有了食物的气息心气也平和了不少。

几步棋之后爸爸抬起头说：“你说的不假，现在粮食是少。可越少就越要计划。我老想，要是计划好了，一日三餐到时候就开饭应该没问题。”唯钧说：“听这话就知道你没当过家，过过日子。我倒要听听你怎么计划法？”爸爸说：“如今家家都有一杆称，每顿饭按量下粮没有例外，对吧？可按量下粮就大有学问。就说同院王婶，人家每次做饭，要是吃米，用一个铁皮暖壶盖儿舀米。一下儿是四两，米舀出来用一根弯儿筷子，弯儿朝下那么一刮，米就凹下去了，这粮食可就省出来了。要是吃面，用称约面，秤砣老是压在星星里边，秤杆耷拉着。约完，还要抓出来一小把儿放回口袋里。你嫂子呢，咳！一句话：穷大手！吃米，也用同样铁皮暖壶盖儿舀米，米舀出来用一根弯筷子弯朝上一刮，米就凸出来了。约面都是秤砣压在星星外边，秤杆高高的。每到月底，人家集腋成裘，全家不仅不用扛刀，还能吃顿犒劳。我们呢，寅时把卯时的吃了，到月底存一个窟窿，自己还纳闷呢：计划好好的，粮食都哪去了？这你都看见了：今几个就揭不开锅了！”

妈妈听了笑了，说：“一点儿都不假，就是穷大手。我也知道我这个毛病，可就是改不了。平常想的挺好，到时候就狠不下心来。就说那天夜里，都十二点

了，我听见大提在那屋里老是翻身。过去一看才知道孩子饿得睡不着。我说睡吧，一闭眼，睡着了就不饿了。我关上灯出来，老半天了，孩子还在炕上秃丘。急得我呀，在这屋里转磨。我拿不定主意是给孩子弄口吃的还是不弄。你想，孩子才七岁，明天还得去上学。总得让我把今儿个先过去吧？我一狠心抓了把棒子面儿，熬了碗粥。孩子喝了，一会儿功夫就睡着了。”爸爸说：“你听听，这就叫割肉补疮。有嘛用呢？”唯钧说：“可该割的时候也得割呀？”爸爸说：“割是割了。早晚是个麻烦，你躲不过去。”妈妈说：“你说的这个理儿我也明白，可我改不了。我看这个家我也当不了了。今儿个正好是月底，从明天起你当这个家。饭当然还是我做，你只要把当天的粮食约出来就行了。可千万把粮食柜锁好，把钥匙藏起来。省得到月底扛刀，也省得我落埋怨。”唯钧说：“没用，一点儿用也没有。这就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那么点儿东西，怎么做也多不出来。这刀今天不扛明天扛，还不都一样？”爸爸说：“怎么都一样呢？今天我们全家扛刀，人家全家吃犒劳。”妈妈说：“你就看见那顿饭了，也不看看人怎么样了。”爸爸说：“人怎么样了？”妈妈说：“说起来都可怜的慌，大人就不说了，五个孩子都饿浮肿了，就连那四岁的闺女都肿眼囊泡的，脑门子一按一个坑，半天起不来。”唯钧说：“大人浮肿很常见，你到街上看看，浮肿的多了。乍看一个个都慈眉善目的，还挺富态，那是富态吗？都是浮肿！我也肿了好些日子了。”说着撩起裤腿在小腿上按出一溜坑来。爸爸看来点点头说：“看到你这样我也就没怨言了。”唯钧说：“听你这话可有点儿不对劲儿，好像只有我挨饿你心里才舒坦？”爸爸说：“这话也对，也不对。老实说看到你肿成这样我恨不得替了你才解心疼。可你又和别人不一样，你是粮食局长。对粮食来说，你既是‘县官’，有是‘现管’。你说，和你一起扛刀我还有嘛怨言？”唯钧说：“局长怎么了？就不扛刀了？我也是那点儿定量，一点也不比别人多。还是那句老话，大人浮肿也就算了，反正我们也不长个儿了，也不发育了。可孩子正在长身体，要是饿出来残疾可是一辈子的事。”说着叫我过去，用冰凉的手指在我脑门上按，盯着按下去的坑慢慢地起来，说：“还好，还好。”

妈妈说：“你们就不能说点儿别的？本来就饿得没抓没挠的，你们还老是‘扛刀扛刀’的不停地念叨。谁受得了？”唯钧说：“嫂子说的对，现在咱们不

说‘扛刀’了，咱们说说‘吃肉’怎么样？”爸爸说：“好！我爱听！我可‘三月不知肉味’了。”妈妈说：“这听着多提神。”

唯钧说：“那年我正当八路呢，十八岁。那回在高粱地里猫了两天两夜，是水米没打牙。终于在天快黑时把炮楼拿下来了。按照惯例，进了村要吃犒劳。那天杀了猪，炖了一大锅肉。馒头也上了屉。大家等着，盼着，比过年还高兴。眼看着馒头揭了锅，肉也熟了，一匹战马来报：鬼子大部队从三路包抄来报复。命令我们除了枪和子弹，把所有的东西都扔了，火速转移。说着话可就听见枪声了。可这锅肉怎么办？你知道那时候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过日子，一会儿再摸也许就没了。那可就吃嘛嘛都不香了。把肉扔了？门儿都没有！当时我把裤子一脱，把裤腿扎上，把那锅肉往裤子里一倒，背上就走。那一通跑呀，那就叫屁滚尿流。那时候我就只有一个念头：死了就别说了。要活过来就得有肉吃。等到了山上，听见枪声渐渐远了，天已蒙蒙亮。这时候大家才知道背这锅肉来是对了。那回那肉那叫香！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油。香得你受了多大的委屈也没嘛抱怨的了。我可从来没吃过那么香的肉。有人说，吃了这顿肉死了也不冤了。可我从打吃了那顿肉就舍不得死了。”

爸爸一边咽口水一边说：“就是嘛，知道世界上还有那么好的东西吃，谁还舍得死呀！就说现在，别看大家都在扛刀，谁不都耐心地熬着，忍着？为嘛呢？就因为熬过这两年，吃肉的日子还在后边呢！就说你吧，占了两条：有文化，当过八路。现在是当过八路的都没文化，有文化的又都没当过八路。可你两条都占全了。这就叫前途无量！”唯钧说：“我可从来没想过前途不前途的。记得小时候我们一起上私塾时书也背过不少，《论语》，《孟子》，我们是还没念完《大学》日本人就来了。那些书哪本不是倒背如流？可现在背得出来的不多了。可有一本书，也不知道从哪来的，没头没尾，也不知道书名，只有那么几篇残页了，可我只念一遍就记住了，至今不忘。”爸爸说：“那准是一本奇书。能不能背几句听听。”唯钧说：“有这么几句叫：‘盍不乏酒，灶不断烟。茅屋不漏，粗布常穿。膝下有子，身上无官。知己一二，得闲聚谈……’。爸爸一迭连声地叫好，说：“好，好，好！我可也从来没读过哪本书说的这么好。不是看透了的人绝写不出这么几句来。”唯钧说：“好吧？我呢，也说不上什么看透了，就是念了那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书觉得没劲。可念过这本书就从来没忘过。也许

这就叫胸无大志。老想，要是过上那样的日子此生无憾。”爸爸说：“只有一条你做不到：你身上有官。”唯钧说：“对了！一官在身，万人瞩目。饥荒年，管粮食，日子不好过呀！”说着把棋盘一推说：“你看，光顾说话了，这一盘棋还没下完，天就快黑了。你们得早点睡觉，明天还要起早排队买粮食。”说着起身告辞回家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唯钧再到我家来的那天又是月底，星期天，全家人又在扛刀。爸爸知道他要来，早已摆好了棋在等他。妈妈见唯钧来了说：“唯钧来了，今天可真是对不起你了，我连个青萝卜也拿不出来了。凑合着喝点儿茶吧。”唯钧说：“这我懂，嘛也别说了，有茶就不错。”说着妈妈就去沏茶。

唯钧坐下，长出一口气对爸爸说：“今天下棋，我们得立个规矩：不许谈吃。今几个谁要是一提‘吃’这个字，这盘棋就算他输了，就得挨罚。罚他自己大声说三遍‘我是臭棋’”。爸爸说：“好！我今天也怕听见这个字。”接着两个人闷头下棋，一声不吭。

这天屋里静得出奇。能听得见呼吸，听得见心跳。到吃子的时候，他们什么也不说，只是把棋子拿掉。非说不可的时候也不说“吃”字，而是找别的字代替。用卒吃叫“拱”，用象吃叫“飞”，用马吃叫“踩”，叫“蹬”，说：“我蹬你车了”。

本来这一天可以就这样平安地渡过，没想到我竟然那么不争气，才惹下了后来的滔天大祸。我正在旁边看他们下棋，等着谁说了“吃”字看挨罚，看他们说“我是臭棋”。等着等着不知怎么竟一头栽在地上睡着了。额头撞在青砖地上的一声钝响还听得真切，后来的事就什么都知道了。醒来时眼前三张脸，只见妈妈已哭成了泪人，说：“大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也得跟了去。”这时看见我醒来，立即忙着拿香油瓶子往我头上磕起的大包上抹香油。

唯钧急得在屋里“走柳儿”，抖着手说：“孩子是招谁惹谁了？招谁惹谁了！”说着，小心翼翼地从小钱包里拿出一张小纸片——我知道那是粮票，对妈妈说：“趁粮店还没关门，赶紧去买几斤棒子面。”妈妈说：“这怎么行呢？你家也有孩子！”唯钧急得暴跳如雷，大声喊道：“都嘛时候了你还跟我客气？这不是救命要紧吗？还等嘛？再过五分钟粮店就关门了，还不快去！”妈妈含着眼泪接过粮票跑着去粮店了。

此后，唯钧再也没来找爸爸下棋。但每个月底都要来一趟。来了并不进屋，只是开一个门缝儿递给妈妈一张小纸片儿，扭头就走。这样，不知道过了多久，一天又是一个月底，妈妈说：“唯钧已经有三个月没来了。”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爸爸从外边回来，脸色蜡渣黄，嘴唇直发抖。他进了屋，把门关上，悄声对妈妈说：“出了大事了，唯钧进去了。今天上午开的宣判大会，下午派出所门口就贴出了告示。”妈妈还有些不信，继续做她的事，说：“别瞎说，好模样儿的，怎么会说判就判了？是嘛罪？判几年？”爸爸说：“是贪污罪，一共贪污了四十五斤粮票。说是民愤极大，判的无期徒刑。”妈妈听了一愣，说：“怎么偏偏是这个数？”像是自言自语。

爸爸说：“这个数怎么啦？”妈妈说：“从那次大提饿昏倒，他每个月月底都给我们五斤粗粮票，到最后一个月来，正好四十五斤。他一斤也没拿自己家去。唯钧是为了我们，是我害了他。”说着已是泣不成声。爸爸听了愣了半天才说出话来。他说一句，扇自己一个嘴巴，左右开弓：“你是糊涂吗？不是！你那是装糊涂！明摆着的事，他浑身都饿肿了！他哪来的粮票！你是装糊涂！是你害了他！”说着已是声泪俱下。

当爸爸、妈妈冷静下来之后，他们决定要把这件事向法院说清楚，也许会缩短唯钧的刑期。在他们跑了无数次法院之后，终于受到了亲自审理唯钧案子的吴同志的接待。吴同志说：“你们三番两次要见我，是不是要给赵唯钧翻案？”爸爸并没有被这咄咄逼人的问话吓住。说：“要是能，当然好。要是不能，有个问题我们也要和你们说清楚。”吴同志说：“翻案的事你们就别想了。这个案子是中央抓的典型。有什么要说清楚的你们就说吧。”爸爸说：“在审理这个案子的过程中你们是否知道他贪污的四十五斤粮票他自己并没有拿回家一斤一两？”吴同志说：“他拿回家没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贪污了那些粮票。”爸爸说：“不，这很重要。他拿了粮票不是为了自己享受，挥霍。”吴同志说：“看样子粮票哪去了你都知道。”爸爸说：“一点不错，我都知道。他都给了我们。其实他犯错误的责任都在我身上。当时我猜得到他的粮票是哪来的，但是我接受了，才使他犯了这么大的罪……”

吴同志没等爸爸说完就说：“等等，等等。我干了这么多年法院，你这样的我还是头一回见到。别人都是见谁犯了罪躲还来不及，可看你这意思是想陪着也

判上几年才心里舒服是吧？这事都怪了。我告诉你，你这点理由丝毫不能为他解脱。他的问题是困难时期破坏了党和群众的关系。他破坏了党的威信，判你几年就能挽回影响？”爸爸一时语塞。妈妈说：“那我们能不能见见他？”吴同志说：“像他这样的要犯，宣判会一结束就押到外地服刑去了。这地方保密。别说是你们，连我们也不知道押到那里去了。可能是青海，也可能是新疆、内蒙古。另外像他这样的要犯，就是直系亲属也不能探监，你们就更不行了。”

回家的路上，既然不能为他减轻罪刑，也不能见他，现在只有到他家看看，是否能帮他媳妇，孩子做点什么。于是他们又急急火火地来到唯钧的家。

到他家时天已经黑了。他家是个独门独院。推开大门，院子里黑得像个深山古洞。走近正房门，划根火柴才看见门上贴了白纸黑字的封条，盖着法院的大红印章。于是就向邻居打听他家人的下落。

爸妈像着了魔一样挨家挨户地敲门，门开了就说：“赵唯钧为了救我们的孩子才拿了公家的粮票，他犯罪的责任都在我们身上。现在他进去了，他的媳妇孩子都哪去了？”邻居们看他们说话有点疯疯癫癫，不着边际，都推说不知道，把他们拒之门外。最后，一个小脚大娘把他们拉进了屋说：“看你们这样儿像是有心的人。他赵唯钧交了你们这样的朋友也算是值了。他媳妇孩子嘛，照说还是他看的透。临行时留下话了，说：‘谁也救不了你们，只有一个法子，赶紧改嫁。谁能养活你们就嫁给谁’。这不，昨天下午从郊区来了个农民，看样子倒是好人，就是模样寒碜了点儿，把他媳妇和一儿一女领走了，你想呀，但凡能娶上媳妇的，能要个活人妻，还外带俩孩子的吗？这样最好。多好的朋友能把一家三口领家去养她们一辈子？”

妈妈说：“您老知道那个农民的地址吗？我们去看看她们。”小脚大娘叹了口气说：“世界上的事情也只能是这个样子了。你想，他媳妇现在已经是人家的媳妇，儿女也已经是人家的儿女。最好的法子是他们把赵唯钧忘了，那个农民也不要想起赵唯钧。你们去不是给他们填堵吗？算了吧，这就是最好的安排了。”

这的确是最好的安排了。从此以后，爸爸妈妈只好把对唯钧的愧疚深深地藏在心里。他们默默地盼着，也许有一天，他们能再见到唯钧，当面向他道歉，请求他的宽恕。妈妈说，就是给唯钧当牛做马也赎不回自己的罪过。

三十年过去了。

一天，爸爸和妈妈从广场晨练回来说看见唯钧了。妈妈说：“我只知道人能变胖变瘦，怎么还会变小呢？唯钧本来是个笔管条直的大高个儿，怎么会变成那么一个小可怜儿。”

其实还是爸爸先看见的唯钧，就对妈妈说：“这个人我看着很眼熟，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是谁了。”妈妈说：“你指给我看看。”妈妈远远看去，见一个驼背老人双手各提一只罩着兰布罩儿的鸟笼子。两只鸟笼子被他一前一后地摇着。他歪着头，好像在倾听笼子里的动静。动作中看得出他在意着笼子里的小生灵。样子很是专注，也很逍遥自得。妈妈一眼就认出是唯钧。于是和爸爸一起赶了上去。

爸爸走到他身后，小声说：“对不起，要是我没认错的话，你是唯钧？”声音很是唯唯诺诺。

唯钧没有回头，但似乎知道是谁在跟他说话。手忽然停止了摇动那两只鸟笼子，人就定在那里，那两只鸟笼子还在他手里前后晃动。他没有回头，也没有说话，就那么愣着。

爸爸说：“还记得我吗？记得小时候我们一起上私塾，后来一起扛刀，一起下棋的事？”

瞬间，唯钧刚才的专注与逍遥自得的神情荡然无存。他羞愧难当，眼睛不知道往哪里瞅，恨不得地上有个缝儿钻进去。结结巴巴地说：“打，打那次起我，我就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妈妈此时已流下了眼泪：“唯钧，你怎么能那么想，你不能那么想，你从来没犯过罪。你对我们有大恩，三十年来我们从来没有忘过你。我们知道你是为了大提才……”

爸爸实在不愿把唯钧弄得如此窘迫，就说：“唯钧现在还下棋吗？有空到我家来下棋吧。”说罢拉着妈妈匆匆地离开了。那天回家后爸爸妈妈流了很多泪，为唯钧，也为自己。并商定：此后不要让唯钧再见到他们。

【小说创作】

山乡的戏

山乡本无戏。说有，不过是那些算不上戏的戏。

忽然一天，听说来了唱戏的。已经唱到了瓦房大队了。这消息给这偏僻山乡的穷苦人们带来了无限的欣喜。

戏从来是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挨个唱的。三里一村，五里一庄。大村，富裕村钱多，演两宿，三宿。小村，穷一点的村钱少，就留一宿。从一村到一村戏文都接着唱。这样，那戏瘾大的人从离自己村子还有好几十里地就开始跑去看，慢慢地越看越近，然后又越看越远。直到实在跑不动了为止。

瓦房大队是离我们还有十几里地的村子。尽管十多里山路已经不算很近，可是全村男女老少早已都按捺不住了。

人们的日子真太清苦了：极低的物质供给，极高的体力消耗。使得人们在除了吃饭和干活之外，似乎还有着其他渴望。这渴望在平时，是较容易满足的。村里流传着这样的话：“干活不谈戾，产量要降低；出工不说屌，分红会减少。”对此全体干部群众都深信不疑。因此，每天干活，队长总要想方设法地讲些段子。这样人们才觉得日头落山得快一些，苦日子容易打熬一些。可今天不同了，人们真的要听到戏了！

这一天，各家都早做饭。姑娘，媳妇，后生们早都相约好。队长也早早地收了工。人们回到家，匆匆忙忙地“扒拉”几口饭，丢下饭碗，抄起板凳，就往外跑。此时，在蜿蜒曲折的盘山路上早已看见三一群，五一伙去看戏的人们。他们“唧唧嘎嘎”地留下一路欢笑。

最感人的是每逢这个时候，在崎岖的山路上都会看到儿子推着独轮车，孙子用一根绳子拉着纤，车上用棉被围坐着一个小脚老太太，或是苍颜皓首老人。这样难得的欢乐，那些穷苦人是不忍心把老人丢在家里，让他们独自忍受寂寞的。

戏终于唱到了本村。其实那只不过是乐亭大鼓，根本算不上是什么戏！其实那也根本算不上什么戏班子，连乐队带演员总共也只有三个人：一个瞎子师傅，带着两个瞎子徒弟。

没有人知道他们从哪里来，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往哪里去。他们凭着三根竹竿引路，踏遍千山万水，把他们的歌声送到这穷乡僻壤的穷苦百姓身边。

师傅大约四十多岁，背着一把三弦。两只巨大的眼睛不停地眨动着。那眼睛已经没有黑白的分别，一律是暗淡无光的灰色，上面布满了血丝。

徒弟是两个失明的女孩儿。师姐十八岁，师妹十六岁。师姐是园脸，师妹是长圆脸。师姐白白净净，鼻梁儿上略有几个雀斑。师妹也白白净净，鼻梁儿上连雀斑都没有。

人们聚集在台下时，台上鼓已经架好。台下已一片嘈杂。师傅正在调弦。当他左手沿着琴担子攀上琴轴时，他紧闭黯淡的眼球，凝神细听。当一根弦调好时，他突然睁开双眼，脸上涌出满意的笑容。令人奇怪的是，乐亭大鼓三弦的定音，弦与弦之间不是通常的5度音程，而是4度。让人觉得他的弦老也没有调准似的。然而他的脸上分明已经泛出了满意的怪笑。

师姐和师妹安静地坐在师傅旁边。如果不知道，没有人会认为她们是瞎子。她们的眼睛依然跟这个年龄的女孩的眼睛一样清澈明亮。只是这眼睛不会跟随着眼前缭乱的世界晃动。她们坐在师傅旁边，眼睛凝视着前方，不时地眨一眨，是那样安静，好象在沉思。

师傅的三弦终于奏出了大家熟悉的旋律，那是歌曲《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调子。大家知道，演出立即就要开始了。

师妹站起了身，跟着三弦的旋律，紧击鼓键，轻按梨花板。那自信的神态，略有点调皮的表情，使得台下立刻安静下来。只听师妹也不报幕，便开口唱道：

毛主席的书，

我最爱读。

千遍那个万遍地下功夫。

深刻的道理，

我细心领会，

只觉得心里头热乎乎。

……

师妹是那甜，脆，亮的嗓音，且不管唱的是何等陈词滥调，只这声音，已

感到如沐春风了。

这本来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歌了，没想到当唱到“细心领会”时突然一变，变成了乐亭大鼓调子。变的自然流畅，不留痕迹。让大家很是惊奇。

其实这早已不是什么新鲜手段。当时流行“移植”。几十个戏种唱的只是几个样板戏。曲艺也一样，一个新曲目出来，各个曲种争相“移植”。

一曲歌罢，师傅没有稍稍停歇就奏起了第二首曲子的前奏。这时候师姐走上前来，说道：“我给父老乡亲们孝敬一段毛主席诗词《蝶恋花答李叔一》。说罢，只轻轻按了一下梨花板板，开口唱道：

我失那个骄杨呀，君失的那个柳，

杨柳就轻扬呀，直上那个重霄九。

问询那个吴刚何所的那个有？

吴刚就捧出了桂花的那个酒。

……

师姐是那种“云遮月”的嗓音。大概是因为在乐亭大鼓里实在找不到适合这首词的曲牌，歌词里加进了太多“垫字”，显得油嘴滑舌。尽管如此，毛主席这首悼念亡妻的词还是被师姐唱的婉转凄切，催人泪下。

这一曲歌罢，那师姐鞠躬站到一边，却不落坐。只见她摸摸索索地摸到师傅的棉袄，给师傅披好。

师傅只稍事停歇，另一段的前奏又操操切切地奏了起来。

小师妹站起身，接过鼓键和梨花板，说道：“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批林批孔’。下面我孝敬父老乡亲，叔叔大爷，大娘大婶，哥哥嫂子，弟弟妹妹们一段我们的新段子，叫《刘六怒砸孔家店》。请大家赏光。”言罢，师傅的过门刚好到了开口的时候，只见她轻按了一下梨花板，唱道：

说的是，明朝正德天下乱，

神州大地起烽烟。

穷苦农民齐造反，

春雷滚滚震山川。

起义军攻州夺县砸孔庙，
只吓得皇帝老儿，
众贪官孔府的儿孙六神无主心不安。
这一天，
在通往山东曲阜的大道上，
一队人马风驰电掣来得快，
恰似猛虎下了高山，恰似猛虎下了高山。

.....

这一曲只唱了头一句就叫了一个满堂彩。而最后：“威名远震天下扬”一句是乐亭大鼓中“昆曲尾子”，是最有名、最要功力的十八弯落腔，那甜脆亮的嗓音弯弯抖得干净利落，神韵十足。小师妹调皮的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

大家知道上面唱的这几个段子，不过是“冒戏”，只是为了应合政治形势的应时之作。再接下来才是正经段子。

大约休息了一袋烟的工夫，师姐站到了台前。师傅的弦子也不弹，师姐的鼓也不敲，只听她开口说道：“上回书我们说到，苏建才正在痛不欲生，只听楼下‘嘎噠，嘎噠’脚步声。人还未见，先闻到一缕似有若无的幽香，接着一个身穿和服，脚踏木屐的漂亮的日本姑娘走了上来。这不是别人，正是著名的日本随军妓女稻川芳子。只见这女人悄悄走到苏建才身后，轻轻摸着他的头说道：

“我说建才呀……”

大家等待已久的正戏终于开始了。这是长篇大鼓《平原枪声》，是接着昨天在瓦房村的茬口唱的。人们如醉如痴沉浸在委婉曲折的曲调和故事情节当中。

许久才唱完这段。师姐扭转身去照顾师傅，又是摸师傅的茶碗，给师傅添茶，又是给师傅披好滑落下来的棉袄。

稍事休息，下面正不知道要唱什么段子。忽听有人高声喊道：“来一个老段子！”紧接着大家一片随声附和。

只见师傅跟小师妹悄声说了几句话，便抄起三弦，一曲前奏立即在那鳞皮琴鼓上奏了起来。

小师妹开口说道：“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评水浒，批宋江。’为紧跟革命大好形势，我给父老乡亲们孝敬一段《林冲雪夜上梁山》。”

须臾唱罢。下面又有人喊道：“再来一段《占花魁》！”紧接着又是一片附和之声，大家一起鼓掌，一声声怪叫。

这时候师傅再也坐不住了。只见他那灰色的眼珠子不停地翻动，表情却说不清是哭还是笑。

又听下面人说：“《占花魁》会不会呀？”

师傅听见，把脸一沉，放下三弦，站起身，双手抱拳给大家深深地作了一个揖。说道：“我们师徒三人来到贵乡，贵乡留我们在这里唱曲儿，我们心里明镜儿似的，那是可怜我们，心疼我们，抬举我们。我们从小没了眼睛，可是老天爷心疼我们，让我们学了这门子手艺，能混口饭吃。这也是‘谷子地里头饿不死瞎眼的雀儿’。我们师徒三人不论年纪大小，都是四岁学艺。乐亭大鼓的九腔十八调，各样的段子，许它没有，就不许我们不会。我们要是不会，那不就辜负了老天爷赏饭的慈悲？我们也知道，各位父老乡亲能听上个曲儿也不容易，但凡能唱的，我们一定唱给各位父老听。刚才那位大爷，还是大叔点的《上梁山》就将就着能唱，为啥呢？毛主席说‘要评水浒，批宋江。’这能靠上点啥。这《占花魁》哪也靠不上，我们就不敢唱。万一传了出去，说我们宣传‘封资修’，对犯了官家忌，那不就砸了我们的饭碗？我们仨瞎子就得饿死，父老乡亲看着也是不忍心不是的？还请父老乡亲们多多包涵，多多包涵。”说完，把个揖作的如同鸡铃米。

“好吧，不是‘封资修’的也有呀，那就来段《十八摸》吧！”接着有人叫道。

“对呀，《十八摸》犯不着官家！”紧接着又是一片附和。

大队书记一听站了起来，厉声说道：“时候不早了，姑娘媳妇们都回家了，还在这儿磨蹭啥劲儿？荤段子是你们听的吗？自个儿找寒碜呢？”说着，下面一片笑声。女人们撇着嘴，做着怪脸，笑着，急急忙忙拿起板凳往家走。

瞎师傅听说，知道这不异于大队书记同意了唱荤段子。叹口气，说：“好！《十八摸》就《十八摸》！这荤段子只是个荤，好歹也算不上‘封资修’，犯不上官家的忌，就是传出去也不至于砸了我们的饭碗儿。只是有一样，我徒弟可不能唱。书记怕荤段子污了姑娘媳妇的耳朵，我也不能污了我徒弟的嘴不是的吗？”

“唉——，那还有啥听头？”下面顿时一片失望的叹息。显然他们感觉到，

那些撩人心跳，让人遐想的唱词从漂亮女孩嘴里唱出来，跟从一个瞎老头子嘴里唱出来的天壤之别！

师傅突然沉下脸说：“我知道父老乡亲们没拿我们当外人，对待我就像自个的亲兄弟，对待俺徒弟就像自个家的闺女、媳妇儿不两样，是吧，不两样。书记刚才不是说让闺女，媳妇儿们都回避不是嘛，俺徒弟跟父老乡亲的闺女不也是一样样的闺女嘛？”几句话说得下面鸦雀无声。

说罢，不管下面作何反应，便一边把一直披着的棉袄穿好，摸索着系好疙疙瘩瘩扣子，一边打发师姐，师妹先自己回去。

须臾安静了下来。只见瞎师傅提起三弦，落座，说道：“女人们都走了，让我这老没脸的来好好地孝敬孝敬父老乡亲吧。”说罢，脸上泛起害羞的怪笑。接着弦也不调，幕也不报，竟弹起了过门儿，紧接着自弹自唱了起来。

今晚他唱得格外卖力。

【小说创作】

远山

黎明前的山路只是脚下这微弱的灰白。

他知道这是人们走出来的。用布鞋，用草鞋，还有就是像他穿的这种球鞋，踏倒山间的荆棘，磨钝岩石的棱角，于是就有了这样可供辨认的路。皮鞋是从来不走这样的路的。

他早就想弄到一双本地人穿的那种布鞋。鞋底，纳的；鞋帮，也是纳的。鞋口，方的；鞋头也是方的。硬硬的像两个铁盒子。穿上这种鞋，走在山路上会留下“忒愣，忒愣”的脚步声。更高明的是，这种鞋左脚的可以穿在右脚上，右脚的可以穿在左脚上。确切地说它根本就不分左右脚，想怎么穿就怎么穿，是何等自由！那才像真正的贫下中农。

他不想给人们留下“城市人”的痕迹。既然是“和贫下中农相结合”，就要象模象样的。因此，他和他的同学一来到这里就都剃了光头。第一天出工像走来一群和尚。村里的姑娘媳妇们看了都笑得直不起腰。特别是他和四宝，比本地人还本地人：穿对襟袄，免裆裤，说本地话，做和本地人一样的营生，挣和本地人一样的工分。只有这双球鞋和这一身打扮不太协调，看着有点不伦不类。可那种鞋他始终也没有弄到。那是他们的妈妈或妻子一针一线地做出来的。而他的妈妈却在遥远的城市里，根本不知道他现在是这个样子。更不知道他想有一双那样的鞋。

除了这双鞋难道还有什么跟本地人不同的吗？如果这次他不出河工，不同处就是他没有出过河工。正因如此，这次他才执意要来。而现在他就在出河工的路上，并且是那种连本地人都望风而逃的河工。尽管如此，本地人还是一眼就能认出来，说你是“知青”，说你们跟本地人不一样。

再有能认出你的就是狗。本地人进村，不管哪个本地人进哪个村，狗是从来不叫的。可你们一到村口，全村的狗就都呲着白牙狂吠不止。你不是说过吗，如果有一天你进村时狗们都悄无声息表示认同，那才说明你已经和贫下中农结合好了。可连你自己都解释不通：尽管你那么真诚地去消灭你和本地人的差别，那么

努力地改造自己，可为什么每当你听到有人说你和本地人不一样时，心里总有一种莫名的得意？究竟你得意什么呢？

他轻蔑地笑了。深夜里谁也没看见，但他知道他在蔑视他自己。

眼前的路还是那样朦胧的灰白。行路人须看准这灰白才能把脚踏上去。否则你会迷路，几步之后你就无法回到这条路上来。你会走到哪里去？在你吃完所带的干粮之前能否遇到行人给你引路？这都无法预料。山里有狼。

或者你会一脚踏空，下面就是山涧。悬崖失脚的人绝顾不上惊叫一声。而人们过一会才会听到你落到谷底的声音，这一会你正在空中降落。当听到时一切都已经晚了。

可此时，他不用辨认这朦胧的路，只须跟着前边人的脚步就不会出错。这使他能够腾出精神来随便想些事情。

“扑愣”一声一只熟睡的呱呱鸡被惊醒，“呱呱呱呱……”地叫着飞向远方的黑暗。于是山路又静下来，静得连一只秋虫的叫声都没有，只有“忒愣，忒愣”的脚步声。这时他才知道，深夜，蚰蚰蝓蝓们是不叫的，它们也要睡觉。

而他们却要趁万物沉睡的时候走完三十里路，赶到工地。天一麻麻亮就该干活了。三十里路究竟是多远的路？村里人说“三十里莜面，四十里糕，二十里荞面饿断腰”。这倒是最好的“里程碑”：在黑暗中前行，一切都无法辨认。你无法知道走出了多远，当你饥饿时，只要你还记得你吃的什么，你就知道走到了哪里——此时他真的觉得饿了。

他摸了摸背在肩上的鼓鼓囊囊的干粮袋，袋子里装的是白薯干儿。他从里面摸了一块放在嘴里慢慢地嚼着，很“筋道”。这是那种蒸熟了以后再凉干的白薯干儿，是所有白薯制品里最好吃的那种。白薯究竟有多少种吃法？没有人能数得清。最普通的吃法是蒸白薯，烤白薯；白薯干就分生白薯干和熟白薯干两种；生白薯干可以破成碴子做碴子粥，还可以磨成面。薯干面能做的东西可就多了：可以贴饽饽，烙饼，包饺子，蒸包子，擀面条，轧饹饹……；生白薯还可以炒菜，腌咸菜，还能做成淀粉，淀粉可以漏粉条，做凉粉儿……只要你看看本地人这些白薯的吃法你就会知道了“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这句话确实是伟大的真理。

可他并不认为白薯是什么好东西。小时候，家里一买白薯就高兴得不得了。可那时白薯只是“点心”，吃完了白薯还有饭，有菜，有汤。而现在，除了白薯

还是白薯，白薯就是饭，饭就是白薯。吃得人们一天拉五次屎。吃得人们个个胃溃疡，天天打酸嗝。一个酸嗝打上来，五脏如同起了火，一把小刀从胃一直割到嗓子眼儿。在地里干活儿，常看到人们一直脖子打个嗝，然后呲牙咧嘴地忍着剧痛。吃得人们个个面色碧绿，骨瘦如柴。然而他对此并无半点儿怨言：那么多本地人都受得了我为什么就受不了？更何况还有人连这也吃不上。更不能忘记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重要的是现在要去改造这种现状。他们现在去做的就是这件事：他们要去开凿一座大山。把那座大山打通，水就能流过来。于是山这边就有了水。于是就有了水浇地。于是就可以种小麦、水稻。于是就可以吃上白面，大米。他早已想好了，他们还能利用水的落差发电。他为此读了好多“农村小水电技术”的书，只要有了水，技术不是问题。有了电，晚上读书就不用再点油灯了。吃大米，白面，点电灯的日子离共产主义还有多远？他不知道。但他知道那绝不是共产主义！他读过《共产党宣言》，他知道“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彻底解放无产阶级自己”。

然而现在，他们必须靠吃白薯干儿打通这座大山！在那黝黑的山洞里，那些嶙峋瘦骨消耗的无一例外都是这种食物。那大锤被抡起来，“噹”地一声击落在钢钎上，钢钎与岩石撞击出暗红色的火花，撞击出一股钢铁燃烧的气味。于是，岩石上被击出一点白色的伤痕。慢慢地一座大山被开通了。他情不自禁地赞叹这种粗劣食物的力量！难道这是白薯的力量吗？不！是生命，是生命所蕴含的信念！他情不自禁地为自己的信念而激动。

他耸了耸肩，把滑下来的干粮袋重新背好。这干粮袋本来是条雪白的毛巾，上面大红字印着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现在还依稀可辨。那是慰问团发的慰问品，说是擦汗用的。后来才知道这都是城里人的想象，其实，挥汗如雨时是顾不上擦汗的。于是，他就把毛巾对折，把两边缝上，沿着口卷边缝进一根绳子，把绳子一抽，就成了这个干粮袋。他喜欢这个干粮袋，不管是出河工还是外出干累活，只要摸到它里面鼓鼓囊囊还有东西心里就踏实。他更喜欢慰问团送来的那一大摞书。

那次送来的书可真多。有《毛泽东选集》，有“马列五本书”，《列宁全集》，《马恩选集》，《法家著作选》，《甲申三百年祭》，《李白与杜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还有供批判用的《论语》，《孟子》，《大学》……甚至还有《水浒

传》，《红楼梦》。新华书店也不过如此吧？他觉得有这么多书放在那里就象缸里有咸菜，窖里有白薯一样心里踏实。从此不会象以前那样，这本快读完了，下一本还不知道在哪里。

他老是觉得那些独自读书的夜晚有些神圣。一天劳作之后，别人都已经倒在大炕上酣睡，只有自己在油灯下读书。那一盏灯火，圆得象一颗黄豆，燃在那里一动不动。多少个夜晚就是这一盏灯火陪伴他一直到公社通到村里的高音喇叭响起《东方红》乐曲。

那套《资本论》太难懂了，坐在那里读，连自己都觉得有点象“装洋蒜”。可他还是计划用一年时间把它啃完。一天读五页，十天五十页，一年按三百天算，三五一十五，一千五百页，一年差不多能读完。生长在这个时代，这本书没读过根本说不过去。他不相信会有他读不懂的书。可最喜欢读的还是那套《水浒传》。也不知道现在那套书传哪去了。一发下来就不翼而飞，至今下落不明。他只记得曾经在四宝手里。四宝这家伙看书如飞，并且从不影响休息，也不影响干活。一百二十回的书，上工下工的路上一边走路一边看，几天后就可以倒背如流！上工时他在地里给大家连比划带白话地讲《水浒》，多少天从上工讲到下工，弄得全体社员都着了迷，只想听故事不想干活，荒芜了许多土地。要没有“评水浒，批宋江”的毛主席指示在前边顶着，四宝肯定早已成了批斗对象。

现在，四宝就走在其后。他知道四宝对他有点儿“崇拜”。要不然，全体知青都反对你出河工，他怎么会陪你一起来了？

往年上边派下来这种河工名额，都是全体没去过的人抓阄决定谁去。抓着的人都会破口大骂“倒了八辈子邪霉”。可这次一共就两个名额，你就象个冤大头一样不等抓阄就说：“我算一个！”你从来不相信别人受得了的苦你受不了。人生不就是一种经历吗？受苦也是经历。有过各种各样的经历才算得上完美的人生。更何况受苦受累是为了改造思想，使自己更完美，受苦受累是为了实现人类最美好的理想。要实现那样一个理想，怎么能存有私心？怎么能贪图享乐？私心和这个理想水火不相容，毛主席正是看到了这点，才说：“要斗私批修”！因此，打来的第一天你就给自己定下：吃苦要走在别人前边，享受要走在别人后边！眼下要做的，就是先把贫下中农受过的苦都受一遍再说。更何况开山引水这样重大的事情他是注定要参加的，否则将来这个山村富足起来时他会感到羞愧。

跟着四宝就说：“别抓阄了，那个名额归我了！”乡亲们都愣了：这是什么好事，跟抢狗头金似的？

记得在下乡前，大家都翻着地理书挑，哪里离家近，哪里富裕，哪里交通方便，哪里物产丰富。要是那样还要我们去干什么！去就去个最穷最远的地方。于是他选择了这里。他觉得这穷山村注定要在他们手里变得富足起来。这是他一生的使命，是这一代人的使命。

本地深山里出产一种红色的染料，当地人叫它“红土子”。用它做染料在石头上写字，字迹鲜红如血，历久弥新。无独有偶，在村口有一个巨型峭壁，平整得就象一块大黑板。有了这两样东西，这峭壁就成了历史的记事板。上面有用不同字体横七竖八地写着不同时期的标语，仔细辨认似乎能理出历史的脉络。有“减租减息”，“打倒土豪分天地，支援朝鲜打美帝！”，有“坚决走合作化道路”，有“三面红旗万万岁”，有“每村炼出一吨钢，帝国主义着了慌”，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也有最近的“打倒孔老二！打倒宋江！”简直就是一部共和国历史！一部共和国思想史！

现在轮到他了。他们这一代人注定要在历史上留下什么，那就让这个峭壁做个见证吧！因此他们刚一到来，他就用红土子在村口的峭壁上刷上“天塌地陷心不变，扎根农村一百年！”的巨型标语。一百年是多长的时间？就是要写一个活不到的数，反正，来了就没打算回去。这是他的誓言，他为自己的这个誓言激动得流过眼泪。这是写给自己看的：提醒自己不要忘记这誓言。也是给别人看的：万一将来自己意志动摇了，要离开这里，全村人都看这你呢，你有何面目从这誓言下走过去？这是断自己的后路！

夜色正浓。露水下来了。衣服湿漉漉的，冰凉。空气沉甸甸的，压在人身上。一只鸟起冒了五更，贸然地叫了两声，有点儿胆怯。等了等，又叫了两声。见没有回应，没劲哒撒地悄悄又去睡了。队伍仍然在“忒愣，忒愣”地前进着。

可他至今也不明白为什么要“评水浒，批宋江”。宋江究竟错在哪里？因为他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究竟谁是贪官，谁又是皇帝呢？这就是说，不管是谁，只要他变坏就一律要反！

前面的路较为平缓，听着前边“忒愣，忒愣”的脚步声就能跟着队伍。他太累了，他想歇一会儿。他合了一会儿眼，竟然睡着了，竟然还做了一个梦。

以前他不相信走着路就能睡觉，他记不得在哪本书上看过走着路睡觉的故事。反正是一本打仗的书，可他不信。他觉得那是作家的夸张。现在他信了。他不仅走着路睡着了，而且还做了梦。他梦见了累，梦见了饿，梦见了冷，梦见了死。

他实在是太累了，连做梦也摆脱不了劳累的纠缠。现在管出工不叫“下地”了。叫“战斗”。早饭前出工叫“早战”，午饭后不休息就出工叫“午战”，晚饭后出工叫“夜战”。加上上午，下午出工，每天是五次“战斗”。夜战回到家已经是深更半夜。这时候，一天最幸福的时刻到来了。同学们都象烂泥一样倒在大炕上打鼾，他要抓紧这个时间读书学习。读不了几页书，公社的高音喇叭就会肆无忌惮地响起《东方红》乐曲。接着公社书记在喇叭里宣布：“社员们起来啦！新的战斗的一天开始了！”声音大得连猪圈沉睡的老母猪都不耐烦地“兹兹”地痛苦地呻吟。

他梦见他死了。他知道他心底是期待着死，死了就不用再忍受饥饿了，不用再忍受劳累了，不用再忍受困倦了。死的滋味可真好受！浑身哪也不疼。静静地躺在那里，躺在深山的草地上，周围疏疏落落地开着淡紫色的小花，身边的岩石缝里长着一朵一朵的青苔，小溪静静地从身边流过。从草的缝隙间可以看到远山，看到白云。看到白云从远山间悠闲地飘过……他想就这样躺下去，永远躺下去……他一点也不担心狼，他知道狼们都懂得：累死的人不能吃，肉太酸！

队伍忽然停下来了，他一头撞在前边的人身上，他惊醒了。听见带队的说：“抽袋烟，喘会儿了！”于是这支队伍便横七竖八的倒成一片。

什么时候天已透出微明的曙色。远处深山里传来了第一声鸟鸣，孤零零，怯生生的。停了不知多久，第二声，第三声……终于连成一片。他第一次知道，在深山里，每天早晨都有这么多生灵为送走一个暗夜，迎来一个黎明如此鼓噪欢呼。

此时他正站在山顶。这正是“东方红，太阳升”的时刻，可他怎么也激动不起来。望着云雾缭绕的群峰，每一座奇峰异石，每一株古松怪柏都使他觉得苍茫和凄凉。他呆呆地望着，竟然无缘无故地流下了眼泪。

一袋烟功夫过后，队伍离开了山顶，继续盘旋在蜿蜒的山路上。他知道下了山就到了工地。可他不知道为什么心情忽然坏起来。你不是一直自诩毅志坚强吗？你不是自诩是吃了秤砣的王八，心硬如铁吗？难道还有什么事情能左右你的

情绪？你究竟听到了什么就使你这样心烦意乱？刚才那个看山的老汉在山顶眉飞色舞地到底讲了些什么？

那个老汉浑身精瘦如铁，眼珠滴溜乱转，闪着凶狠的亮光。他肩上背着一杆步枪。他说现在果子正熟，他见有人来，怕有人偷他的果子吃才过来看看。他指着挂在山腰的一株果树说：“那不是一般的果树，是独夺天地造化的一棵灵根。它看着和别的果树没什么两样，可它的味道世间少有。因此，每年五月定果一结束，上边就来人把果子一个一个地数过，把数写在纸上，公社，县里，省里三曹对案，签字画押。到大秋上边来人就要这个数！还是公社，县里，省里三曹对案，少一个也交代不过去！甚味的？你问我？我问谁去？据说能益寿延年，咱看护这棵树十多年了，也没能尝上一口。这是贡品，咱哪配？”

老汉晃动着手里的步枪说：“这可是真家伙，里边有枪子儿，上边特批的，有人偷果子吃就开枪，打死白打！”

那老汉还说了些什么？

老汉说：“几个果子算个球！你知道中央的人都吃甚？净吃那四指膘，三指半的都不要！”他把枯树般的手指并得整齐，放在眼前表示着肉膘的厚度。

当时你听完老汉的话最多只是皱了一下眉头，他们谁也不会注意到老汉的话对你会有什么影响。他们都觉得你是个很平静的人。老是一副面孔，一种表情。既不哭，也不笑。不高兴，也不难过。没有欢喜，也没有忧愁，一条道走到黑。真的要是那样就好了。只有你自己知道，别人认为的大事，对你无所谓；常常别人认为是无所谓的事情，却能在你心里掀起惊涛骇浪！

刚才在大家听了老汉的话后先是唏嘘不已，然后笑骂着散去时，你在想什么？你先是怀疑老汉的话不是真的。回头看了看提搂着枪的老汉，又望了望悬崖的那颗果树，你相信了。此时，你竟然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忽然塌了下来。究竟那是什么塌下来了？那是一座建筑，是一座大厦，一座庙宇，还是一座圣殿？就那么“呼喇喇”一声塌了下来，不，是悄无声息地塌了下来，变成一座废墟，一堆砂土，一滩粉末，一撮灰尘，或乌有。

他觉得很可惜，那么辉煌的一座圣殿怎么竟会瞬间化为乌有？

他顿时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他不知道这是什么感觉，是失去精神支柱后的空乏，还是丢弃了负担后的轻松？他很不习惯这种感觉。干活他从来是不惜力气的，

可今天他根本就没有力气。他不知道自己怎么走到了工地，怎么吃光的那一袋薯干，怎么又翻回那座山回到了家里。

又到了独自读书的神圣时刻。同学们都已倒在大炕上酣睡。他独自坐在炕沿上。白茬木板的桌子上那盏如豆的油灯洁净得不拖一点烟尘，一动不动地守候在他身旁。他多么想再次享受那独自读书的神圣时刻！可现在他做不到。他只想一个人静静地坐着，眼睛直勾勾地坐着。

有谁的真诚被愚弄过？此后他便不再真诚；有谁被信仰所欺骗？此后他便不再信仰。当他放弃了真诚与信仰之后，几乎这世界的一切都反了过来：真变成了假，善变成了恶，美变成了丑，崇高变成了滑稽，伟大变成了渺小，真理变成了谎言……。他不知道坐了有多久，是十年，二十年，还是一个世纪！当他又回到现实中来时，他觉得坐在这里的已不是他，而是另外一个人。

油灯忽闪了一下，有人“呼”地从炕上坐起来。是四宝。接着，知青点儿的同学们“呼啦啦”都坐了起来。他们一个个面色黧黑，蓬头垢面，骨瘦如柴，竟然看不出一点当年意气风发的样子。他们拥着被子，谁也没说话，只是用询问的目光看着你似乎在等待着什么答案。显然四宝已经把发生了什么都告诉了他们。灯不停地晃着，满墙的人影也都晃了起来。

过了好一阵你才说：“凭什么呀，让我们狠斗私字一闪念，让我们改造世界观，他却搞修正主义？”接着大家说：“对！凭什么呀？”“他凭什么不让别人碰那些果子？”“他吃得，我们为什么就吃不得！”“谁也别吃，给他连根拔了！”

就在这天深夜，一支神秘的队伍悄悄地出发了。他们是这个点儿里的全部知青。他们要去尝一尝那能益寿延年的仙果，要去拔掉这个修正主义根子！

队伍静静地出了村，居然没有一个人说话，静得连自己的心跳都听得清清楚楚。他们知道此一去面临着凶险，他们仿佛看见那看山的老汉手里晃动着的步枪，可心里却洋溢着莫名的惊喜。

忽然，是谁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在高声吟诗？听得出是四宝，他吟得有板有眼：“月黑杀人夜！”大山那边清楚地送过来由强渐弱的回声：“月黑杀人夜……月黑杀人夜……月黑杀人夜……”。

又是谁有板有眼地接了下旬：“风高纵火天！”那不是你吗？声音这么大，有

点差音儿，把你自己都吓了一跳。是因为胆子太大了，还是因为胆子太小了？你觉得这好象不是你的声音，象是别人的，似乎彷徨，又似乎坚定，似乎怯生生，又似乎肆无忌惮。大山那边清楚地送过来由强渐弱的回声：“风高纵火天……风高纵火天……风高纵火天……”。

山路慢慢地把他们盘旋到了高处，低头望一眼脚下山谷里的村庄，村庄已熄灭最后一盏灯火。人们都在酣睡，为明天的劳作积攒着力气。抬头看一看远处的大山，大山在黑暗中隐去了形状，大山也在酣睡，万物都在酣睡。醒着的只有这几个人，静静地盘旋在蜿蜒的山路上，渐渐地消失在夜幕中。

回来后他们等待了很久，与其说等待，不如说是期待。他们期待着上边追查砍树的罪犯，他们早有决定，只要追查，就主动承认。他们相信自己正义在手，期待着上边把这件事闹得越大越好。几个月过去了，上边没有任何消息，就跟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情一样。他们很失望。

一年以后，他们先后装作患有各种疾病离开了这个山村回到了城里。那句“天塌地陷心不变，扎根农村一百年”的口号却跟那些历年的标语一起永远留在了村口的峭壁上。

数年以后，全国两千万知识青年陆续返城。

【散文创作】

**胡鹏池**

1945年生，江苏人，1968年清华大学精仪系毕业。毕业后先后在山西、江苏、深圳、南京、北京等地工作，当过工人、技术员、工程师、大学教师、政府官员、公司经理等。近十年来，致力于散文创作，著有政史散文、纪实散文、思想评论及非主流叙事作品多种。其代表作有《玉树临风——田家英之死》、《自作孽，不可活！——刘少奇之死》、《故乡如梦》等。他的《清华园的一只蝴蝶——也谈〈良知的拷问〉》《在三个伟人之死的日子》曾分别发表于本刊的第92期和95期。这里刊载的三篇散文，是其历史散文和纪实散文中的重要作品。

林彪素描

林彪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功大还是过大？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知的事，认识并不容易统一。过去虽然有一些结论，但未必能为将来的历史认同。但有些认识是容易统一的，比如说林彪是非常之人，非常之人必行非常之事；林彪还是一个怪人，他的五官外貌——耳鼻嘴眼眉，日常生活——吃喝拉撒睡，工作方式与习惯，都与常人有很大的不同。

如果我是一个画家，一定要画一幅他传神的素描；可惜我不能为之画，所以就写一篇素描似的散文。

一、林彪的外貌

作为一个湖北人，林彪是一只很典型的九头鸟。

林彪的身材瘦小干枯，身高估计在1.60~1.65之间，面庞清癯。在群星璀璨的第一代领导人中，林彪只能算作一名“丑星”。

林彪是那种有阴柔气质的小男人，内向寡言，有明显的女人气。所以，在红军队伍里演戏时他常常扮演的是女角。当他还能被开玩笑时，也只有极个别的人敢

与他开玩笑。黄埔大师兄陈赓常常与他走着走着就将胳膊往他脖子上一勾，戏谑地称“林妹妹”，他总是身体一甩，口中说：“去！去！去！”他不喜欢玩笑，更不喜欢这样的玩笑。但对于陈赓，年龄比他大，资格又比他老，又是没皮没脸的那种人，他显得很无奈。

其实，邓小平的个头似乎比林彪还要矮一点，脸盘子也并不比林彪好看到哪儿去，但邓小平绝不会让人感到有女人味。邓的五官虽然并不富丽却很端庄，身材虽然矮小却很敦实，是一个有厚重质感的矮个子男人。用上海人的话讲，叫“盘子扎得老稳”或称“脚底有根”。据说，西南刚解放时，西南联大的教授吴宓先生曾有缘得识邓小平一面，归来后竟向友人预言说，邓小平骨骼清奇，龙骧虎步，贵不可言，后必为中共中兴之主。果不谬言也！

林彪的脸型有点猴，也有点狐，脸型薄，不厚实，下颌相当尖，有骨感没有质感，说是尖嘴猴腮，有点了，不过没到“獐头鼠目”的程度。也许因为少年时头上长过黄癣的缘故，^①林彪的头颅过早地秃了，没几根毛。九一三后，官方称其为“林贼”，而中国的老百姓全都称其为林秃子。“林秃子”不是一个好称呼，但也不完全贬义，人们由“聪明的脑袋不长毛”，联想到那颗光溜溜的脑袋实在是一座智谋的仓库。

林彪的鼻子是尖的，谈不上“隆准”，相书上叫“通天鼻”；

林彪的耳朵大，没注意有没有“垂珠”。据说耳中有“福气毛”，是贵人相，但毛太短，贵不长。

林彪的腮帮子总是瘦得鼓不起来。传说林彪从东北战场打了大胜仗回西柏坡开会，毛泽东当众开他的玩笑：林彪你吃了那么肥，怎么还那么瘦呀！大家哄地大笑，林彪也尴尬地笑笑，无言以对。毛见状也不敢继续开。林的腮帮子虽然鼓不起来，但刚好配上下陷的双颊，是一种有力量的阴沉。也只有毛泽东敢开这样的玩笑，别人谁也不敢。

林彪的眼睛是小的，且是那种三角型的，眸子漆黑，有精赤的异彩，阴鸷有神。

林彪有两道极其浓黑的扫帚眉，这样的浓眉极少见，立地生威。

^① 林彪的初恋情人是同乡美女陆若冰，遭陆拒绝。晚年陆若冰透露他当年拒绝林彪有四条原因，其中第四条说：“我看不上林彪，青年时的林彪个性奇特，形象太差，特别是他头上长的黄癣，看着很不舒服。”青年林彪“个性奇特”，晚年林彪的个性就更“奇特”了。

林彪说话的声音极有特色。凡在文革中听过他的讲话或是讲话录音的人，几十年后都不会忘记他那特有的声调，那是一种变性了的老女人一般的尖利的声音。即使当着老毛的面做报告，即使在天安门城楼上当着全世界的面做报告，林彪也是拿腔拿调的，总是刻意地把尾音拖得很长、很长，听的人全都不习惯。但谁也不能否认，林彪的声调有一种恐怖和威慑的力量。

如果说，林彪的眼睛表明他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那两道浓眉则是杀伐威武的象征，而他说话的声调则表明这个人是有有点变态的。

就是这样一个瘦小干枯、尖嘴猴腮、通天鼻、福气毛、扫帚眉、三角眼、尖嗓门的“湖北佬”，却是中国当代史极为重要，且魅力无限的人物。他无疑是千古良将，也无疑是千秋佞臣。他有点像汉初三杰之一的韩信，也有点像唐初二十四凌烟阁功臣中的侯君集。但他还是最像韩信，用兵如神，百战百胜，功盖天下，毁誉参半。有反意，有反迹，却并没有行动。他的功败得失将永远是学者们研究的热门课题，他的名字也将永远挂在中国人的嘴边。

二、病中的林彪

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郎中第一次见到林彪是在1966年8月，正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期间。不难考证出，这个时间段应是在1966年8月7日—12日之间。8月5日，毛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已经写好了，林也于8月6日上午回到了北京。此时，凡中共高层的圈内人士都已感到林彪正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炙手可热、如日中天。

有一天，林彪忽然就病了。毛的大内总管汪正要设法接近并结交这位即将钦定的“新太子”，于是拉上李郎中，借口给林看病，一起前往毛家湾。

但李的这段回忆是有问题的，因为林彪从大连回京后住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那里有空调。

当二人刚一走进林彪那宽敞的卧室，却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只见，那位身经百战、功勋彪炳的林元帅，此刻正斜躺在那张宽大的床上。他的妻正歪坐在床头，妻的玉腿垂在床沿下，脚上搭拉着一双皮拖鞋，元帅的光头颅就依偎在妻的怀里，哼哼唧唧地哭着，发出因病痛折磨的痛苦的声音。那位

白皙肥硕的妻正无限温柔地抚着丈夫光溜溜的脑袋，口中喃喃地发出软绵绵的女人的声音，倾情地抚慰着怀中这位大名声的老男人。

经过诊断，林彪得的是输尿管结石，那肯定是一种相当痛苦的病。病人忍受的过程中发生痛苦的呻吟那是极其正常的。但中国人的认识上有一个传统的误区，总是将武将的形象与“关云长刮骨疗伤”联系起来，所以就很难想到这位运筹帷幄、骁勇善战、百战百胜的战神，居然躺在老婆的怀里作孩童般的哭泣及哼唧。即使一般普通的男人也不会如此脆弱的，那只是三四五岁刚刚断奶的儿童们，或是起腻的、让人起鸡皮疙瘩的小男人的行为。

虽然失望，但那是真实的林彪。

三、烟火味最少的人

人类由类人猿进化过程中，最关键的就是火的应用，生食变成熟食，不仅易消化而且易吸收，于是加速进化了。所以，人作为地球生命进化的“终极物种”（笔者自注：这个说法是不科学的，无论是进化或变异都不可能“终极”，人类将来会进化到哪里去？谁知道呢？），虽然几近全能，却无不带烟火味。人人都吃五谷杂粮，个个都要打嗝放屁。一旦拥有财富和权力，私欲更是爆炸式地放大和增长。山珍海味、美酒佳肴，声色犬马，所谓“饮食男女”，所谓“七情六欲，人皆有之”，说来说去，仍然是人的烟火味。但如考察一下古今中外那些长期处于权力宝塔尖的帝王将相、达官贵人之中，大概没有什么人的“烟火味”能比林彪更少的了。

林彪的生活习惯奇特得令人难以相信，他似乎长期处在一个近于“半人半仙”的境界。

林彪怕光、怕风、怕水、怕骤变的温度、怕一切剧烈的声音；怕人多、怕疲劳、怕罗嗦、怕迎来送往、怕人情酬酢、怕正常的礼仪、怕虚伪的客套、也怕朋友、战友之间假模假势的掏心窝子的讲一些什么所谓的“肺腑之言”。林彪几乎不交朋友，同僚、战友、部下大把大把，就是没有什么“朋友”，没有“知己”，连“红颜知己”也没有。办公室里的女秘书估计总会有的，但到不了内室来。能到内室来的，除了叶主任外就是警卫战士，雄鸡头儿。

林彪没有社交生活。对待同僚，他从来也不与陈仲弘之流推杯换盏；也不与叶参座之辈诗词唱往；对待部下，既不疾言厉色，也不嘘寒问暖。至于与部下喝酒谈心之类的事，在林彪那儿如同天方夜谭。部下来了，林总最多也就拿出装炒豆子的袋子往桌上一扔，不咸不淡地招呼一声“吃一点吧”。部下如能遭逢此等待遇，无不屁颠屁颠乐几天。

其实林彪原本也并没有什么“死党”的，他实在不是那种善于结党营私的人。所谓的“黄吴李邱”四大金刚，也只不过是几个战争年代比较得心应手的老部下，在文革初期受到中央文革的迫害，他们的林总将他们从中央文革手中保了出来，这才重新集结，死心塌地的跟着自己而已。他分配他们各掌了一个军种的权力，与他们工作上联系。迄今为止的资料显示，从也没有将“四大金刚”召集到密室里开个“黑会”什么的，更没有将所谓的“谋害最高”、“另立中央”、“叛国外逃”之类的大事，与他们商量过一星半点。

林彪的日常生活与一般人有着太多的不同。许多在常人眼中极普通、通常被忽视的东西，往往却能刺激他的神经，并引起他的恐惧。

在所有的这些“怕”之中，他最怕的却是人类须臾不可或缺的“水”。尽管水是“生命之源”，但林彪却与全人类采取不同的立场。他不喜欢看到直接的“水”，也怕见到“水”的各种物理、化学或有机的形态。因而不愿意看到下雨、下雪以至结冰。他不喜欢喝水，当然他也更不喝酒，无论是含水少的烈性酒，还是啤酒和饮料。甚至连含水分较多的水果，如西瓜，他也不喜欢吃。

他怕看见“水”，一见到水就会联想到水的流动，于是又会联想到“拉稀”，那也是一种水的流动形式。久之，甚至一听到流水的声音肚子就咕咕作响，然后拉稀。虽然在“怕水”这一点上他和常人类是不同的，但在“怕拉稀”这一点上他却是和常人类所共同的。

因为怕拉稀，所以更怕水。他平时尽量不洗手、不洗脸、不洗澡。吃东西后，把手在沙发上擦擦了事，或用干的布或纸反复地擦拭，或是伸出手来，内勤就把这一类事做了。他身材虽然瘦小，手和脚这一类身体的延伸部分却是大的，且是骨感的。这一点和某些人正好相反，某些人个头儿很大，手脚却是小的，且肉嘟嘟。那么高大的个头，肉嘟嘟的小手，肉嘟嘟的小脚，肉嘟嘟的下巴，想着都起腻。

当然，林彪的身体同样也是需要水分的，没有水分的身体是木乃伊，这一点，林彪自己也懂得。因为平时不喝水也不吃水果，于是，他不得不喝粥。虽然喝粥也会有联想，但没有办法，只能用毅力克服。或在吃馒头时，先把皮剥去，然后切成几片，用开水泡着吃。身体所需的水分，就用这样可笑的方法供应着。

因为少量的水分仅只够维持生命的需要了，就没有多余的水分滋润身体，所以身体和面容始终是枯巴巴的。

林彪的饮食堪称老一辈革命家们艰苦朴素的典范。常吃的主食有麦片粥、玉米粥、馒头等，副食是用开水烫过的大白菜叶，不加油盐。有时也吃“蒸肉饼”和“清蒸鱼”，但不吃“红烧肉”补脑子。汤是喝一点的，质量也比较高。

对于衣服和被褥，林彪又有一套自己独创的特殊的严格要求。他丝毫不讲究衣服的款式和质料，更谈不上品牌，而只注重衣服的温度。他认为衡量衣服的唯一指标是温度，并由此别出心裁地发明了“穿衣数字化”。他将每件衣服都设定为一个温度，如衬衫为2度、外衣为4度、大衣为10度——然后根据气温的变化对所穿衣服进行增减。林彪通常不喜欢毛衣，也不喜欢棉衣，天气凉了，他只是将单衣一层层地套上去。他的毛巾被、床单等也都设定了温度，睡觉之前，让内勤先将被褥预热，然后再安闲地入睡去。

林彪的日常生活离不开温度计，就像战争年代离不开军用地图一样。

林彪当然也要拉屎撒尿的。要撒尿了，还是能坚持百忙之中亲自上卫生间。要是拉屎，则又有自己发明的解决办法。由内勤将干净的便盆放在床上，他于是从被窝里爬起来再坐上去，内勤随即用棉被将他包起来，从脖子一直包到脚，只露出一个脑袋在外面。于是林彪在被子里完成一系列的吐故程序，放屁、撒尿、拉屎，一点点风也吹不进来，一点点气也出不去。事情完成后，通常也并不要求更换被褥。元帅一生在枪林弹雨中闯荡，没有那种资产阶级的娇气。伺候他完成这一生理行为的通常是内勤，但他的妻叶群也偶尔为之的，并不嫌弃。说他养尊处优是可以的，但不是穷奢极侈。

林彪房间的陈设，也很简单。卧室有一张棕床，一个床头柜，一把椅子，一个屏风，如此而已。客厅是散步的地方，身体好时，也在走廊散步，那里有一个茶几、两把椅子，走上百十步，坐下来歇一歇。

林彪喜欢看药书，并且自开药方。他不信西医，说西医骗人。

林彪青年时期也是向往过女人的，传说他暗恋过周恩来的干女儿孙维世，看来也是真事。要那件事真成了，林彪成了周恩来的干女婿，那历史就肯定不是后来的那个样子了。但那事终于没能成。林彪与叶群结婚后，总的说来，他对妻子是忠贞的，并没有文工团员，但也并不等于就没有想法。孙维世从苏联回来途经东北时与林彪重逢，林彪就表现得异乎寻常的热心，有旧情复燃的苗头。可惜还没有等到行动，就给那个大嘴巴的李立三搅黄了。除此之外，林彪就再也没有过花边新闻。叶群这个女人不简单，她对林彪看得死死的。

老头子多次放出话来，一再反对当领导的由自己的老婆当办公室主任，林彪对这样的最高指示是不予理睬的，坚持由叶当主任。

文革前，陆定一的老婆严慰冰写匿名信告叶群，说她嫁给林前已经少女失贞。林获悉后大怒，不仅“大义凛然”地为他的爱妻写下了“传诵千古”的“处女证明”，而且在中央的会议室拍着桌子骂陆定一：“老子恨不得一枪崩了你。”与会者全都很害怕，一些与会的老师们觉得林太过分，很丢脸。但林不在乎，为老婆，林丢得起脸。作为一个女人，叶群应当感到幸福了，她得到了她男人的爱情。

四、生活的主要内容是沉思

林彪生活的主要内容是沉思。

沉思之中，他打败了蒋介石的百万雄兵；沉思中，他从中共群豪中脱颖而出、一飞冲天，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沉思中，他的内心纠结于与他43年的老同事、老上级是否要分道扬镳，并选择怎样的时机，采用怎样的方式分道扬镳？

在无声、无色、无风、无光的世界里，这个精瘦如猴般的男人几小时、几小时地静默着、沉思着，如枯木、衰草般孤立，如僧道尼入定般承禅。

他的沉思在老一辈中太有名气了，连一向同是深居简出，话语不多的邓小平也不止一次地说过：“我佩服林彪的沉思和寡言。”

虽说那是在林得势时讲的话，却也是当时的邓小平真心的赞服。

林彪沉思的形式是多样的，所有形式的沉思都是林彪所喜欢的。坐着的沉思（战争年代，他喜欢倒骑椅子，将下巴壳搁在椅背上，盯着墙上的军用地图没日没夜地沉思）、站着的沉思、躺着的沉思、走动着的沉思。

与常人相同的是，他在沉思的时候偶尔也会像一个傻瓜似的自言自语，但没有人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与常人不同的是，他在沉思时既不会微笑也不会叹气。有时，就像一个顽皮的小孩，将一粒炒熟了的豆子，抛进张开的嘴中，然后咀嚼着走上一个来回。当又一个来回开始的时候，他再将一粒豆子以同样的方法扔进嘴中。他的牙口一直很好的，井冈山和江西时期也抽过烟，早就戒了。到64岁的年纪，牙齿仍然又白又硬。

有时，他站在窗前，划上一根加长了的火柴，擎在眼前，火柴燃烧着，闪着豆状的火花，直至火柴棍快将燃尽，将要烧着手指的那一瞬，才慌乱地扔进烟缸中。短促的青烟在缸中只继续冒了一个极短瞬的时间，轻烟缥缈在屋中，很快就没了。缸中剩下一小截弯曲了的、黑色的“烬”，就像多年后他在温都尔汗烧死后那弯曲了的、黑色的骷髅。

黄昏时分，林彪会走到院子里的小道上，边散步边沉思。雨天，他则躲在窗帘后沉思，那浓厚的窗帘，将真实世界的雨隔离了，一会儿他就根本感觉不到了，物我皆忘。此时，他的沉思越发是沉沉的思。

每天，他都那样作五六个小时的沉思，即使睡觉，在梦中，他也不会停止思考。他有时突然从床上爬起来，叫秘书或是自己记录着梦中的灵光闪现，那是他的上帝给他的启示。

他在沉思中最不能容忍任何外界的事物的干扰，突然的干扰会使他的肾上腺素产生一种有毒的物质，这种物质更是转化为一种情绪。

林彪的一生中最不能控制的就是这种情绪。

这种情绪到底是什么？他的妻子说不清，医生也说不清。这种情绪是万分怪异的，虽然并不经常发生，但是一旦发生，就会显示两个非同寻常的症状：一是心悸流汗，二是大小便失禁。这时，这位“战争之神”什么都不能做了，不能看书、听汇报，连吃饭都有困难，只能卧床休息，绝对的卧床休息。轻微时只需要躺下休息一会儿，重时则要休息四五天。要等到一切恢复以后，他才能继续那种沉思的生活。

他没有黑夜也没有白天地沉思着他的问题，在阴暗的屋子里“拉条子”，通过“拉条子”的方式制定着大大小小的军事的、组织的、政治的预案。

他介入政治生活的方式，通常是听秘书讲文件，并由秘书代他在文件上画圈。当他表示同意时，就抡起胳膊在面前飘忽地划上一个大圈子，秘书就在文件上认真地划一个小圈子。如果有话要说，就由秘书记录。他不同意时，嘴一撇说“不予答复”，多半话也不说，只做一个压下去的手势，这就叫“留中不发”。

沉思需要寂寞，沉思也锻造了寂寞。

但沉思绝不仅仅是寂寞。沉思中也有风暴骤起与战马奔腾，忍不住冷落与受不了窝囊气的拍案而起；沉思中“彪式语言”电光竦起，数词堆堆砌砌，副词重重迭迭，那是再无别人能写得出来的华采词章；沉思中有料敌如神、算无漏着、计不虚发的锦囊“神机”；沉思中也有阴郁的等待、无奈的叹息，也有棋错一着，满盘皆输的悔恨。

公元一九七一年的九一三，那个黑风高的晚上，林彪已经吃了安眠药，却匆匆忙忙地离开了给他带来无数光荣和梦想的中国。

这是他一生中最最没有“沉思”的盲动。

及至飞机上了天，或许安眠药的药性在发动机的轰鸣中渐次退去之时，林彪又能有限的恢复“沉思”了，然而——飞机炸了。

五、毛家湾的皂角树

林彪的主要住所有三处：毛家湾、苏州的别墅和人民大会堂。

春天时他喜欢住在苏州，江南的春天就像少女的脸，那一种恬静、文雅而活泼的风情最是令人神往了。曾经年轻过的林彪不可能不喜欢江南，有时他甚至在苏州一直呆到秋天的来临。

夏天天气炎热时，他和其他大人物一样，往往会住到人民大会堂，独自盘踞在一个空调房里住上两三个月。

他习惯住浙江厅。那是一间长方形的大厅，面积不亚于一个篮球场。两架高大的屏风伫立在门的前端。屏风里的一面绣着孔雀开屏的图案，外面则是放大的毛泽东诗词《满江红》的手迹。大厅的整面墙壁都被墨绿色的金丝绒帷幕掩住了，沙发是大红的，各种华贵的吊灯和壁灯照射着这个密封而高贵的世界。因为临时客居的主人并不喜欢灿烂辉煌，它们难得有全部打开的机会。

林彪来了，他的微型秘书班子也在这里办公。每天这里都在重复不变的情景：为数不多的几名工作人员进进出出，轻重不同的说话声，缓急各异的电铃声，咳嗽声和风格不同的脚步声交织在一起。

林彪在这里要过滤从五湖四海汇集来的消息，他必须和必须的高层人物交换必须的意见，他不得不随时理顺与中南海、钓鱼台的关系。他在这儿下钩子，起钓，扑杀、屠宰；纠缠与和解，冲突与松弛，倾斜与平衡，上层的勾心斗角与平民的温饱生死，从瞬息万变的世界风云到花样翻新的鸡毛蒜皮丑闻逸事。常言说：侯门深似海。这个海整天都浪花翻腾。那些车队的司机、厨房的师傅、分管各种事务的秘书和管理员，整天都是忙忙碌碌的。

秋天天高气爽，北京的秋天更有别处难以比拟的神韵。林彪与叶群一起回到毛家湾，这里才是他真正自己的家。虽然这里没有香山的红叶，但他尤其喜欢毛家湾院子里那几棵高大的皂角树，那螺旋状的褐色的大皂角在树上密密地悬吊着，林彪隔着玻璃窗在屋内窥视着它们。风大的时候，皂角摇晃着碰撞在一起发出阵阵的响声。

在所有的声音中，林彪最喜欢听也尚能听的就是这种声音。这种声音不是沙沙的，不是飒飒的，也不是当郎当郎的，而是介于几者之间。这声音有一种亮丽、有一种圆润，有一种立体声，有一种金属的质感，似乎那是年代遥远的战场上声音的回放。虽然也不像，但有那么一点儿意思。就那么一点儿意思就能使人产生弥足珍贵的回忆了。

林彪站在窗前，聆听着，也沉思着。他虽然喜欢听皂角在风中摆动相撞产生的声音，却不能接受驱使皂角摆动的风。风小了一点，皂角虽然摇晃却因摆幅稍小，互相不能碰撞，或是虽然碰撞但并不激烈，因而也不能发出声音。这样的時候，风虽然小到他能接受的程度，但皂角的声音又没有了。

他平静地叹了一口气，不由得学着老蒋的口气骂了一声：“娘稀匹！”人生哪有两全俱美的事！

夕阳西沉后，长夜未临前，有一段白天和黑夜交接的过渡时光。当落日余晖尚存些许，几不能清楚地显示物体的轮廓之时，那风和光的度数就是适合于他的，这是他一天之中唯一可以走出寝宫散步的机会。

没有皂角响的日子里，林彪就注视南边那一柱烟囱里冒出来的烟。

毛家湾四周都是高墙。东边是一家医院和解放军总政治部，向来安静。北边是地安门西大街，但平常车子少，噪音也不大。毛家湾北部并不临街，它的邻居是解放军出版社，即平安里三号。当时有人曾要设立 115 路电车，终点站就在毛家湾和平安里三号之间，但没有得到毛家湾的同意，原因也是声音。西边是一些民房，要走好远才达到西四北大街。那些民房通常是非常安静的，居民吵架事常有，但声音传不到毛家湾来。南边更安静，如果不是茅屋胡同那里有个解放军出版社，来往的人就更少了。

就在毛家湾和大红罗厂大街之间，有一家小工厂。工厂里有个烟囱，一天到晚都冒着懒洋洋的半黑半白的烟。当那烟囱里的烟如能垂直地向正上方升三四米高处而不发生倾斜，表示那天风的大小也是恰到好处的，也是林彪可以散步的机会。

当年，全中国的人民都在高呼着“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敬爱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的时候，当中国最杰出的大学清华大学的七千学子高唱着用林彪语录谱成的《四一四战歌》，同样杰出的另一派一万多清华学子们则称其为“完蛋歌”：

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敢于牺牲，上战场，枪一响，老子就下定决心、下定决心，今天就死，今天就死在这个战场上。

他们唱着的骂着的时候，他们没有一个人知道这首词的主人在同一座城市里，蜗居在斗室中过着如此这般平淡、寂寞的，不革命的生活。如果他们知道了，或许他们就不唱了，也不骂了！

为什么呢？没意思！太没意思了！但这仅仅是或许。

太平淡了！或许正因为太平淡，才太不平淡了。

【散文创作】

一个地主儿子的大学梦

我说的这个地主的儿子就是我的二舅舅。

二舅舅生于 1935 年元月，那几日，天气特别的冷，彤云密布，北风呼号，天寒地冻，大雪飘飘，且是早五更，那年是狗年。

这是外祖父的第五个孩子了，前三个都是女孩，终于第四个生了个男孩，家中大喜。这不，第五个又生了个男孩，按说也是大喜呀，然而外祖父却一点也不高兴。

刚吃完早饭，外祖父就准备出门了。外祖母躺在床上呻吟着说：“他爹，你不看看孩子啊？”

“有啥看头？”说着就头也不回地离家外出了。

外祖母这辈子生了七个孩子，四女三男，前三个是女孩，接着三个男孩，收官之作又是一个女孩，我母亲是老大。

外祖母的生育太有规律了，三年一个。生老么时，我母亲已经出嫁，第二年就有了我，所以小姨才比我大一岁，二舅舅比我大整整十岁。

周家是祖传的大户人家，良田几十亩，房屋几十间，子女多一些，也完全不愁吃喝开销，外祖父不喜欢老二，实在是没有理由的。

“腊月，本来就天寒地冻，又赶上大雪，又是五更天，冷上加冷。早更头出门的狗，家家人家门户都没开，哪有一根肉骨头，只得自己吃狗屎了，一辈子的苦命。”外祖父后来对家人这样解释了他不喜欢老二的理由。

既然注定是苦命的孩子，那么当爹妈的就应给多一些关爱吧？外祖父却不是这样想的，这个脾气古怪死板的人一辈子都对老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喜欢”。

解放前，外祖父长年在外给资本家的二姐夫打工，一辈子没有种过地，没有经受过农田劳作之苦，但同时也没有收过租。因此在解放后没有被评为地主分子，相反被当作职工安排在另一个乡镇的供销社继续工作了两年，最后又因家庭的地主成份被解雇回家。

外祖父丢了工作回到家里来，没有一分钱的退休工资。他在这个家没有地位，家中的大事小事都是由外祖母作主。他的儿女们可怜他们的母亲一个女人家顶了地主分子的帽子挨批挨斗，受苦受难，于是全都同情母亲，都是母党了。

其实，比较外祖父的三个儿子中，老大太老实，老三太木讷，就数这个老二长得最俊秀，最聪明。我现在回忆二舅舅青年时的形象，身材适中，脸部轮廓分明，大眼睛，高鼻梁，无论外貌上还是气质上都是最优秀的了。

二舅舅开学晚，直至50年才小学毕业，正是那年家里被评为地主了。

二舅舅长啸一声：“完了！完了！一个粪袋子背背上，像一件湿布衫，永远脱不下来了。”

可不是吗，这个粪袋子从49年到80年代中期，一背就背了三十多年，历经三代人，祸及十余家，殃及百余人。

第一代，外祖父与外祖母，以及他们的兄弟姐妹；第二代，我的父母亲，我母亲的弟妹们，以及他们的配偶；第三代，我这一代，我的弟妹们，我的为数众多的表姐妹们。

当然，第三代所受的影响相对小一些，但也是很明显的。比如我，因为外祖母是地主，在考大学时就根本不敢报考清华的保密系保密专业，上大学后也迟迟不能入团。直至64年的九评学习运动中，我写的思想汇报将地主阶级的外祖母家对我的坏影响彻底地清算了一遍，这才感动了组织，终于混进了团内。

第一代所受的就不能用“影响”这两个字来描述了，他们受到的是鞭笞与奴役。土改时，外祖母被五花大绑地押上台批斗，一个表现积极的乡村流浪汉打了她五个大嘴巴。58年民主补课时，又一次遭到批斗和关押，又遭了一次打耳光，放出来后扫地出门。平常日子也要不时的参加四类分子会议，聆听训话和无端斥责，还要经常去扫大街。

但第一代的人毕竟老了，影响最大的是第二代。而第二代中，影响最大的又是二舅舅，影响最小的是大舅舅。

大舅舅生得早不如生得巧，土改那年，已经高中毕业，那时招生工作中的阶级路线还不明显，所以他考上了大学。大舅舅考大学的那年，因为家中已被评为地主，经济情况一落千丈，家中决定只供大儿子考大学，老二嘛，上了小学也就够了，让他下地干活吧。

大舅舅果然考取了上海交大，遵照家庭的要求，他考的是两年制大专，而没敢考四年制本科。他要赶紧出来工作，挣钱养家。

二舅舅原是一心以大哥为榜样，一心要上大学，但他无法改变家庭的决定，气愤而绝望地撕掉了毕业证书，扛起锄头下园子干活了。

二舅舅从小身子骨儿单薄，力气小，可人聪明，锄地、播种、施肥、收割，他样样活儿都行，搭个黄瓜棚子、丝瓜梯子什么的，也不用学，一看就会了。春天，他在屋后种了几窝南瓜秧，夏天，他捉上了十几个蛤蟆青蛙的埋在根旁，秋天，他又爬到屋脊，用绳网小心地把南瓜兜起来。每年都是南瓜大丰收，屋檐下排了长长的一溜儿，最大的竟有四十多斤重。春夏两季的夜里，他打着手电筒在河边插上几十根钓鱼竿，第二天清晨起竿，一准儿能收三五斤鳊鱼，家里吃不完，就上集市卖，换几个零用钱。冬天下了雪，他用一根带线儿的竹竿把一个网筛在雪地里撑起来，远远地稀拉拉地撒上一撮米，引着鸟儿一边啄食，一边就一蹦一跳地走进网筛的下方，然后把绳头儿一拉，用这样的法子罩上个俊鸟儿玩。

外祖母说：“这个老二啊，学啥会啥，做啥像啥，真是个七巧玲珑心。”

读者们看过梁斌的长篇小说《红旗谱》吗？那书里有一个主人公叫“运涛”，二舅舅就像“运涛”，心灵灵，手巧巧。

但是，二舅舅的心思仍然不在种地上，鱼儿鸟儿、瓜儿藤儿，都拴不住他的心，他转前转后还是要上学。可他知道家里没有钱，于是决心自己去挣钱。务农两年后，他开始行动了。县里招聘小学教师，他去考；供销社缺会计，他也去考——短短一个月报考了三四个单位，结果全都被录取了。

他选择了去小学当教师，工资虽不高，但能边教书边复习。两年内他积攒下了一笔钱，有了这笔钱，他要报考中学了。可是小学的毕业证书已经没有了，他向一位同族的学生借了一张毕业证书。那人的名字与二舅舅只差一个字。为了上学，二舅舅就从此改叫那人的名字了。家里人叫他考中专，中专三年，可以很快出来工作，可他偏要考初中，目的上高中、上大学。结果，他如愿考取了市二中。那年，他已经十八岁了，才上初中一年级，是班上年龄最大的大龄生。

初中三年，顺风顺水，年年是优等生，入了团，一直当班长。初中毕业时，他被学校作为特殊优秀的“三好生”保送进省立高中。到了高中仍然年年是优等

生，仍然一直当班长。高中的班长不叫班长，叫“班主席”了，我一听这名儿就觉得他真了不起。

二舅舅的年龄虽然比我大十岁，但我开学特早，他开学特晚，小学毕业后又被耽误了好几年，所以，他只比我高三届；他初中毕业上高中，我小学毕业上初中了。我的文化水平已经足以看得懂他的日记和作文，也基本上听得懂他与同乡同学之间的大部分谈话。我记得他们谈论过苏联的保尔和中国的保尔，谈论过冬妮亚，谈论过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和涅伦斯基，聂赫留道夫——我在暑假看过他带回来的全部小说，还常常偷看他的日记和成绩报告单。我至今仍然记得他在日记上常常写一些诗，如一首“白浪歌”，我至今只记得开始的四句：

大海无边，
白浪滔天，
一叶小舟，
逐浪颠波。

还有长篇的“荷花赋”，诗好诗坏不去说它，反正都是励志的。

看了二舅舅的成绩报告单，他大概属于上游里的下游或是中游里的上游这样的位置。比起我的各科成绩都在90分以上的成绩还是要差很多。我也能理解，作为一个大龄农村学生，这样的学习成绩已经不错了。在班主任评语的一栏中，一般都是赞誉的话，但最后都有一两句莫名其妙的话让我看不懂。比如有一学期的评语最后写道：“希望今后要克服人生几何的消极人生观”。什么叫“人生几何”？那时我就不懂。又有一学期写道：“希望今后要注意克服我行我素的生活态度”。什么叫“我行我素”？我也不懂。只知道这都不是什么好话，大概就是“资产阶级人生观”、“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之类的。

虽说如此，二舅舅在初高中时期的人生轨迹总算是向上的。

而就在这时，他人生中一个最重要的拐点出现了，从此他的生命轨迹就不可逆转的向下了。

就在他高中三年级的上学期，家中又出事了。

1958年的秋天，反右派运动刚结束，大跃进开始了。到处都是东风吹，红旗飘，右派分子土崩瓦解，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却正在此时又无端搞了一次“二次土改”。年已古稀的外祖母又被押上台斗争了好几次，更为糟糕的是被扫地出门，祖宅被全部没收了，外祖母和大姨只带出了一点点日用品和换洗衣服住在茅屋里。而家中所发生的这一切，在城里上学的二舅舅却还蒙在鼓里。

一个星期天，我上城里去，大姨交给我一个纸条，让我交给二舅舅。我到了校门口，可是传达室的工友对我说，他们在上复习课，让我把条子留下来，由他去转交。我年纪小，没长心眼，就把纸条留下走了，没想到这张纸条子惹下了大祸。这名工友将字条打开看了，内容是说家里已被扫地出门了，叫二舅舅暂时不要回家。这位有觉悟的工友将纸条子交给了校团委，一位姓庞的团委副书记立即发动了一场对二舅舅的“大批判”。

在关系到阶级立场的大是大非问题上，班上的大多数同学都纷纷起来揭发批判了。

这其中就出现了两个比较关键的人物。

一位就是同乡的同班同学龚，他在组织的召唤下，将二舅舅改名字的事情揭发了。这是爆炸性的新闻，立刻引起轰动：原来这个与他们同窗三载，长期窃取“班主席”要职的人居然是个化名。老师和同学们都同仇敌忾声讨二舅舅欺骗党、欺骗组织的罪行，那些经常阅读反特小说的同学更将改名字的行为说成是特务勾当，甚至怀疑二舅舅就是特务了。

二舅舅后来说龚同学是公报私仇。龚在高一时偷了食堂里的饭菜票被当场抓住。二舅舅是班主席，开班务会处理了这件事，虽然也不过是批评一下了事，可龚同学从此入不了团。

说起龚同学偷饭菜票这件事颇搞笑。龚在早晚打稀饭的时候，故意将饭盆子放在桌上有粥溅出来的地方，然后再往有饭菜票的地方移动，这样在将饭盆拿回的时候，饭盆底就很自然地沾上了几张饭菜票。他用这个办法屡屡得手，也不究竟干了多少次。终于有一次被他身后的邻班同学检举，当场抓获。

龚同学因为检举揭发受到表扬，但他仍然入不了团。

另一位就是那位贫下中农出身的大脸盘子的团支书，她一向暗恋着二舅舅。二舅舅虽也知道她的心思，与她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但他的心里其实爱着另

一位女生，她比她漂亮，比她年轻，比她温柔，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有女人味，且也是一个成份不太好的，虽然也是团员，却不是班干部。团支书觉察到二舅舅的感情倾向，心中很痛苦，也很矛盾。当批判一开始，她的内心是矛盾的，态度也有点暧昧，他毕竟是她爱的人。随着批判的深入，揭发的材料越来越多，尤其是当改名字一事被揭发之后，她终于摆脱了个人情感，去除了认识上的迷雾，于是她“觉悟”了，终于站了起来揭发批判她所爱的那个人身上的种种地主阶级的烙印。

团支书态度的转化使揭发批判升级了，但再升级能升到那里去呢？与一两个女生保持一种暧昧的关系难道算什么错误，但在那个年头就可以上纲为“思想意识腐朽，道德品质败坏”，再加上阶级立场反动，于是二舅舅受到开除团籍、撤销班主席的职务、留校察看三种处分。

我始终没有确切的知道这一切的导火索是否是那张纸条子。但后来，大姨和我母亲都曾经就这件事一再责怪我：“你怎么这样不懂事？这样重要的纸条子没有交给你二舅舅本人呢？”

“可是，大姨也没有告诉我写的是什么呀”！我虽嘴上辩护着，心中却感到无限的内疚。

“算了，一个小孩子家懂什么？”倒是二舅舅从来没有埋怨过我。

这件事对我的刺激太深了。多少年了，我仍然认为这是我一辈子中做的最愚蠢、最错误的事情之一，我对不起我的二舅舅啊。

59年，二舅舅高中毕业，可以预料，考大学是完全没有指望的。但是，二舅舅却不死心，第一年没有考取，第二年又考，第三年还考，终于在1961年春天考取了“北京铁道科技学院”春季班。

他的父亲看到了他的成功，颇为欣慰。虽然，他还不太相信这是最后的结果。这父子俩虽然一辈子也没有温情的时候，但在内心的深处早就和解了。

二舅舅赴京数月后，外祖父饿死了。他从59年起就一直没有吃过一顿饱饭，最终得了浮肿病死了。二舅舅从北京写信回来表示了哀悼和悲痛。

二舅舅的信中说，他那个学校非常大，起码有20个高中那么大，是培养铁路工程师的摇篮；他说他有助学金，不需要家里多少负担。有一封信中，二舅舅对前途作了美好的展望：毕业后将分配在铁道部门工作，在铁道部门工作的人有

一项特殊的优惠条件，一年有两张免费的火车票，所以他每年都可以把娘接出来玩一玩。二舅舅还说，党和政府没有对我这样的剥削阶级出身的子弟另眼看待，培养我上了大学，我一定要努力学习，毕业后报效党和人民——这样的话在每一封信中都有。

二舅舅的信是我每封必看的，每次看了信，都很激动，脑子里幻想着一个有为青年，正在首都北京美丽的高等学府里刻苦攻读的情景。我为二舅舅感到高兴和骄傲，他的坚持不懈的奋斗精神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

然而，仅仅半年多，命运却又一次无情地粉碎了他刚刚开始梦想。同年秋天，国家以经济困难为由，解散了一批大专学校，二舅舅所在学校也被解散了。

消息传来，全家人都被这晴天霹雳惊呆了，外祖母喃喃地说：“死鬼早就说的，二侯一辈子的苦命。”外祖父在二舅舅出生时说的话，仍像咒语般笼罩在全家人的心头。

二舅舅没有直接回家，对惨遭遣散的命运，他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在悲痛欲绝的情绪下，他打起简单的行李去了西北。经过西安，他去看望了在那里工作的大哥。他的大哥大学毕业已经七八年了，独立支撑着这个地主阶级家庭的劫后余生，每个月工资的三分之二都寄回家里来。三十已过，老婆也找不着，皮鞋没有第二双，衬衫没有第三件。

二舅舅更痛苦地认识到地主成份，这只湿漉漉的粪袋子的杀伤力，它是永远背在自己的身上，是再也甩不掉了的，终其一生，负篋而行。他有了“一死了之”的念头，他想要在死前去看看沙漠，再去看看大海。他继续西行，到了兰州，到了天水，到了乌鲁木齐，他在那里看到有很多内地来的汉人在拉沙子，于是他也去租了一部架子车，做起了拉沙子的苦力。

沙漠的飓风卷起沙子，带着自然的力量击打在肌肤上，产生一种淋漓的痛楚。稀稀落落的拉沙子的个体，在茫茫大沙漠里就像一只只蝼蚁，二舅舅有了一种众生如蚁的感慨。既然，大多数人的生活都是如蚂蚁一样，自己又如何能不一般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二舅舅由此获得了活下去的勇气？

半年多后，他回来了。他既然决定不死了，也就没有再去青岛看大海。

二舅舅回乡后，仍然没有老老实实地干活，仍然复习功课考大学，仍然要与命运作奋斗。

62 年夏季，他刚从西北回来，没有参加那一届的高考。

我就是在这一年高中毕业考取了大学。

63 年，他和我的第一年没有考取大学的初中同学曹 XX、小学同学施 XX 一起复习功课，参加高考。这一年，曹考取了，施和二舅舅都没有考取。

64 年，他和施一起复习，参加高考，施考取了，二舅舅仍然没有考得取。

65 年，二舅舅还准备再考，报名处的人说你还考什么考，都三十岁了，不允许了。他哀求，没用，这是上级的政策。

二舅舅就这样绝望地终止了他的考大学的努力。

从 59 年到 65 年，长达六年，五次高考，甚至还有一次是真正地闯进了大学的殿堂，终于如南柯一梦。

请问，看到这篇文章的朋友们，你们的亲戚朋友中可曾有人创造过这样的记录？用怎样的词语形容我的二舅舅为了他的升学梦所付出的悲壮的努力，我想了八个字：精卫填海，杜鹃泣血。

大学梦想做也做不下去了，熬尽了对生活的希望。

年过三十，还未成家，外祖母和所有的亲戚都劝他找个对象吧。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二舅舅无动于衷。他说：“结了婚，就要生孩子，家里这样穷，自己一张嘴都糊不饱，哪有本事养家活口。有了孩子，就得让他们上学读书，养儿不读书，不如养头猪，可哪有经济能力供他们上学读书呢？”

“养儿不读书，不如养头猪”，后来成了乡邻们的口头禅。

西街头是出产名言的地方：“破窑里烧出的好砖头”算其一，“屁股能打人”算其二，这句“养儿不读书，不如养头猪”算其三。

二舅舅在 36 岁那年，终于结婚。家里房无一间，地无一垌，又是地主成份，又是大龄，哪儿能找到周周正正的媳妇呢？但是一个三代贫农的老姑娘主动地找了他，这就是我的二舅妈了。二舅妈人长得丑一点，家中一样穷，只有小学四年级文化。谈不上什么般配不般配的，大家都是没法，“爱情”两个字就免了。我这样写了，将来二舅妈和那几个表妹看到了，肯定会不高兴，但那是事实，我先道歉了。他们生了三个女儿。大女儿虽说书读得并不甚好，但人还算精明，智商在正常范围，勉强上了高中；二女儿则是弱智，长大后勉强能生活自理，读书识

字就无从谈起了；只有第三个女儿眉清目秀，比较聪明。二舅舅就把上大学的梦想全部寄托在这个小女儿身上了。

毛的时代终于过去了。八十年代，政府终于将外祖母“地主分子”的帽子取消了，还发还了三间生活用房，表示了对“二次土改”的否定，于是二舅舅有了点老树开花的运气。他当了民中的校长，有了在农村里看起来不算太低的工资，加上地里的收入，日子过得还可以了。学校里又有一个年轻的女教师和他相好了，那姑娘文明开放，爱二舅舅爱得有点昏天黑地，胆子也大，脸皮也厚，二舅舅又吃得住二舅妈，公然登堂入室，明铺暗盖。为此，二舅妈跑到我妈面前来告状。二舅妈是个直呆子，她告诉我妈说，那小婊子年方22，刚从学校毕业，个头儿不算高，皮肤好得不得了，像粉团儿似的，一笑两个大酒窝，两只眼睛汪汪亮，忽闪忽闪的。二舅妈还感叹地说，那小婊子真少嫩啊，要是我是男人也熬不住。我又长得丑，又老了，你家老二和那个小婊子戏戏，我也没太往心上去，只是不能不要这个家，不能在子女们面前不要这个老脸。我妈安慰她，你是贤惠的，你是在老二最困难的时候嫁给了他，又生了三个孩子，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这一点我们姐妹心里都清楚，你放心好了，我一定去劝住他。要是他和那姑娘好上个三天两头的，也就算了，要是真要和你离婚再和那个姑娘结婚，这在我们周家是办不到的事。二舅妈说：“还是大姐姐懂我的心，我就指望大姐姐了。”

过了几天，我妈就要我陪她下乡去劝说二舅舅，我们说了一大箩筐的规劝的话。二舅舅默默在一边抽着烟，长久地不说一句话，末了说：“大姐姐，你放心，我这就断。”我妈说：“断了最好，要是断不了，多给她一些钱，这钱我给你出。”二舅舅说：“那也用不着。”

说断其实没有断，只是更隐蔽了。他们的关系又继续维持了好多年。这期间，二舅妈也没少了和他吵架，也没少了向我妈告状。我妈却口风有了变化，又是开导又是教训她说：“男人有时要遭桃花运，运来城墙也挡不住的，过了那阵子，又是好人似的。女人要沉住气，只要把子女带好了，拢在自己一边，对男人的花心不必太在意，他们自己就会回来的。再说，你自己也不好，女儿你生了，可是你动过心思教育了吗？你没工作，自留地你好好种了吗？地里的活还得老二做，你一天到晚只知道赌钱，饭一吃，碗一推就二五八饼，自己不挣一分钱，还得老

二给你赌本，有你这样当老婆的吗？有你这样当娘的吗？”二舅妈给说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说不出话来，就快快地走了。

我对母亲说你这是公开拉偏架啊！母亲说，我们姐弟，老二命最苦，我不护着他，谁还护着他。说着眼泪就下来了。

吵吵，吵吵，那姑娘终于出了嫁；吵吵，吵吵，二舅舅人也就老了，事情也过去了。花心就像一盆燃尽的火，不知不觉就灭了。

人是很怪的，只要有机会，青年时期的梦，总要顽强地圆一圆的。

那么顽强的大学梦，最终在小女儿身上圆了；在那姑娘身上圆的是青春梦。有了这两样，二舅舅的人生也总算得到了一点补偿。

95年，二舅舅家的三姑娘考取了大学，2000年大学毕业，分配在银行部门工作。二舅舅那年才开始考虑要盖房了。改革开放后，四邻八舍都早已盖了新房了，可二舅舅一家还住在三间平房里。又三年，楼房终于盖起来了，我去看过，两层三底，很不错。盖房后一年，三姑娘结了婚，女婿是部队上的一个小军官。二舅舅在乡下和城里两次办酒席，城里的那次我去了，二舅舅和我说了几句话，大有点一生之事了矣之感。

又两年，二舅舅得肺癌逝世，享年仅七十二岁。

这个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人，这个长得像刘德华的人，这个聪明得像运涛的人，这个引领我考清华的人，这个引领我看《红与黑》、《约翰·克里斯朵夫》的人，这个六年中参加了五次高考的人，这个说过“粪袋子、湿布衫”、说过“养儿不读书，不如养头猪”的人，这个填海的精卫，泣血的杜鹃——就这样永远的没了，我心中的悲愤实在不是这篇短文所能表达得出十之一二的。

【散文创作】

李楞子与外祖父

——一个贫农鳏汉与一个地主老头的故事

李楞子的话核儿

李金安，四十出头的人，因为口吃，大家都叫他李楞子。

李楞子中年丧妻，家中只有一个老娘和一个女儿。老娘七十多，在三年大饥荒前，老人家的身子骨是硬朗的，耳不聋，眼不花，手脚利利索索，把个穷家里里外外拾掇得干干净净。女儿水琴，大约只比我大三岁，长得跟李楞子一个模子，马脸，长胳膊长腿，说话，走路全没有一点女孩子的模样，胸脯也是平平的，一副老雄鸭子般沙哑的嗓音。听大人们背后说起，这水琴是个“石女”。“石女”的概念我小时候是无从得知的，那时候的理解大概也就是虽然是女人，但又不是女人的意思。水琴大概只上了小学三年级，就跟着李楞子走乡串户爆玉米花。

李楞子虽是马脸，却五官端正、眉清目秀，皮肤很白皙。老娘活着时，他的衣衫一向都是整洁的。他是西街头为数不多的识字人，脑子里装着不少章回小说和陈年戏文。但他口吃得很厉害，他是不能讲故事的。但唱戏时却一点也不口吃了，因此他常唱戏，常看见他坐在那里一只手拍着大腿，闭着眼睛，摇头晃脑地哼着：“一马离了西凉界，不由人，一阵阵泪洒胸怀……”

我觉得他唱的戏文很有韵味儿，很伤感的。他还唱：“未开言，不由人牙根咬恨，骂一声毛延寿你这卖国的奸臣……”听那词儿，应是情绪激烈的，李楞子却唱得平静如水。他有时又将这“骂毛延寿”的唱词改成了“骂蒋介石”：“未开言，不由人牙根咬恨，骂一声蒋介石你这卖国的奸臣。你也是中国人，怎好像是外国生，却拿着美国的武器来杀我中国人……”我小时候跟他学过这一段，现在就记得这几句。

人常说“矮子鬼大，楞子话多”，李楞子不是这样的。他是一个沉默寡言之人，但偶尔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一言半语，总是不阴不阳，有骨头有肉的，叫人吧

咂半天，才好不容易捉摸出“话核儿”来。真让人联想到潘长江的经典语言：“浓缩的都是精品”。

上级号召合作化，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他说：地倒是化在一起了，可人心咋能化到一起呢？人心化不到一起，地化一起，白搭！不如不化。要化，也是穷化。

公社化时时兴一句标语：“人民公社是金桥，共产主义是天堂”。李楞子说：不就是换了一个木头疙瘩（图章）吗，怎么就能上了天堂？

队长常新万召集各家各户开会，限制每家最多只能养两只家禽，养了鸡不能养鸭，养了鸭就不能养鸡，不许去自由市场卖鸡蛋鸭蛋；可以养一头猪或一头羊，也只能挑一种养养；不许在自留地以外开十边地，自留地也不许种经济作物，不许种西瓜与香瓜，种点土豆、番瓜这类代粮品还是可以的，种点蔬菜与粮食也还行；不许吃青蚕豆，不许吃嫩玉米，不许吃青麦冷蒸；更不许外出去桐州、上海跑码头……

当然这些政策也不是一次性齐活的，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不断细化的。

所有这些政策当然也不是新万制定的，但都是新万传达的。新万既不贪污也不夸大，传达后也都是由新万监督执行的。

新万说这叫做“割资本主义尾巴”，这在五十年代末还是新名词，大家都是乡下老农民，听了一般都是“唉”的一声叹口气，最多也就说一声“政策又紧了，叫人怎么活？”

新万并不十分计较，执行起来也不是很严格。

但有一回散会时，李楞子捧着水烟台跟在新万的后面走出门，笑着说：

“队……队……队长，队长，可了不得啦！你屁股上长了一条狗……狗尾巴！”

新万说：“楞子，严肃点，又拿我开心是不是？”

惠琴姑娘是一个一向好与新万作对的老姑娘，她一手拿着针，一手拿着正纳着的鞋底笑着说：“队长，别听他的，你的屁股上没有长尾巴！”

曹大金与常新万一样都是三代贫农，但新万当了干部，大金只当了个贫协代表。新万把持着党支部，大金连党也入不了。他一向就不尿新万，不放过任何讽刺挖苦的机会，大金说：“惠琴，这话也用不着你来说，常队长是个人又不是狗，他怎能长出狗尾巴！”

新万没反应得过来，李楞子却一本正经地说：“队……队长，我要向你请教一个问……问题？”

新万说：“你说”。

李楞子说：“狗……狗长狗尾巴，猫……猫长猫尾巴，人不长尾巴。人要是长呢，也是人……人尾巴。为什么？种头不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也是种头……种头不对，社……社会主义怎么会长资本主义尾巴呢？这个道理我们不……不懂，劳烦队长你给我们讲讲……讲讲明白。”

新万这才听明白了，气得朝他直翻白眼：“好你个李楞子！你敢对抗上级号召？我要向上级汇报。抓你个现行”。

孙大爷出来打圆场：“新万，他也就怎么一问，你呢就这么一听，犯不着生气。你是党的人，社员政策上的事不明白，问问你也是应当应分，你怎么就要抓现行呢？”

新万气鼓鼓地回头瞪着李楞子，眼珠子都要爆出来，蹦出一句话来：“过后再和你算账！”

李楞子笑嘻嘻：“别，别，别……我好怕唷！”

外祖父与李楞子的春联

农业合作化前，广大农村的春联都是千百年前的老祖宗留下来的，比如：

生意兴隆通四海

财源茂盛达三江

喜看红梅多结籽

笑见绿竹又生枝

合作化后，乡村越来越革命化了，这些传统的春联没有了。每逢过年，家家户户贴的春联一般都是“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喝水不忘掘井人，翻身不忘毛主席”，横眉离不了“社会主义好”、“人民公社好”、“毛主席万岁”等。

外祖父算是乡间的一个“宿儒”了，写出来的春联与众不同。如厨房门前是：

青菜菹子饭

天水菊花茶

带有恬静的田园风味和悠然自足的平和心态。虽然也有一点地主阶级的闲情逸趣，但总不能说反动吧，称赞的人就很多。

又如东大门则是：

润泽东亚毛主席

布德中华朱将军

这副春联越发好了，对仗工整，又很巧妙地将毛泽东和朱德的名字嵌于其中，歌颂了共产党的大领袖，表达了对新政权的归化。外祖父那一笔魏碑体更是苍劲有力，乡亲们一致叫好。那时“阶级斗争”的弦也不是绷得很紧的，乡里的书记、乡长们，也不避嫌疑地特地请外祖父写了同样的对子贴在自家的门上。县上来的干部到书记、乡长家吃喝，也都对这副春联赞不绝口，于是又传到了县上，只是没有人知道这原出自一个“准地主老头”之手。

外祖父写这些对子的时候，我常在他身旁磨墨，我也觉得非常好，只是不知道究竟是外祖父在外面抄来的，还是他的原创？

但是，真正在乡间出风头的春联，还得首推李楞子。

有一年，他写的春联是：

自有天做主

何必人操心

横批是：太公在此，百无禁忌

又有一年，他写的对联那就更出格了。

上联：人人都吃五谷杂粮

下联：个个都要打嗝放屁

横批却是：社员都是向阳花

歪歪扭扭一笔臭字，引来许多人围观。

几个有点墨水的乡邻们捧着水烟台，聚在他家的大门前，那一通研究、评论，那一通笑啊，甭提有多开心。

杂货点的张茂先生也是乡间一儒，他摘下老花镜远远地看道：“字不好，意思好，人生大道理！”他捋着下巴上的胡须不住的说：“人生大道理啊！”

按当时的政治环境，这几副对联都含有对现实的不满情绪。可是村干部来看过了，乡干部们也来看过了，都默默地来，也默默地走了，谁也没放个屁。

李楞子当街捧着水烟台，吹着煤纸捻儿，目送着乡村干部们的来来往往的背影唱道：“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空翻转，却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

这副对联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它让我懂得，吃饭穿衣、打嗝放屁、拉屎拉尿这类事情是人人概莫能外的。

大家都是从小时候走过来的，谁在小时候对于人生都不免有一些幼稚的想法。比如笔者当年唱着“小鸟在前面带路”时，心里则对“敬爱的领袖”有着许多不敬的猜度：他总该是与我们不一样的人吧，至少“打嗝放屁”这类的脏事他是没有的吧？谁知道李楞子说他也是有的。

李楞子的春联有一种启蒙的意义：“领袖也是人”！

李楞子两救外祖父

对联风格迥异的外祖父与李楞子是一对好朋友。

在这长长的一条街上，外祖父只有李楞子一个朋友了；而李楞子呢？也似乎只有外祖父一个朋友。

一个地主老头，一个贫农鳏汉，他们之间没有发生过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至少我没有发现一丁点儿，我感觉他们是有始有终的好朋友。

外祖父的年龄比楞子大有十多岁，楞子总是尊称他为大先生；外祖父则称他金安，从来也不叫李楞子的。

他们的友谊要上溯到四十年代初，日本鬼子上岸的时期。

大概是1943年的秋天，外祖父家刚卖棉花得了400块大洋，这就是全家十口人一年的生活费用。外祖母留下了30块大洋作近期的日常开销，将370块大洋交给外祖父说：鬼子来了，家里不安全，你将钱带到新天钱庄上存着。

新天是外祖父的二姐夫家所在的一个集镇，还没有驻扎鬼子兵。二姐夫是个资本家，在那里开有一家钱庄，外祖父就在他家当账房先生。

那个午后，外祖父将 370 块大洋用一个小包袱捆在腰间，外面穿上一件长袍子，刚走到那通往河北的桥上，就被迎面过来的几个鬼子兵拦住了。鬼子兵见外祖父的肚子鼓鼓的，双手紧张地捂着，就端起刺刀往外祖父的长袍上轻轻一划，那 370 块大洋就当啷当啷的全掉在桥面上了，鬼子兵们纷纷弯腰拾起，全装在自己的口袋里了。外祖父发了急，和鬼子兵理论，鬼子兵端着刺刀就要捅他。正在这时，楞子赶上了桥头，对着鬼子兵“太君太君”的作揖。还主动捡起桥面上的大洋塞在鬼子兵的手里：“你的，大大的发财！”鬼子兵这才呜里呜噜地说“你的明白”，放了外祖父。

楞子将惊魂未定的外祖父送回家里，对外祖父说：“大……大先生你要钱不要命了。”

外祖母对楞子千恩万谢地说：“亏你了，要不今儿，他这条老命就没了。”那年月，外祖父与外祖母的感情还是很好的，她对惊魂未定的外祖父说：“算了，算了！破财消灾！破财消灾！”

土改那年，工作组发动贫下中农斗地主。一开始外祖父和外祖母也是同时被押上台的。

楞子对工作组说：“你们只能斗周李氏，不能斗周先生。”

工作组问他为什么？楞子说：“周……先生是什么成份？他是职……职工呀！职工也是工人阶级。他没有在家种过田，没有收过租，他一直在外面给资本家打工，他既不是资本家，也不是地主，你……你们怎么能斗他呢？”

工作组笑着说：“看不出啊，你个楞子倒有点政策水平。”真的就这样将外祖父放了。后来，工作组就将外祖父的成份定为了职工。

事后，楞子对外祖父说：“大先生，你要自己记好了，你……你是给资本家打工的，你的成份也是工……工人，工人是什么？共产党说工人是领导，你不要自己先气馁了。地主成份只能是老婶子一个人，家里已经有一人顶了这个屎盆子了，别人就躲……躲得远一点。”

外祖父说：“这样不好吧？让你嫂子一个人顶着，我心上过不去啊！”

楞子说：“过不去，也没办法？少一个人遭罪总比多……多一个人好吧？”

外祖母原本也是很侠气的女人：“金安说得对，就是这个理。屎盆子就让我一个人顶了。我一个女人家，他们总不能将我往死里打。”

此后，乡里召集的四类分子听训会，扫大街等活动，就没有了外祖父什么事，都由外祖母一人顶了。

解放初期的地富分子好赖还算是个人，评了就评了，土地分掉了，但还留了五六亩；房子分出去了，但还留了小五间。除了土改时被斗了一回，接下来的七八年间也没人管你。外祖母平素为人好，除了村长常新万常常来找点小麻烦外，乡亲们全都没有难为过外祖母。

外祖父消逝在瑟瑟芦花的深处

土改后的地富被分了房子分了地，但毕竟还留有房子留有地；尽管政治上已经沦为贱民，但生活上却还算是人活的样子。

到了1958年二次土改（也称“民主补课”）后，外祖母一家被扫地出门，剥夺了全部生产资料及生活资料，过着越来越不是人的日子了。作为“帽子”在册者的外祖母，三天两头集中去开四类分子听训会，三天两头起早扫大街，带着鲜红的红领巾的少先队员们虽说也都是邻里家的孩子，但已经开始向她扔小石子儿，吐着唾沫星子骂道“地主佬儿”了。

长期的折磨，使得外祖母早就失去了当初的大度量，她一天比一天感到窘屈，又没有地方撒气，就越来越频繁地对外祖父发脾气：“嫁到你家周家来，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临末了，大苦大难的事全让我一个人顶了。你一个男人都没事儿人似的。”这是外祖母常年挂在嘴边的怨恨。儿女们嘴上不好说什么，心里却对母亲多了一分同情。毕竟上台挨批斗的是老娘，被村长打嘴巴子的也是老娘啊。

外祖父在家庭越发没有地位了，再加上他的一生确实也对家庭做了三件大错事：

1943年时被日本人从他手中抢走了370块大洋；

1948年年底，他将外祖母的嫁妆全部变卖了去资助了濒临破产的二姐夫；

1950年时地主分子的帽子让外祖母戴了，他自己却被评上了职工。

外祖父心里当然痛苦，对不起家庭，对不起老妻，可他有什么办法弥补呢？他巴不到抢过这项“地主帽子”扣在自己头上，可他没有操作的办法。他一向就是沉默寡言的人，现在更是几天、十几天也不说一句话了。

只有金安常常拉外祖父下两盘棋，聊一会“三国”，外祖父也就开朗一些。

转眼到了吃食堂，金安是食堂的炊事员，金安对外祖父就才有了另一份的照顾。食堂办到后期，那稀粥也就是飘着几粒米花儿的清汤水，薄得映得出人影儿，金安总是给外祖父捞上点稠的。

那时，被扫地出门的外祖母和小姨被安排住在方家的西屋，屁帘儿大的地方，搁不下外祖父的床，他一人孤零零地住在前后穿风的大门堂里。大门堂离方家也不过30米，没办食堂的时候，他一日三餐回到家里吃，吃完，将碗舔干净了，将掉在桌上的米粒和菜屑全拾在嘴里吃了，就离家了。

多年失和的外祖母不要求他做任何事，也不和他说话。虽然是老夫老妻，虽然生育过七个孩子，也曾有过琴瑟和谐的日子，但到老了，阶级斗争最终让他们形同陌路人。

在吃食堂的日子里，外祖父一日三餐在食堂，十天半月也不走进家门一次。只有小姨常去给他洗洗衣服被褥。除了食堂外，他几乎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得到补充的营养。

他偶尔也到我家来。都在同一条街上，相距百余米。外祖父从来不从大街上走，总是走街背后的河边小路，总是穿一袭破旧的灰色长衫，双手袖着，瑟瑟地走来，胆颤颤地敲我家的后门。母亲见他来了，赶紧给他倒上一杯热乎乎的白开水，然后再去街面上用二两粮票六分钱买两块“缸丹”（一种大饼似的早点），再端过一小碟咸萝卜干，有时还会再给他倒上一小盅烧酒，外祖父就在后屋赶紧吃了，又赶紧从后河边走了。

那时我已是中学生，寒暑假、星期天，总是我开门迎他进来，又总是我送他走。我走出后门与外祖父道别，说一声：“爹爹，走好了！”他无言地摆摆手，依然双手袖着，沿着来的路瑟瑟地离了去，那一袭破旧的长衫，被冷风吹卷起一角，河边的芦花瑟瑟地起伏着。望着外祖父佝偻的背影消失在漫漫芦花深处，我心无限凄惶。

为什么外祖父到我家从来不在大街走？为什么相距不过百余米，他也难得来？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想必都能理解的。

那时，我的父亲是镇上的工商联主任，虽说不是共产党员，可也算共产党信用的进步人士了。翁婿间的关系极好，父亲不止一次的对我们说：你们的外祖父

是一个真正大写的“人”。但外祖父怕影响他，他当然知道自己是一个没带帽子的地主佬，到女婿家来，给人撞见了，人家就会说女婿与地主老丈人划不清界限啦什么的。

母亲也是粗心的，她居然一直没有意识到她的父亲有可能会饿死。即使当她意识到时，她也没有果断地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

母亲也是自私的，她本身就背着地主家庭出身的沉重包袱，最怕最怕的就是别人说她与剥削阶级家庭划不清界限。

她怕的不是影响自己，而是怕影响到丈夫和孩子。她的大儿子再过两年就要考大学了，她的丈夫也必须要在“进步人士”的队伍里混下去。如果万一混不下去，这个家就会顷刻间完蛋。所以，她将与父母亲的来往减少到最少的程度，少量的必要的来往也都在深夜里极其秘密的状态下进行。

再说了，大饥荒时家中的食品太少了，丈夫吃不饱，四个子女也全都吃不饱，自己更是吃不饱，也就忽略了对她父亲的照顾。等到外祖父饿死了，一切都晚了，只留下一辈子的后悔。

60年开春，外祖父就得了浮肿病，一个月后就死了，也不过六十刚出头。他是西街头第一个饿死的人。

母亲，更包括母亲的弟妹们，至今都不敢谈论他们的父亲的非正常性死亡。

外祖母和小姨虽说以食堂为主，却也有点小锅小灶。偶尔从野地里挖来一堆荠菜、马齿苋，偶尔从河边摸上来几十粒田螺或河蚌，我的母亲也偶尔塞给她们一块豆饼或是几根胡萝卜，她们的生命终于维持了下来。

生命这玩意儿总是既脆弱又顽强的，外祖母度过了60年那道坎儿后又活了30年，直至90岁才无疾而终。

外祖父死后两个月，金安的母亲也得了浮肿病死了。老太太一去，金安的家差不多也就散了。那个水琴撑船，在一个黑漆漆的夜里失脚掉在运河里，尸首或许漂到东洋大海，最终没有找到。

金安是一个看报纸，关心国家大事的农民。文革初期，不断传来一会儿这个人倒了，一会那个人倒了。金安说：“母鸡打鸣、公鸡生蛋，连狗子也生蛋了，这世道没个好了。”金安还说：“古往今来多少事，都离不开奸臣害忠臣，坏人欺好人这一套。原以为新社会有出息，谁知到头来仍是老一套。”

金安死于文革正热闹之时。他没有听到林彪摔死的消息，但是他说林彪“马屁拍过头了，不会有好下场的”。

金安一死，金安他们家“绝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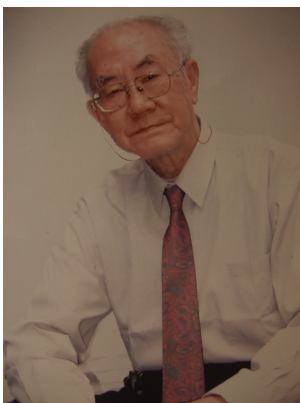
人的记忆是有莫名的选择性，往往大事记不住，有的事情却永远镌刻在脑海里。我对外祖父最深刻的记忆，就定格在这个芦花瑟瑟的画面上，那么冷的秋景，那么凄惶的秋意！

【文坛往事】

父亲，人变鬼、鬼变回人的跌宕人生

山 月

我的父亲熊小凡，乘鹤仙去已有五年了，但他的书屋还在，藏书还在，编辑



手记还在，文学评论还在，与作者的通信底稿还在……每一次，当我去触摸它们，翻读它们时，我都会感知“悄声而来祈愿去也悄声”的父亲，生前总是在为他人留下不凡的时代音符而埋头耕耘。

50年代末，反右运动刚结束，他就在《红岩》杂志上编辑推出了青年作家高缨写人悲欢离合的小说《达吉和她的父亲》，成为那时文坛上的一朵艺术奇葩。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刚结束，父亲又在《红岩》杂志上编辑推出“土著”作家周克芹的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因是一部不可多得真实反映农村现实题材的作品，而荣获中国最高文学奖——第一届茅盾文学奖。

但令我难以置信的是，在他遗存下来的手记资料中，竟还有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写的揭发交待材料。其中，最令我惊愕的是，父亲交待了自己曾上“罗广斌叛徒集团”贼船的罪行材料。

从他交待的时间看，是从1969年4月15日至1972年1月19日。那时，我已上山下乡，在武陵大山中落户，对父亲的这一段经历全然不知。今天，当我整理父亲的生平事迹时，我才发现，父亲的编辑人生，起伏跌宕，竟留下深深的时代烙印，它让我情不自禁地要去追寻父亲蹒跚的足迹。

父亲编出《达吉和她的父亲》

父亲曾是新中国建立时的第一批“文学青年”，40年代末，他“背叛”了父辈们在西南地区打拼出来的最大的集生产、商贸于一体的家族工商企业——宝元通（建国后转为国营重庆百货公司），只身独往，与几个文友共同创办了文学杂

志《摹仿》，开始步入文坛。但很快，因该刊旗帜鲜明地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仅出两期就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建国后，父亲进入重庆剧协创办的戏剧电影周刊《观众报》任编辑，1953年，又调入重庆市文联创作部。此后，担任中国作协重庆分会编辑出版的文学月刊《红岩》杂志的文学编辑。

1958年，父亲的编辑人生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春天”。此时，由毛泽东发起的全党整风运动和反右运动已接近尾声。一批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就已涌现出来的青年作家、诗人，开始活跃于中国文坛。地处大西南腹地的重庆，一位充满创作激情的文学青年高缨，在走村寨进深山访民间后，含着热泪写出了一篇日记体短篇小说《达吉和她的父亲》（后简称《达吉》）。他先读给老友杨乐、野谷听，结果他们都被小说中两个不同民族的父亲为一个汉族女儿“夹血带泪”的爱与恨的故事感动。于是，高缨信心满满地将小说初稿交给了《红岩》编辑部任编辑的父亲熊小凡。此时的父亲，其编辑生涯已近十年，对文学作品颇具鉴赏力。当他一口气读完《达吉》时，竟像在沙漠中久渴后突然喝到一口甘甜的泉水，父亲好久没有读到如此真实反映现实生活中的父女之爱、骨肉之情的小说了。因为自建国后，文学艺术很长一段时间，都被视为“一个阶级的武器”，“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整个革命事业的“齿轮和螺丝钉”。文学青年的最好信条就是“当一个留声机”，而“当一个留声机器便是追求真理”（郭沫若语）。可想而知，歌颂、图解、说教、附会等创作手法，已成新中国文学创作的常态。但眼前高缨的小说则不然，他突破了“革命文学”的禁锢，从现实主义出发，描写出现实生活中喜怒哀乐的真实人性。

父亲凭借一个文学编辑的敏锐嗅觉，认定小说《达吉》是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作品，且具有一定的文学鉴赏价值。于是，经过一番精心的打磨，得到《红岩》主编王觉的首肯后，于1958年3月号的《红岩》月刊上，向读者推出了这部佳作。

很快，《新观察》全文转载了这篇小说，同时，还配发了一篇由《新观察》主编樵渔举荐该小说的《一篇引人入胜之作》的评论文章。樵渔赞赏道：这是一篇“清新流畅、引人入胜之作”，“你要懂得什么是艺术魔力吗？这就是”。

正是发行量很大的《新观察》，将《达吉》从小众读者推向了大众读者。紧随其后，作家出版社也出版了《达吉》的单行本。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的文学艺术这块土壤，经数次政治运动的洗礼，已显得贫瘠、干渴，读来感人肺腑、真挚生动的反映人性的艺术作品，已是难觅踪迹。正是这种人的文学的断裂，使得《达吉》一经推出，便很快在全国读者中流传开来。据文学评论家陈朝红回忆：当时“大学生们把它改编成话剧，画家们把它改编为连环画（连环画后来还到美国展出过）”，“冰心老人还建议把它选入中学的语文教科书”。《达吉》一时轰动全国，影响经久不衰。陈朝红还说：“《达吉》被公认为是高缨早期重要的代表作，在他的创作道路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也堪称建国以来优秀短篇小说的经典性作品之一。”

1960年春，峨眉电影制片厂和长春电影制片厂联合将《达吉》搬上银幕。不过，从小说《达吉》到电影《达吉》这一期间，另一种声音出来了。据《红岩》文学杂志副主编赵晓铃回忆：当“争议从电影界到整个文学界，由四川到全国，有的文章似乎将小说《达吉》当成靶子，来批判中间人物论，思想落后感情狭隘，没有正确表现无产阶级。《红岩》的主编王觉挺身而出，在《四川日报》上发表了近万字的长文，从别林斯基到日丹诺夫一阵引用，只为了说明无产阶级的马赫也是可以是有情感的，可以伤心落泪的。争议的双方各不相让，尤其是否定小说的一方，语言是越来越尖锐，发表小说的《红岩》编辑部感受到的压力不是今天的人们能够想象的。”显然，作为小说《达吉》的责任编辑的父亲，承受的精神压力更难以想象。

就在电影界到文学界出现了越来越高批判《达吉》的中间人物论、人性论，没有正确表现无产阶级感情的声浪时，据陈朝红回忆：1961年6月，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全国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上，从著名演员赵丹等电影界人士口中获知，电影《达吉》与小说《达吉》引起了激烈的论争。随后，周恩来看了电影又读了小说，再多次召开座谈会，倾听艺术家们的意见后，“重申要认真贯彻双百方针”，并批评说：“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几年来有一种做法，别人的话说出来，就给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一来就‘五子登科’，这种风气不好”。

总理的讲话，犹如一声春雷，使数度经历了批《武训传》、批《红楼梦》、批胡适、批胡风、反右运动后，早已冰封万里、无声静寂的文艺界复苏过来。会后，敢为人先的赵丹，在受邀与总理一起登香山时，斗胆直言与总理不同的看法：“你

说电影比小说有所提高，可我看还是小说好。”经过一番论辩，总理说：“你完全可以保留你的意见，我也可以坚持我的意见。你赵丹是一家之言，我周恩来也是一家之言嘛！”

令人惊喜啊，两会上关于《达吉》的论辩，竟无总理与文艺工作者之分，各抒己见，各执一词，其自由讨论之风，很快又传到电影界、文学界、新闻界……，一场关于《达吉》的争鸣在全国展开。此时，我们看到的是整个大地苏醒过来，文艺界出现了勃勃生机。

令父亲欣喜的是，由自己编发的《达吉》引起的这场讨论，从1961年6月周总理讲话始，一直延续到1962年11月，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全国有十余家报刊参加讨论，发表讨论文章近百篇，真是奇迹啊！这场论辩从以势压人到自由讨论，从批判到争鸣，从政治回归文艺，反映现实生活中喜怒哀乐的真正人性的文艺作品《达吉和她的父亲》，竟给中国文学艺术界带来了一个短暂的春天。

文革爆发，父亲交待上“罗广斌叛徒集团”贼船的罪行

编辑《达吉》小说，是作为文学编辑的父亲，对“人的文学”的一种审美追求；他知道读者爱读什么，不爱读什么。

不过，令父亲有些沮丧的是，文学的春天太短暂，随后而来的一个又一个“运动”，使《达吉和她的父亲》成为一道一闪而过的流星。但更令父亲想不到的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我们家因父亲出身民族资本家，被视为“黑五类”家庭，在红卫兵运动中，首当其冲被“横扫”，遭到红卫兵两次抄家。9月，我奶奶在临江门的家被抄，抄走的家什、衣物全是几十年添制的最基本的生活用品，另有个人存款100元。10月，我们在文联的家被抄。当时，我看见文联闯进一队红卫兵，他们个个身着军装、扎着皮带，左手臂上戴着“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袖套。在人的指点下，直奔我们家而来。一进门，他们个个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一个领队模样的女生说，我们是来“破四旧”的！然后对父亲大声呵斥：“你这个资本家的狗崽子，快，给我站起来，把全家人集中到毛主席像前，站好！我们今天来抄你们的家！要破你们家的四旧！横扫你们家的封资修！！”

当时，我的外公、外婆、姐姐、弟弟和我，全都被叫到父亲的书屋，排成一

排，像罪人一样对着毛主席像低下头，任凭 20 多个红卫兵在几间房子里翻箱倒柜，撕书砸物。不过小半天功夫，我们家就翻了个底朝天。被抄去的东西中，有父亲多年集成的书籍、照片、日记，除了马、恩、列、斯、毛的图文保存下来以外，其余全被撕毁、烧毁；我们全家人的所谓属于“四旧”的衣物、日用品也被抄去。另还有外婆的现金 50 元、活期存款 50 元、定期存款 100 元，共 200 元；我们全家勒紧裤腰带积存下来的全国粮票 50 斤、省、市粮票 30 斤也被抄了。令我气愤的是，我看见一些红卫兵把小件东西往自己军包里装，钱和粮票也全部揣进了自己的裤兜里。

事实上，当时我们家被抄的东西，都是建国后父母用工作的合法收入购买的日常生活用品，没有一件是违法所得，更不是靠“剥削”而来。

但更令父亲意想不到的，此后他被“请”进了重庆市革委会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第二大队十二中队”中学习、写交待材料。交待什么？资本家家庭的罪恶、狐朋狗友的罪行、同事邻里的罪孽……

我在整理父亲的资料时，发现在学习班中，父亲写了各种交待材料，数量之多装满了半个抽屉。其中不仅有交待自己“罪恶”的资本家家庭，还有交待他参加过的重庆市文联“东方红战斗兵团红文艺”以及参加编辑造反军战报。但让我更震惊的是，我还看到了六份父亲交待他如何上了“罗广斌叛徒集团”贼船，并为之“翻案”的材料。

父亲在学习班时，经历了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和批林整风几个运动中的运动。而在每个运动中，父亲都被迫交待他为“罗广斌叛徒集团”翻案的罪行。当我翻看这些交待时，我发现，一开始，父亲就被迫“低头认罪”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自己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我的错误，集中到一点，就是跟错了人、站错了队、走错了路。在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自己不但没有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反地是紧跟了从罗广斌叛徒集团到刘、张一伙阶级敌人，站在他们一边，为他们反军、翻案、篡权、复辟的阴谋卖力效劳，抬轿子，吹喇叭，制造舆论，上了贼船。林副主席教导我们：“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站在那一边，这是一个立场问题，是个首要问题，其他都是附带的问题。”我所犯

的错误，是根本立场的错误。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有罪的，我向毛主席请罪。

尽管一开始父亲认罪很虔诚，并自己给自己无限上纲，但仍没有通过。此后，父亲又被迫继续交待和认罪。《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的检查交待》中，又进一步交待了自己上“罗广斌叛徒集团”贼船的“罪行”。他写道：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和两个司令部的激烈斗争中，我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

一、“罗广斌叛徒集团”的右倾翻案是“五·一六”、“三老会”有组织的罪恶阴谋

整个翻案活动，是在被中央文革清除的戚本禹一伙的支持和指示下进行的；是在刘结挺、张西挺操纵、支持下进行的；是在同“三老会”头目紧密勾结下，盗用群众组织“专案调查组”名义进行的。我参与这一活动，就是站在了这条黑线上；

二、“罗广斌叛徒集团”的右倾翻案是阴谋篡权复辟

在“罗广斌叛徒集团”的右倾翻案中，“五·一六”、“三老会”的主要罪恶阴谋之一，是在思想上散播和鼓吹“受压就是左派”的极“左”思潮；混淆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在政治路线上，企图用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代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组织上，搅乱阶级阵线，把一伙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阶级敌人，打扮成“左派”、“革命干部”，总之，是阴谋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妄图篡权复辟。

从这一段交待中，我读到出身“黑五类”的父亲为罗广斌翻案的无奈。他是在“受压就是左派”的思想支配下，“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

三、“罗广斌叛徒集团”的右倾翻案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为叛徒罗广斌的罪恶历史翻案；2. 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坏和篡权阴谋翻案；3. 为毒草小说《红岩》和为肖、李、廖翻案。我们企图通过

这三个方面的翻案，在政治路线上，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一伙在解放前后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以及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五·一六”、“三老会”和罗广斌叛徒集团煽动极“左”思潮，制造分裂，将自己伪装成所谓“正确的”路线，对抗和取代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组织上，则是为了把罗广斌一类叛徒、特务继续包庇下来；把肖、李、廖一类三反分子“解放”出来；为刘、张、“三老会”、“五·一六”在四川、重庆营造独立王国作好干部准备。总之，他们的右倾翻案是直接为打开两个所谓“突破口”，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服务的。

我参加他们的翻案活动，所犯错误的要害也正在于此。

读到这里，我怎么也不相信，父亲竟将为罗广斌“罪恶历史”翻案，无限拔高到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要知道，罗广斌与我们家比邻而居多年，我们共用一个阳台，我们两家有左右邻居的友情，再加上，罗广斌写出歌颂川东地下党的《红岩》小说，作为文学编辑的父亲，是知道罗广斌其人的，翻案果真是……

四、我在整个翻案活动中所犯的主要错误

1. 为叛徒罗广斌的罪恶历史翻案

自从罗广斌自杀身亡后，我就积极参与了为叛徒罗广斌的罪恶历史翻案的调查。1967年5月，我与文联几个受“资反路线迫害”的同事去北京上访，走访了公安部、中央接待站，想了解中央领导对此案的态度，后又到成都调查罗广斌的历史。我们的所谓调查，其实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其目的不仅在于要翻罗广斌叛徒历史的案，还企图同一伙叛徒、特务、反革命串供，伪造历史，上欺中央，下骗群众，捂住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招降纳叛的盖子。是对革命群众揭露罗广斌叛徒面目和刘少奇这条黑线进行的猖狂反扑。但我当时未能认识到“翻案”的严重性，我之所以顽固地站在他们一边，是认为在文联机关，自己与罗广斌都是资反路线的受害者。罗广斌案如果翻不过来，自己仍不免“受压”，“命运相共”，就决定了自己必然要为罗广斌亡命奔走。

2. 为“罗广斌叛徒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坏和篡权阴谋翻案

“罗广斌叛徒集团”利用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对他们的包庇，又利用了“工作组”推行资反路线，以及用“左”的面貌玩弄两面派手法，蒙蔽了文联工人和革命群众，拉拢像我这样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搞阴谋上台的。……篡权后，他们在文联机关疯狂推行形“左”实右的反动路线，其目的是为了掩盖他们叛徒、特务的面目，巩固后方，插手社会，妄图在全市篡权。在这个过程中，我积极支持和追随了他们。当时，我被他们的“党员”招牌和极“左”面貌所迷惑，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的“革命派”，由此认为，只要紧跟他们，他们就能把自己从资反路线的迫害中“解放”出来。正是由于这种“私心”，我接受了他们的拉拢，把自己绑上了“罗广斌叛徒集团”的“战车”。

3. 为毒草小说《红岩》和为肖、李、廖翻案

毒草小说《红岩》本身就是一部翻案黑书，是直接为刘少奇及其反革命修正主义树碑立传的。《红岩》小说又直接同肖、李、廖问题相联系。在革命群众揭露了这本黑书的反动本质及其在刘少奇黑线下炮制出笼的阴谋以后，我们“罗广斌叛徒集团”的人千方百计进行反扑，竭力为《红岩》并为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政治上组织上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翻案。同时利用同一个班子大肆肖、李、廖翻案。我们为肖、李、廖翻案的罪恶目的，还在于企图打开所谓重庆文化大革命中的“突破口”，把肖、李、廖一伙三反分子、叛徒、特务“解放”出来，实现其反革命篡权。而我对此，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积极予以支持的。

父亲在这几段交待中，让我终于体会到，受到禁锢迫害的黑五类狗崽子的父亲渴望“解放”出来的心态。那时，你要“解放”出来吗？就必须自损、自毁、自残，要把罗广斌的罪行和自己参与翻案的罪行无限上纲上限，甚至不惜和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挂起钩了。

4. 我积极为“罗广斌叛徒集团”整个翻案活动扩大社会影响

我不仅直接参与和支持“罗广斌叛徒集团”的右倾翻案活动，还十分卖

力地为他们扩大社会影响，四处兜售他们的翻案黑货。我在当时有影响的小报上，发表他们炮制的翻案文章，为他们寻求社会支持。我参加《造反军战报》的编辑工作，就抱有这样的企图，希望利用这个报纸抛出为罗翻案的材料。这表现了我站在反动立场上的顽固性。尤其严重的是，江青同志给罗广斌的四卷《毛泽东选集》，是经过我的手带往成都的，致使“罗广斌叛徒集团”的人拍成照片公然登在翻案小报上，用来大肆招摇撞骗。

我很惊讶，父亲见过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江青？江青还经父亲之手送给罗广斌四卷《毛泽东选集》？父亲是不是想暗示什么？但事实上，又正是江青说“罗广斌是罗广文的弟弟”，因此，“罗广斌叛徒集团”就成了铁案？我有些糊涂，不可理解。

我之所以参与和支持“罗广斌叛徒集团”右倾翻案活动，将自己陷入翻案复辟罪恶的泥坑，完全是由于自己没有彻底背叛资产阶级家庭，仍然站在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使然。通过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两年的学习，我认识到我所犯错误的严重性。今后，我一定要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深挖其所犯这些错误的根源，以同错误决裂。我决心今后在党的教育下，走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努力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立场，脱胎换骨，向党和毛主席赎罪！

读完这篇交待，我眼前出现了一个“罪孽深重”的父亲。文革中，他曾上了“罗广斌叛徒集团”的贼船，竭力为大毒草《红岩》小说、并同时为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政治上组织上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翻案；更可怕的是，还参与了“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活动，他似乎变成了一个祸害人间的“鬼”！作为一位有眼光的文学编辑，他在恶浪滔天的运动中，竟不敢正视罗广斌和杨益言共同创作的红色经典小说《红岩》，尽管书中写了一大批中国共产党人与国民党斗争的故事；可以说，它曾影响了新中国几代人的成长。

不过，如果穿越时空回到那时——1967年2月，作为黑五类狗崽子的父亲，不低头认罪就只有死路一条！更何况，那时罗广斌被重庆某学院红卫兵从家中绑

架走后的第五天，就传来在关押地“畏罪跳楼自杀”的消息。到了1968年3月15日，在中央首长“3.15指示”中，因江青说“罗广斌是罗广文的弟弟”，于是，罗广斌被定性为“罗广斌叛徒集团”、“周扬黑线上的人物”、“山城头号政治大扒手”，就成了铁案。在“铁案”面前，父亲不得不承认自己参与了“翻案”的罪行。

噩梦后，又推出荣获首届茅盾文学奖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好不容易熬过10年噩梦，中国才开始回归理性。1979年夏初，《红岩》杂志主编王觉又毅然带领老编辑部的同人们，恢复出版了已被停刊的《红岩》杂志。但此时的父亲心有余悸，他将当编辑办刊物视为畏途。然而，在王觉主编的精神感召下，父亲“又跟随他从头迈步”，去促使《红岩》焕发新的生命。

重新起步困难重重，父亲说“许多事情还来不及做，第一期刚刚编完便陷入稿荒，几乎无以为继。王觉和我们一样焦灼。正巧听说周克芹有一部长篇小说，王觉便亲自带了几个同人去内江看稿，结果带回来了《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并请来作者一起研究修改”。

其实，令《红岩》同人们想不到的是，长篇小说《许茂》的发现和采用，将使《红岩》继《达吉》之后再创辉煌。更令父亲想不到的是，《许茂》竟让他又恢复了做人的尊严，同时还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荣誉。

文学评论家殷白曾说：长篇小说《许茂》，“写出了1975年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国农村的真实面貌”。“在相当范围和深度上，暴露出‘四人帮’为害和长期‘左’的错误造成的农村痼疾，已经到了不能掩盖的边沿”。

小说中，作者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农民为什么跟共产党走呀？”然后，作者通过小说中人物回答：“还不是因为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给农民带来好处。土地改革打垮了封建地主，政治上得到了解放，经济上也彻底翻了身，他们认定跟党走没错，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当他们通过比较，通过认真的思考，下定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他们自觉自愿地把土地、耕牛、农具全部交给了集体，巴望着乘上这只社会主义大轮船渡过汪洋大海，通向共产主义的美好前程，祖祖辈辈永远摆脱贫困……，可是，后来这只船像搁在滩滩上，走不了

啦！贫困像鬼魂似的跟着他们。……想想嘛，在这种情况下，像许茂大爷这样的农民，他能不怀疑吗？能不想想自己的前程吗？”

如果追溯建国以后关于中国农民问题的几桩历史公案，我们会发现长篇小说《许茂》的历史意义。

1953年，梁漱溟与毛泽东关于工人农民“九天九地”的是非之争，是一代大儒为农民生活太苦而鸣不平；1959年，彭德怀与毛泽东关于农村浮夸风盛行，犯了左倾错误的是非之争，是一代将帅为中国农民受乌托邦之害而上书直言；1962年，田家英、邓子恢、刘少奇与毛泽东关于包产到户的是非之争，是党内有识之士为中国农民实施生产自救而求实的辩护。那么，1979年，长篇小说《许茂》的推出，无疑是中国农民自己对数十年乌托邦狂飙和政治运动的否定。

《红岩》杂志慧眼识珠，断定这是一篇具有现实意义的好稿件，当即决定采用。但有了一篇好的稿件，犹如有了一块好玉，还需要加以打磨、雕琢，使它最终成为一件文学精品。我的父亲，荣幸地担当起该小说的责任编辑。

周克芹的原本稿件，充满“土著”作家对中国农民悲剧命运的同情和关怀。字里行间里，多忧愤、多悲悯、多质疑，调子似乎有些灰暗，但在这灰暗中，父亲又发现了小说中有悲剧色彩的许茂们，仍透出顽强的生命力和对美好未来追求的亮点。只是，在人物的塑造上，描写还不够丰满、不够典型。于是，父亲用手中的笔，将这件不可多得的好玉的最亮点凸现出来，让小说“释放”出中国农民强大的生命活力。

父亲记得，当时《红岩》发稿时间紧迫，需要在一星期内将这篇小说打磨成精品，故编稿难度较大。但父亲赞赏《红岩》同人们的眼力，发掘了这篇“土著”小说，他愿意夜以继日去编稿。

一星期后，周克芹的长篇小说《许茂》经打磨、雕琢后，终于成为“出于其类、拔乎其萃”的作品，《红岩》文学季刊第二期正式发表。令人惊喜的是，该小说因为典型环境（中国农村）中的典型人物（中国农民），并着力对政治运动危害中国农民利益的批判和反思，而赢得广大读者的热捧和文艺界的高度关注。1980年2月，父亲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该小说的评论文章，《发人深思的农村悲喜剧》，给读者进一步解读了《许茂》。

1980年5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许茂》一书，发行达16万册。

1988年12月,《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终因是一部不可多得真实反映农村现实题材的作品,而荣获中国最高文学奖——首届茅盾文学奖。而搬上银幕的《许茂》,同时获得相关电影奖项。父亲也因编辑长篇小说《许茂》而荣获“中国作协文学期刊编辑荣誉奖”。

不过,难能可贵的是,父亲尽管经历了大起大落,他还是秉承了一个文学编辑的基本审美原则,尊重文学艺术的规律。只要是反映人的爱恨情仇、喜怒哀乐、生离死别……等人性的小说,父亲都会用本能的鉴赏眼光,让《达吉》和《许茂》们闪烁出人性的光彩。当然,不管是《达吉》还是《许茂》,或多或少还带有“文以载道”的痕迹,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但终究是瑕不掩瑜,它们仍然获得了巨大成功。

我在反复翻读父亲遗留下来的书籍、信札、手记、交待等资料时,都会对父辈那一代知识分子在历经政治运动的磨难后,还能保存下一份人性的本真而肃然起敬。

2013年2月28日 坡月书屋

【作家与作品】



姚蜀平

1963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先后在核工业部和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和政策管理所工作。八十年代初，在美国哈佛大学科学史系任访问学者。八十年代末再次应邀赴美，先后在史密斯、富兰克林、马歇尔、本特利等院校任教。现为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协作研究员，定居美国。著有“华裔美籍物理学家对现代物理的贡献及其某些社会原因初探”等论文及《现代化与文化的变迁》等著作。参与电影剧本《李四光》、电视专题片《共和国之恋》创作，发表过散文《儿女祭》，短篇小说《沉默的路》、《天才之死》等；创作中篇小说《魂归故里》，长篇小说《似水流年》（简体删节版，花城出版社，2009）、《悲情大地》（与《似水流年》为同一部书的繁体字完整版，明镜出版社，2010）等。2011年，以长篇小说《他从东方来》获全球华文文学“星云奖”征文历史小说佳作奖，是该年度历史小说类唯一获奖作品。

《悲情大地》故事梗概

文静貌美、善良刚强、事业心强的年轻女大夫尚安妍，在舞会上认识了一位背景不祥的高官牛主任。在一次被牛主任诱骗出诊中，尚安妍被奸受孕。在被迫做人工流产的医院里，结识了从美国回来的生物学家梅仲宇的妻子夏晶榕和她的一家。她第一次在夏晶榕家听到了震撼她心灵的小提琴曲《音诗》。后来尚安妍被送到劳改农场。文革初期，当她从劳改农场跑回北京时，发现好友夏晶榕一家三口已被斗自杀，一个尚存的孩子却杳无音信。

尚安妍下放到南方一小县城医院。在当地武斗烽火中，意外地和夏晶榕失踪的小儿子冬生相遇。从此义不容辞地担当起抚养好友遗孤的全部责任。在停课闹革命的岁月中，公社医院的杜医生和小学校的留守、右派分子温尔雅成了冬生的启蒙老师。在县城关医院里，落难的牛主任意外地成了尚安妍的病人，尚安妍以德报怨为他治病，牛主任怀疑冬生是他们的孩子。尚安妍与温尔雅患难中相恋，

当温尔雅去香港接受遗产时，尚安妍却因为冬生不能同行而忍痛告别了她的恋人。

几年后，尚安妍带着冬生返回北京。为了获得冬生本应有的户口，尚安妍和各方做了艰苦的、持续的斗争，并违心地两次求助于又恢复官职的牛主任，还和她并不相爱的一同下放的工人武正兴成婚。在他们住的四合院里，有一位穷途潦倒、拥有两个美国博士学位的甘先生，冬生拜他为师，后来成长为一个出类拔萃的青年。甘先生鼓励他跳级考上北大物理系，又精心安排他作为插班生，出人意料地考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从此，冬生在大洋彼岸踏上了漫长的求学之路。

冬生在美国得到了年幼时的启蒙老师温尔雅的真诚帮助。他一边求学，一边探询父母当年走过的足迹。他遇到了父亲的老教授和房东，并找到了父母重要的遗物。他还发现了在父母自杀当日，从他们家把父亲宝贵小提琴抄走的红卫兵头目冷冰的踪迹，并对其进行了灵魂的拷问。冬生为了解父亲告别世界时发出的疑问，舍理工而转入政治学。他潜心读书，深入思考，决心探索文化大革命的来龙去脉，回答父亲关于这些年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错误，怎么发生和为什么发生的疑问。

九年后，誓言“永不回来”的冬生踏上了归国之路。他相信，他只能在自己的祖国和许多受难者、先行者一起来寻找正确的答案。

【作家与作品】

《悲情大地》后记

我们生长在一个非常的年代，相对于过去和未来，这个年代的特殊性会越来越被人们看重。它曾经那么光辉耀眼；蓦然回首，却又如此阴暗可怖。我是这个时代微不足道的一员，几十年来，战战兢兢地走了过来。想远离政治，却被卷得很深；想孤傲离群，却被推到漩涡中心。回首一生，碌碌无为，没有傲人的成就，没有可炫耀的财富，仅有的财产就是自己的经历，所受的痛苦和随之而来的思考。它们并非在任何时代都可能经历得到的，也不是同时代每个人所能拥有的。于是，守着这仅有的财产，就会记起托尔斯泰的话来：“艺术永恒，人生短暂。假如来

得及把你所理解的东西写出百分之一就好了。”我怕是写不出万分之一，但是把我们这一代永生难忘的，经历的，看到的，听到的，和想到的写下来，很久以来就成了我的心愿，它在心中徘徊、酝酿和发酵。早在一九八〇年，我就下决心写一部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的长篇小说，想不到二十五年后才动笔。也许心中有太多的话要说，初稿竟达八十五万字，原定书名为《漫漫长夜》。感谢老同事罗伟及长兄姚监复认真地通读了全稿，指出不少笔误。后又经老友、资深编辑何启治过目，给予鼓励的同时，还提出了修改的具体意见。我先后作了几次大修改，二、三稿压缩到六十万字，四、五稿更浓缩到四十万字。感谢广州花城出版社在此国情下，仍于二〇〇九年三月出版了改名为《似水流年》精简后的简体版。该书第四部分，我忍痛将原来十一章压缩到四章，故事连接时有瑕疵，内容删节过多也颇有遗憾。

有幸在二〇一〇年初始，香港明镜出版社愿将此书以更贴切的书名《悲情大地》出版繁体字完整版，此稿已为六稿，实际字数增为四十七万字；第四部分恢复到九章，不仅前后更加连贯，并且尽量保留原文，同年四月在香港出版。我对出版社及编辑表示真诚的感谢。

在此出版之际，我由衷地感谢在那个非常年代里，在本书从酝酿、写作到出版的漫长过程中，用一切方式给过我信任、支持、帮助、鼓励和关爱的所有亲人和友人。

《悲情大地》繁体字完整版终于问世，了却了我三十多年的心愿。它是一部立足在真实历史背景和社会现实上的一部虚构小说，并非真人真事。尽管书中有大量我们熟悉的时代背景、历史烙印，甚至人物和情节。

最后，真诚地盼望所有在那个时代逝去的受难者，那些游荡在飘渺时空的亡灵，瞑目安息。这本书是献给你们们的。逝者的遗愿，永远在鞭策着生者。苟活着的我们，将在苦难而幸运的历程中，继续顽强地拼搏前行。

2010年3月15日

美国麻省北丛林

【作家与作品】

《悲情大地》（节选）

第一部 尚大夫和夏晶榕一家

我们要说的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事情。二十世纪刚刚过去，那个时代的人物和故事好像已经距今很久远了。如果用心回忆，还能捕捉一些隐隐约约的画面；如果懒散一些，它们就随时光流失而去。就像河上飘浮的断枝杂物，被卷到死角，终会沉到河底，再过几十上百年，河水改道，它又被人挖掘出来，那时会有几十种假设和理论去推测和考证。……

尚安妍在班里女同学中年龄最小，个子最高。不论什么人，不管是男、是女、是老、是少，初见尚安妍都会止不住多看她两眼。她美而不艳，傲而不狂；最让她与众不同的是她凝乳般的肤色，高挑的个子，和颀长雪白的脖颈；一双眼睛永远无邪地正视任何一个面对她的人。

……厚实华丽的帷幔被挑开，后面走出一个人来，尚安妍忍不住“啊……”了一声，出来的不是别人，竟是牛主任。

她第一次看到帷幔后面有张很宽的单人床。尚安妍忽然觉得什么事情有点不对劲，可是她又想不起来是什么事。牛主任忽然探起身对她说：“我可以吻你吗？”

尚安妍想了想说道：“问我？你已经问得够多了，还要问什么你就快问吧！”

牛主任突然伸出双臂一把抱住尚安妍，把他那酒气十足的嘴，紧紧地按在尚安妍那张刚想说什么还没说出来的嘴唇上。

……可是那天傍晚，当她看见那些排着队、晚归的、晒得油黑、累得精瘦的人出现在她面前，发现他们个个面无表情，胆怯畏缩。她突然意识到，她被送到了劳改农场。

……盐碱一号农场办公室有一个收音机，农场干部饭后常常聚在这里……一九六六年的六月一日晚上，当尚安妍在那间半是卧房、半是医务室的房间里做绷带，刘场长敲着玻璃窗大声喊道：“尚大夫，快来办公室听广播。”收音机里传出一种不寻常的声音，播音员发出的是一种高昂、亢奋、坚定而又果敢的声音。

听着这种声调，尚安妍感到心跳加剧，心情紧张而惶惑。终于她听清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她还听到了“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八月的北京，热浪卷过大街小巷，扫过每一个角落，整个城市都显得狂热浮躁。街上走过匆匆忙忙卷着袖子扎着皮带的红卫兵，站在路边的老人默默地注视着他们。一些脸色慌张、走路踉踉跄跄的人，多半是挨了斗的人，或是出身不好准备挨斗的人。每年八月是校园最安静的暑假，今年却成了翻天覆地闹革命的前沿阵地。

……梅仲宇这天回来得比往日早，心事重重，他在研究所也挨大字报批了。夏晶榕颇感意外地问：“研究所也贴大字报？你们那儿又没学生！”

“大字报上打了很多问号和惊叹号，这张大字报前站的人最多……”突然梅仲宇跳起来大声说：“我不信爱国有罪，明天我就去找他们，他们不会不讲道理。”

孟妈第二天不到八点就离开了梅家，手里只提着一个小包，她擦着眼泪向储蓄所走去。

街上传来整齐划一的喊声：“要武，要武，要武！嘭！嘭！要武，要武，要武！嘭！嘭！”。那沉重的脚步声像是要把他们踏碎。一队自行车载着清一色的女红卫兵停在了门口。……

一盒火柴扔到了梅仲宇面前。他的心已经降到了冰点，他感到全身麻木，手的动作僵硬，他哆哆嗦嗦地把面前的那堆纸搜拢来。这时身后又传来那个嘶哑粗野的声音：“一张一张烧。”

……夏晶榕穿着白色高跟鞋，举着棕色高跟鞋，在大青砖铺砌的院子里，高一脚低一脚地绕着正跪着敲脸盆的丈夫转圈跑。四周疯狂的笑声、叫声、加油声响彻了这个往日静谧的小院。

……“仲宇，你在说什么。”夏晶榕不安地问道，她真怕憨厚的丈夫受不了。

只见梅仲宇睁大了眼睛对妻子大声说道：“Something is wrong!”

……夹竹桃以它那二十多种毒素，随着甜蜜的麦乳精液汁，侵入到了饮用它的那三个人的肠胃、心肌和中枢神经，夏晶榕额外加的那些安眠药粉末，免除了这几个人的最后一点痛苦。

……冬生走出自己的房门，发现其它几个房间门都开着，里面一个人也没有……他看见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爸爸的玫瑰红领带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妈妈的漂亮蓝绸衬衫在热风中轻轻拂荡，姐姐的绿裙子上沾了不少手臂洒下的鲜血。正当他想喊叫扑向他们的时候，突然一只大手抓住了他的肩膀，另一只手捂住了他的嘴巴，把他从人群中拽了出来，拉到了院外。

……接下来的那一个多月里，北京城变成了一个尘埃蔽天、车辆满溢，人声嘈杂、水泄不通的地方。她既是首都，又是红卫兵的大兵营，几百上千万的红卫兵从全国四面八方拥进了这座城市，尚安妍忙得没有白天和黑夜，太多经历了长途跋涉、又没有得到食宿照顾的年幼红卫兵病了，有的甚至只是想家了。尚安妍又要治疗，又要劝导和安慰，还要帮着联系怎样能确保看见毛主席，怎样尽快地把他们送回家去。

……冬天降临北京城，西伯利亚寒流裹挟着刺骨的北风，把枯叶和撕烂的大字报从地上吹到天上，又从天上掷回地面，扑打着路边的行人，和不断按着铃铛顶着风骑自行车的人们。户外活动明显少了。可是，只要走进任何一个学校或机关的大楼，就会感到文化大革命的幽灵正在全中国盘旋。每一个走廊、每一座楼梯，都是川流不息的人群；每一个教室，每一个办公室，都是东一堆，西一簇的人头。人们的脸上是兴奋、是紧张，是迫不及待、是焦灼万分，是冷漠无情、是热情万状，他们像是赶去参加一个紧要的会议，去发表一个重要的演说，去传递十万火急的信息，或是去等待一个致命的审判。运动已经持续半年多了，现在卷进的人愈来愈多、愈来愈深，有的是主动投入的，另一些是被迫参加的，还有一些只在一旁观望。于是下象棋的、织毛衣的群体出现了，旁边的人可能就在绞尽脑汁书写下一张大字报，或另一份检查。

春未，医院按中央指示要向南方派医疗队，尚安妍没犹豫就报了名……

六月的一个清晨，尚安妍提着那个从劳改农场拿回来了的皮箱，登上了南去的火车。当尚安妍再次睁开眼睛时，火车正在加速行驶。她看到刚刚跳出地平线的红日正倾泻着万道金光，把车厢照得红似火烧，她心中仿佛滚过一道热流，她暗暗对自己说：“总有那么一天，我将再次登上北上的列车，重返这座古城。

第二部 远离北京的地方

沐元县是长江南岸的一个小县城，城南有条沐水河，河那边是片片农田，远处有层层叠叠泛着红褐色的丘陵。

……那天晚上，尚安妍睡得很不安稳，总在做梦。梦中有人在她床前拉小提琴，她听到那熟悉的琴声，一下子坐了起来。只见床前拉琴的是梅仲宇，他身旁站着两个人，一边是夏晶榕，另一边站着的是剑生，她一下子吓醒了。她突然意识到：“那个活着的孩子应该是冬生！夏晶榕给我托梦来了，可是我现在实在不想见到她，她的眼睛充满了哀怨和担忧，她是来向我托孤啊！”

……就在这个时候，远处传来了一阵颤抖又高昂的呼叫声，那声音拖得很长很长，在浓浓的夜幕中显得那么凄凉，又令人发怵：“冬娃他爸，冬娃他妈，冬娃他姐，求求你们了，让冬娃的魂回来吧——”那余音拖得十分的长，十分的惨，似乎变成了令人心悸的哀号。武正兴听得出来，这是一个老女人的声音。当这个声音还没有完全消失时，另一个声音又响起：“冬娃子啊，回来吧——回来吧——”这是另一个尖厉一点的女人声音，比刚才的声音更高亢，那拖长的声调又凄凉、又骇人。听上去似荒野上的狼嚎。

……那天晚上没有特别的动员，已有成百上千的农民聚集起来了，他们阴沉着脸，喘着粗气。昔日老实的农民，一旦被惹怒了，就像一群匍匐欲扑的狮子，他们在等待天明。

……文革小报在中国历史上占有一个特殊的不容忽视的地位。那是一些油印的小报，是人们用蜡纸垫在钢板上，刻出整篇文章或首长讲话，再用油印机一张张印出，然后把它们散发到校园和社会。从毛主席那篇一锤定音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到如今点起了大江南北处处烽烟的江青七·二二“文攻武卫”讲话，都是以油印小报的形式飞向全国。那些千千万万没有机会坐在操场上，仰面望着文革旗手江青那意气风发的面孔，和聆听文革小组长陈伯达那一口没有人听得懂的福建方言讲话的人们，都可以从这些散发着油墨香、揉皱了、卷边了、破口了的小报上看到中央首长的讲话，吮吸着革命加暴力的营养，陶醉于置身革命的喜悦和品尝着暴力带来的恐惧。这些油印小报点燃了布满中国大地的干柴烈火，人们把它当作尚方宝剑，当作军机密令，当作护身法宝。小报被重刻、重印、重散发，被传到更多人手中和更远的地方。文革最初两年，也是一个空前自由的、无政府

状态的年代。特别是六六年十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任何人可以自立一个战斗队，自命为勤务员或者总司令，自己刻小报、印小报，贴到大树上、电线干上、墙头上和人心上。在那千千万万令人眼花缭乱的飞舞的文革小报中，曾出现过像遇罗克的《出身论》和杨小凯的《中国向何处去》这样令人振聋发聩、名留青史的杰作。在那个时代，多少人挥舞手中的笔，抒发心中的情怀并表述着自己的政见，他们似乎都变成了一流的战地记者、社论撰稿人、雄辩的政客和指挥千军万马的司令。那潇洒淋漓的大字报毛笔字，召唤阔别多年的人文脉络；娟秀的字体、隽永的文章，从钢板上流淌到滴血的躯体上。而一切野心家、阴谋家、恶作剧者和善于诬陷告密的人，也发现了文革同样是他们可以纵横捭阖的大好时机和广阔舞台，他们趁机撒布歪理、造谣诬蔑、打击报复、落井下石、杀气腾腾。那是一个荒蛮的，混乱的、最有人性也是最无人性的时代；那是一个久为压抑而得到释放，久旱逢甘霖、如饥似渴追逐自由的时代；那也是顽固的守旧者、僵化的教条者和“十七年”捍卫者们，仇视所有美好文明、优良传统的反扑围攻大好时机。自由时代是短暂的，虚幻的，遇罗克在散发了他的《出身论》后三年被送上刑场，一颗子弹结束了年轻的生命；杨小凯也因为他那赢来多少人共鸣、赞美和诅咒的《中国向何处去》而图圉大狱十年。而那叫嚣“文攻武卫”的文革旗手江青呢？她后来竟然也被判处死刑，也许是念着她是毛泽东夫人而缓期执行，不过最后她选择了自杀的方式离开了这个她曾如此叱咤风云的世界。

……没有等到枪声响，那两个工人听到吉普车呼啸着开进县城，在城门楼下飞驰而过时，他们就心惊胆战地抡起了鼓槌。几十年静静地、与世无争的大鼓发出了沉闷的、骇人的“咚——咚——”的鼓声，在黎明前的黑暗里，那鼓声传遍了静谧的县城，越过了大桥，传遍了桥南寂静的空旷田野。

……当那不紧不慢沉沉的鼓声越过大桥、涉过沐水河，横扫田野传到红旗公社时，社员们都静了下来。他们屏住了呼吸，仰起了头，竖起了耳朵，他们根本不知道是谁擂起的大鼓，他们只把它当作战斗的号令。初始鼓声的节奏很慢，声音来自很远的地方，但是它很稳、很重，像是巨人的铁蹄踏出一个又一个的脚步声，它似乎在呼唤这群摩拳擦掌的人们，他们等待的时刻终于来临了。这支队伍，看似散兵游勇，但是深藏着十多年积累的所有愤怒与不满，和对未来无尽的希望与失望，铸成了不可抗拒的力量，远处传来的鼓声就是号角，他们无声地在

公路上向县城簇拥过去。几百上千人的草鞋和布鞋、跑鞋和胶鞋，还有那些什么鞋也没穿的厚实的光脚板，踏得尘土蔽天，在那黑黝黝的夜空，腾起了一股尘埃迷团。有人挑起了马灯，幽暗摇曳的灯光被尘埃遮去了光辉。于是有人扯下了衣袖，捆在木棍上，打翻了油灯，一个火把照亮了坑洼不平的土公路。于是所有马灯都变成了火把，火光中升腾而起的巨大的骇人尘埃迷团，似乎要把这支农民大军引向不可知的远方。人们向着鼓声传来的方向走去，鼓声已经由初时缓慢而坚定的“咚——咚——”，此刻变成了节奏加快的“咚—咚—”，像是无声的命令，人们加快了脚步，于是老人、妇女，十几岁的孩子渐渐落到了后面。走在前面的都是那些年轻的、气盛的，对前途充满希望而又几乎一无所望的青年农民们。

……冬生突然对温尔雅蹦出了一句话“什么是 Something is wrong?”

温尔雅惊讶地看着冬生：“冬生，你原来会说英文啊。这句话是谁说的？”

“爸爸！”冬生告诉温老师，在他们家的最后那个夜晚，爸爸在客厅里来回地走着，口中反复重复这句话。当温尔雅教他英文时，这句话竟然从记忆深处跳了出来。

“这句话是指‘什么事情错了’，我不知道当时他指的是什么。”温尔雅说着抬起头来，像在思考什么。他问冬生：“冬生，你记得大武叔叔走的那个晚上，在我这儿，杜老师对你说的那些话吗？”冬生点头。温尔雅对他说：“我来教你用英文说出杜老师提出的三个问题。你爸爸提的问题算是第一个问题的话，那第二个就是 What had it gone wrong（什么错了？），第三个是 Why had it gone wrong（为什么错了？），第四个是 How had it gone wrong（怎么错的？）”冬生跟着把这三个句子重复了许多遍。连同爸爸的那个问题，他把它们牢牢记在心里。温尔雅和杜医生好像都寄希望于这个小男孩，可是他还不到八岁。

……他想起尚阿姨对他说的话，便不假思索地张开了口，为了克服内心的恐惧和浑身的战栗，他用足了全身的力气，声嘶力竭地、一字一句地喊了出来：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那一声“万”字挑得又高又颤抖，持续了足有五秒钟，好像男高音在高八度

的拖长音后，经过一个短暂的换气才落到“——里——雪——飘——”全场愣住了。无论是会议主持人，还是推着冬生上场的那个专案组的人，全都手足无措。

……尚安妍带着冬生，坐上了小吕开来的小吉普，从城关医院直接开往省城火车站。小吉普在公路上飞驰着，两旁农田盛开着大片的油菜花，像是黄澄澄的地毯，那是尚安妍曾经衷心赞美过的初春美丽大地，可惜今天她没了这个兴致。此时她眼中那无尽的油菜花田野，仿佛是巨幅黄色挽幛，它们一直覆盖到天边。

尚安妍和冬生挤在硬卧车厢的中铺，正向北京驶去。五年前，她带着天真的幻想来到这里，以为到了世外桃源。五年来，她遭遇了那么多残酷的劫难和伤心的经历，可是她竟然挺过来了，活下来了。而且，她找到了夏晶榕的那个侥幸存活的孩子，她找到了冬生，她正把他带回北京。当初那个看似遥不可及的梦想，奇迹般地实现了；它还会延续到生命的下一个乐章吗？

第三部 重返北京城

尚安妍听着鼻子直发酸，不知是何滋味。那人看出来了，心想大概是个年轻寡妇，死了男人，从没当过家，带个孩子也不容易。他登上三轮转头又说：“去杂货铺买个火钳、铁钎，还有拔火筒，有拔火筒炉子立马就窜上火苗了。”临走又把火柴扔过来：“这火柴留给你吧，买火柴还要烟票呢。”

……春节到了，这是回北京过的第一个年。可是他们没有副食本，无法买肉、无法买一户一斤的黄花鱼、大花生，更不要说白糖、鸡蛋。过年向阳红饭店也要关门三天。十年前，她曾在冬生家过了一个那么丰盛的、令人难忘的除夕。现在却难为她这个拙妇来做无米之炊。当远处传来阵阵爆竹声，谢大夫也到男朋友家过年的时候，尚安妍搂着冬生的肩膀，默默地坐在中厅的沙发上。

……穆大爷倒是像进自己家一样，一屁股坐到了方桌一边。大家先闲聊了一会儿，穆大爷说道：“听说学校又在问户口呢！按说上初中，任你哪个学校也得看户口，冬生要是夏天以前办不下来户口，这初中就耽误了。我琢磨着，尚大夫，您要想解决这个难题，非得找一个衙门……”

“什么衙门？”人人都伸着脖子发问。

穆大爷用手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北京市公安局！到夏天还剩几个月，憋摸着吧！”……

尚安妍坐在公共汽车上，又出现许久没有过的、从心底发出的寒战。她紧咬着牙关，不让牙齿打战发出声来。她看不到星期日上午已经熙熙攘攘的大街，她满脑子正天马行空地驰骋，她终于有了一个机会去解决冬生的户口难题，可是她觉得她是在赴刑场。

……冬生终于报上了他的北京户口。尚安妍不记得她为此跑了多少路、求过多少人、操了多少心。经历了一年零三个月，可是最终户口拿到的时候，还不在她手中。她感到她终于完成了她的心愿，让冬生能像个正常人生活，有起码的生存权，有他应得的一份口粮，能接受基本教育，有自己的尊严。这些都做到了，可是她自己呢？却感不到一点高兴，甚至只觉得悲哀阵阵袭来。

……尚大夫要结婚的音讯迅速在中心医院传开。所有人都好奇那个男人是谁。当人们知道他就是以前医院维修班的那个大大咧咧的工人大武时，就不吭声了，只是小声地交头接耳……。

就在尚安妍的支部书记滔滔不绝地表扬这位新娘时，武正兴看见从门外进来一个高高个子的人，那人站在阴暗的角落，立了不一会儿就又走了出去。他觉得那个身影有点眼熟，就向冬生招招手，悄悄地对他说了几句话。冬生跑了出去。

片刻冬生回来，扒在武正兴耳边说了句话。只听武正兴低声说道：“啊哦，来晚了一步！”

原来刚才在后边阴暗角落显身的那个高个子，不是别人，正是温尔雅。

……新婚之夜，这对新人没有圆房。

……温尔雅疑惑地看着门，心想：“谁会来找我？我是北京城没有一个认识的人啊！”

当那个“除了不会治病什么都会”，而今已是尚安妍丈夫的大武站在他面前时，温尔雅惊得目瞪口呆。武正兴把帽子摘下使劲往地上一摔，跺着脚喊道：“温老师，你咋不早点来啊！”

……一向信口开河、口无遮拦的武正兴第一次感到不知如何开口。从武正兴的举止和表情，她预料不会是好消息。当心中的寒战似乎要发作的时候，她终于抬起了头，两只眼睛直视武正兴。武正兴无奈地站到她面前：“温老师来了。”

……尚安妍一边走着，一边哭着，一边想着，她为什么不在房间里再多看他两眼，他怎么还有勇气吻我的头发。我和大武到现在都没有过一次拥抱或接吻，以后也不要有了。可是我现在却要回到他的屋里，要和他躺在一张床上。尚安妍抽噎得更凶了。那段宽阔的人行道上，寒冬的夜晚是没有什么行人的，没有人会注意到一个高高个子的女子，在那里边走边心碎肠断地哭泣。

……“要我帮冬生补习？不对！不是这个说法，不该用这个词。妳应该说的是：让我收冬生做我的学生！”甘老头昂首阔步地边走边说：“冬生将是我此生的第一个学生，也是最后的一个学生，也是我唯一的一个学生。”忽然，甘老头把他的眼镜摘了下来，两眼汨汨地涌出了眼泪。他喃喃地说道：“我本来应该有许多许多的学生啊！我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先生，一个好的 Professor（教授）。我可以教十多门课，我应该在大学阶梯教室里，面对几十上百个学生，讲普通物理和高等数学。我可以在小教室里教电动力学、电工学，教量子力学。我还可以教场论呢！我可以教本科学生，我也可以给研究生上小课，指导他们写毕业论文。可是我这一辈子，没有教过一天书，没有带过一个学生啊！呜——”

下个星期一，冬生梳洗干净，把白衬衫塞进蓝裤子里，手里拿了一个妈妈给他新买的本子和那支温老师给的金笔，不安地站在他曾无数次来过的甘先生南屋外，激动地伸手敲了敲门。随着“吱扭”一声响，门开了；只见门后站着一个穿着笔挺西装、胸前系着一个大红领结、精神抖擞的小老头。他正是昔日缩头缩脑、衣服褴褛，如今一副教授派头的甘先生！

……甘先生一早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后，就急不可待地直接跑到西单邮局买了一份报。那天的报纸，早上十点就卖完了。甘先生此时想的是他的那个十多年没见面的儿子，他算算儿子今年二十二岁。“他会知道这个消息吗？”他不知道他的儿子此时在何方，他急于要告诉他：“岁不我与，快去报名，交五毛钱，两张照片，去报名，去考试！”

那是冬末一个严寒的下午，武家大院的门在几声不很响的敲门声后，被轻轻地推开了。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跨过门坎进到了院子。当时只有丁婶在自家门口扫地。她抬头望着这个陌生的年轻人，只见他的个子不高，神情紧张，可是那张脸的瘦削轮廓，还有，那张薄薄的嘴唇，看着总觉得面熟，只是想不起来像谁。她没等来人开口就问道：“你找谁？”

“我，我打听一个人。”那个青年胆怯地问道。

“打听谁？”丁婶问得很响亮。

……甘先生还楞在那里，他支配不动他的两条腿了。穆大爷走上来拍了他一下，他似乎才猛醒过来；对着久别的儿子，他大声问道：“你考上了？”

……北大知道了冬生被加州理工学院录取后，系里的老师竟也奔走相告。尚安妍感到欣慰的是，冬生拿到的是全额奖学金，还说每周可以在校园打工十个小时，挣零花钱呢。甘先生得意地用手指敲着桌子说：“我早讲过，你是他们二年级的水平，没错吧！”

……冬生紧紧地握着甘先生的手，半天说不出话来。甘先生说：“不用说了，好好念吧！在那儿可就不会这么容易了啊，有空来信让我知道你的真实情况，嗯——，真实情况，真实感受！”说着声音也有点哽咽。他也伤感地意识到，也许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唯一学生了。

……冬生抬起头，用那双泪眼望着妈妈，问道：“妈妈，您说什么？”

尚安妍又说道：“我说让你不要回来，永不回来！”

冬生走了，带着永不回来的誓言走了。他从飞机上的小窗口，望着那渐渐远去的北京城，那充满了温馨与焦虑、快乐与痛苦、希望与失望、生命与死亡、光明与黑暗的故土，越过太平洋，向彼岸飞去。

第四部 大洋彼岸

当飞机迎着朝阳飞到了西半球，这里仍是阳光明媚的上午。冬生提着皮箱，茫然地走出机场，在各种肤色和服装，各类表情的人海中，寻找出租汽车。突然耳边一声呼唤：“冬生——”。叫冬生的那人正是冬生的温老师，那个谁也没有想到会出现在这里的温尔雅。

……冬生指着刚才开过的那条街道说道：“Appleton，刚开过的那条街是Appleton！我跟姐姐吵架，她说她生在Appleton，我说她生在Apple，生在大苹果里；姐姐对我喊不是Apple，是Appleton……”冬生仿佛回到了十三年前，那个小客厅忽然在眼前闪现。他在前边跑着喊：“Apple！”姐姐在后边追着：“不是Apple，是Appleton……”

……冬生大学毕业时，温尔雅实现诺言，带着小燕作为冬生仅有的家属，参加了毕业典礼。在校长念到毕业生梅冬生的名字时，他们也站起来大声欢呼了一番。

……他小心翼翼地向前走去，Appleton 街牌赫然出现在眼前。姐姐追在身后的喊声又在耳边响起：“Appleton！不是 Apple，是 Appleton……”

眼前出现的正是 Appleton！姐姐的声音正从深深的幽谷冉冉升了上来：“那个 Appleton 的房子前面有棵大树，开满了花，我从街上就能看到……”

就在此时，他隐约听到从房后传来阵阵人声、歌声。他情不自禁地踏上了屋前草地上的石板小径，寻着声音向屋后走去。当他走到房子一侧时，他听到了，那歌声出自一个小女孩，她唱的竟然就是他再熟悉不过的“Mary had a little lamb……”冬生情不自禁地迎着歌声走去。屋后是一个绿草如茵的花园，园子两角也有两棵和屋前一样的花树，一棵披满白色的花；另一棵和屋前的那棵一样，花是浅粉色。……这些人中，唯有她没有看到身后走来一个陌生人，而另外那四个人，都望着愈走愈近的冬生。他们脸上的表情，从起初的不解，然后是疑惑，再到惊讶，尤其那位白发老先生，他向前探着身子，慢慢站了起来。小女孩不知是何故，戛然停住了歌声，掉过头来，吃惊地望着越走越近的冬生。冬生没有停住脚步，他接了上去继续唱着：“Mary had a little lamb, little lamb, little lamb……”声音却越来越低，沙哑中似带着哽咽。那位白发老妇人也站了起来，他们都走向冬生，冬生也向他们走去，他心儿激动得发颤，他犹犹豫豫地伸出的两只手也在不停地颤抖，只听到那位白发老人轻声喊道：“Mason……are you?”（梅森，是你吗？）说着他紧握冬生的手。冬生本不知谁是 Mason，可是此时此刻，他全然明白，他们把他当作二十五年前的父亲了，他轻声说道：“我是他儿子。”

……远在北京的尚安妍，意外收到冬生寄来夏晶榕二十多年前的照片，喜极而泣！照片上的夏晶榕比她们初见面时要年轻，也更甜美。不过基本的轮廓，恬静的笑容，和善的眼睛和娴雅的气质，完完全全是她心中的那个夏晶榕。看着看着，尚安妍一双泪眼渐渐模糊，只见夏晶榕携着一股无声巨浪，从照片上走了下来。她的仁慈和博爱像山涧流下的清澈瀑布，荡涤着那些当道的豺狼虎豹；可是，随之一股妖风卷来，遮天蔽日，又把她推了回去。啊，这个令人心悸地突然从人间消失的可怜人儿，今天，她又回来对我微笑；不，不止是微笑，她是来告

诫我，不要忘了我们，不要把昨天的门儿关闭，为了不让冬生再走我们的路，做点什么吧！

“……冬生看了信，极力从记忆深处去寻找关于那个小提琴暗盒的秘密，可惜毫无印象。现在他比任何时候都更想找到那把琴！他暗自叹道：“我的祖父祖母，我的外公外婆，我的亲人们，你们现在还在世吗？二十年没有自己儿女的音信，你们会怎么想。你们会认我这个孙儿吗？我的那些从未谋面的亲人们啊，你们现在在哪里？”

……在计算器房里，冬生远远地看着她；冬生已经来过很多次了。那个女学生做梦也不会想到，在她身后不远，正有一个人紧紧盯着她，一动不动。

三月的一个晚上。室外寒风呼啸，严冬迟迟不肯离去。冬生裹着几年前买的那件羽绒服，习惯把领子竖起来，挡住向脖子里钻的寒风。那天晚上，冬生就是这身打扮：竖起领子，脸冻得通红，裹挟着一身寒气走进了计算器房。此时屋里就剩下一个人，正在赶实验室报告的一个女学生。冬生向她走去，五步之外，他停了下来。那个女学生好像听到有脚步声进来，不过她并没有回头，这里人来人往，她没有在意；当脚步声在不远处停了下来，她注意到了，回头，陡然看见一个高大的身穿羽绒服的人，站在离自己不远的地方。她脱口问道：“你找谁？”

“我找你！”那个人说道。

“你是谁？”她紧接着问了一句。

冬生什么话也没说，只是把羽绒服脱了下来，只穿了一件毛衣的冬生显出了原形。他问道：“你不觉得我像什么人吗？”……

……他犹豫了半天，可是他不能总站在门外。终于鼓起勇气举起了右手，轻轻敲了三下。

里面传来一个由远而近的声音：“谁啊——”温尔雅分辨出了那个声音，就是在千万个声音里，他也能分辨出她的声音。他紧张得喉咙干了，什么话也说不出。他听到脚步声走了过来，是她站在门后，又一声传来：“你找谁？”……

……温尔雅隔着一扇门，几乎被那熟悉的声音融化了。他有气无力地回答：“是我。”

门锁开了，门没有马上打开；稍后，开了一个小缝，门后边露出一张疑惑不定的脸，“是你？尔雅，你，你怎么来了？”随着那声惊讶的呼喊，门全开了。

温尔雅不请自进，结结巴巴地说着：“我，我来北京开会，来看看你。”

……温尔雅说：“我明天晚上六点一定去你家。”他们都知道，后天上午，温尔雅就要起飞回去了。他们盼望明天的最后一次见面。

可是那天尚安妍遇到一个垂危病人，一个濒临死亡的病人，病人家属还不

在北京。她在打了三个电话后，终于找到了温尔雅，她在电话上带着哭腔对他说：

“尔雅，真对不起，我实在不能走开，我的这个病人过不去今天晚上，她又没有家人在这里，我实在无法把这个病人扔下不管。尔雅……”她已经抑止不住呜咽起来。

电话那头传来温尔雅轻柔的声音：“别哭，安妍，你做得对。听我说，安妍，还记得我以前跟你说过的那部美国电影《卡桑布兰卡》吗？”

“嗯，我最近刚看过。”尚安妍抽抽噎噎地回答。

“记得最后在机场上那段对话吗？‘We were always in Paris’。”

“记得，‘我们永远在巴黎’。”尚安妍几乎哭出声来。

“对，我们永远在北京。安妍，你永远在我心里。”温的声音从远处飘来。

……冷冰那天到系办公室取邮件时，发现一封没有署名的来信。冷冰急忙抽出信，首先翻到第二页，只见落款处赫赫四个大字“知名不具”。她的心跳马上加剧，她知道是谁的来信，急忙把信塞到书包里。那天一直到晚上回家才打开那封信。

“冷冰学友，很遗憾我现在必须这样称呼你，尽管我并不情愿。我们都来自大洋彼岸，我们都来自同一个时代，但是我们又是那样的不同：不仅仅是我们过去的遭遇不同；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对那个时代和那些遭遇的看法截然不同。我知道我不可能改变你以及你的观点；如果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时光的流失，你对你在那个时代的所作所为仍然毫无悔过之意的话，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怎么可能落在我的肩上！……没有人让你承担整个运动的责任，你本来也不是那种天降大任的斯人之列；但是对你自己的责任，自己的罪愆，若无丝毫忏悔，你可以戴一顶博士帽，但是作为地球上人类中的一员，从人格上来说，你不够格！因为你失去了良心。”

信的落款是那四个让她心惊胆战的“知名不具”。

…… “安妍，我在想，也许人类历史的长河，之所以经历了多少暗无天

日的岁月尚能延续；也许中国人民，经历了万般劫难与折磨尚能存活，正是因为他们在他们之中，有像你这样的人，在任何艰难险恶的境遇中，都能坚韧地勇往直前；在任何腥风血雨中，还能显露出闪烁着光芒的人性！你在我心中的分量更重了，我以有你这样的朋友而自豪。安妍，珍惜自己吧！也许我应该像你信中所提及的，从心理学的角度去剖析那个恶梦。我曾经做过一点浅显的研究，终因自感这种研究几近自虐而放弃。你的来信给让我惭愧，我不该沉湎于个人悲痛，应该像你一样走出来。希望我有足够坚强的神经和意志去做这件事。请给我力量和祝福吧！你的挚友 尔雅。”

尚安妍读完这封信，把它紧紧贴在胸前。她感到今生不仅遇到挚爱，也遇到了知音。

……照片上的姐姐，天真烂漫，一脸喜气洋洋。妈妈说，姐姐永远是热力四射，像是要张开手臂拥抱每一个人。当她知道父母决心带全家赴黄泉时，却悄悄地救下了我……

难怪安德森夫妇当初看见我就叫梅森；鲍勃夫人看了照片就想起我。从照片上看，我确实很像父亲呢！父亲看上去诚恳，乐观，是个心胸开阔，毫无城府的人；好像我也是这样的人。照相的时刻，他决不会想到，那年夏天，他会携全家走上死亡之路。

最后他把目光定在了母亲身上，那个被妈妈称为世上最伟大的母亲，最可敬可亲的人。妈妈只见过母亲几面，可是妈妈就能那么坚毅地担当起把我抚养成人的重担。过去只知道妈妈了不起；现在看着照片上的母亲，她慈祥又亲切，美丽又大方，高贵又谦和，她浑身散发出一种圣洁的光环。她正注视着我，啊，母亲！你一定是个了不起的人，你想拥抱全世界，可是这个世界却抛弃了你。你充满仁爱之心，同情心，让妈妈那么真切地怀念你。你要知道，正是由于你的人格力量，你的道德感召，使得妈妈以超出常人的勇气，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付出了不可思议的努力，把你的儿子抚养成人。你该瞑目啊！冬生整个晚上对着照片，喃喃私语，像是在对几个逝去的亲人，述说别后二十年的种种际遇，直到天明。

……冬生登上回国的飞机了。九年前，当他来美国的时候，曾在北京机场发誓永不回来；可是现在，他回去了，冬生知道，他想做的事情，必须在那块土地上，在自己的祖国，在那十几亿同胞之中。……冬生轻轻拉开一侧小窗的窗帘，

此时窗外是漆黑一片。冬生望着黑夜的窗外，那是浩淼的太空。他似乎看到了那无数敢于直面人生的勇者的悲壮身影，那些倒下了的和消失了的，还有经过炼狱顽强地活下来的，此时正从他的眼前一一飘过。他想让他们知道，后人是不会忘记他们的，会踏着他们的脚步继续向前走，他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知道这样走下去，他早晚也会摔下那个深不见底的深渊。但是，如果在此之前，他要能做一点事情，为死去的父亲、母亲和姐姐，为阿婆和大阿婆，为所有那些在那个非常年代不该死去却又悲惨死去的人们，做点事情，让他们不至于白死！

……对妈妈的歉意，这些年不时缭绕着他那正成熟的年青的心。每当想起自己的生母，冬生心中总会升起一种仰望圣母般的崇敬；可是只要他想起妈妈，他的那个养母，他却会像与久别亲人重逢的孩子般感到鼻酸，眼泪会涌上来，他想向她诉说心中的无尽思念、无限感激和永远无法说出口的万般歉意。

尚安妍此时正坐着民航的班车去机场接冬生。九年前，她曾谆谆告诫他，永远不要回来；现在，他却回来了。尚安妍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

……尚安妍曾经独自去过一次，那个在西山法海寺遗址上，刚建起的金山陵园。……甘先生曾经问过她，“你不觉得让他们俯视这块夺去他们生命的伤心地有点残酷吗？”

……这些年，她那短暂而永恒的挚友一次次神奇地显灵。这一次，当她来到金山上，又一次感到夏晶榕与她一起在那山坡上游荡，在一起俯视远处像海市蜃楼般浮现在薄雾之中的北京城。那座古老而又崭新的城市，曾给这个小家庭带来过欢乐和希望，更带来了悲伤和灾难，尚安妍真真切切地感觉到夏晶榕愿意留在这里。这就是历史，那应该永远留下的，不被遗忘的，不被曲解的历史。他们的坟茔将向世人和后人，向中国和世界揭示那个罪恶的年代，和制造罪恶的人。冬生这次回归，也许就是为了让父母、姐姐入土为安，为了让他们能在这里，静静地俯视那座城市，和由它带领的那个国家，将如何蜕变：或沉沦，或新生。而冬生将在这场变革中，显示他不愧是我们的好孩子，也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

飞机降落的刺耳声正划过天空，民航班车徐徐驶进了机场…

【评论】

一部描写文革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读姚蜀平的《悲情大地》

陶东风

自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以来，文革题材小说可谓汗牛充栋，但像姚蜀平的《悲情大地》那样堪称百科全书式的文革题材长篇小说并不多见。它通过主人公尚大夫（尚安妍）一生离奇曲折的悲惨经历，把文革不同时期的人物遭际和时代风云串联起来进行了全景式的描写。小说对几乎所有文革期间（以及文革后一段时间）的重大历史事件（包括被称为文革序幕的“四清”运动，1968年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大串联，“文攻武卫”，“五七”干校，“批林批孔”，知青大回城，恢复高考等）均有涉及。这些不同的历史阶段与形形色色人物命运的变化跌宕紧密地扣连在一起，通过人物命运反映了时代变化和文革进程，带有百科全书式的分量。由于小说的主人公是知识分子，这部小说也可以说是当代知识分子的苦难史。

小说通过众多人物，特别是主人公尚大夫的戏剧性命运，把这场所谓“史无前例的伟大革命”的混乱、残酷、随意、荒诞写得入木三分、淋漓尽致、惊心动魄。尚大夫是一个美丽善良、有才华有事业心的年轻知识分子，本来应该有自己出色的成就和幸福的爱情，但由于在一个舞会上遇见到了神秘大人物牛主任，就注定了其无比悲惨又无比荒诞的人生，过上了完全无法自主的、仿佛被命运牵着的苦难生活。初次阅读小说，最强烈的感觉就是人物命运的戏剧性：一切都是那么的不可思议。被牛主任通过特务般的手段诱奸以后，她先是被神秘隔离，然后是到劳改农场，接着是下放到南方一个小城医院，与朋友夏晶榕失踪多年的儿子冬生相遇。不仅如此，尚安妍更与文革中落难的牛主任意外相遇（作为尚安妍的病人），等等。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一切不可思议的人生遭际放在文革时期中国式极权主义环境中解读，就不难理解其内在的“逻辑性”和“合理性”：那场以“历史必然性”的名义发动的“伟大革命”，实际上是一场通过国家暴力机器和毛泽东的个人意志控制的彻头彻尾的闹剧，它彻底违背了常识理性，剥夺了个人

的任何自由，荒诞其实正是中国式极权主义的内在本质。全国人民都被这场闹剧的导演者玩弄于股掌之中，这就是中国的悲剧，也是中国的现实。

再比如，作品中的右派知识分子温尔雅，根本就不是“右派”，但被当成右派批判了几十年。更荒唐的是，由于他不是“右派”，因此名字也就不在右派名单里，结果在1962、1963年给大量右派摘帽时也就没有他的份，致使其右派身份永远无法得到改变；杜先生（也是一个医生）因为与托派分子堂弟的名字只有一字之差也被打成“托派”。这一切都说明，那场遵循所谓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客观规律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际上是一场荒诞随意之极的、毫无章法的闹剧，简直不可理喻，也无法理喻，它使得文革时期的那句口头禅“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成为极大的反讽。

当然，《悲情大地》对文革的描写不仅是全景色的，同时也是深描式的。小说不是抽象地、粗线条地勾勒大跨度的文革，而且把笔触深入到了日常生活中的文革。比如小说写到文革后期的粮票、布票等供给制对于人的日常生活的影响，实际上是借此从一个侧面表现了极权社会的经济政策对于人的日常生活的控制（这种控制无疑是其他控制、如思想控制的物质基础）。在这里，国家制度和个人生活之间的深刻关联，通过具体的细节描写中变得感性化、具体化、生活化。再比如户籍制度对人的控制。小说对冬生随尚大夫回城后落户口时遭遇的种种麻烦的描写，非常具体、真实、可信，没有过多的议论，但把户籍制度如何限制和剥夺人的自由写得入木三分。这大约就是小说的优势：国家制度的非人性或反人性性质在小说中得到了感性的揭示，粮票、邮票、户口等等不再是一种抽象的数字或符号，极权制度也不再是抽象的理论或概念，而是对日常生活的实实在在的控制。这些都体现了作者善于通过人物的日常生活遭际来呈现极权制度对于人的控制。

当然，《悲情大地》也存在一些弱点。

首先，作品似乎过于追求传奇化、戏剧性的效果。一方面，极权制度下的个人生活和个人命运的确存在不可捉摸的、无法自主的一面，但这种不可捉摸和无法自主是制度性的，而不是因为个人原因，更不能归结为神秘的命运捉弄。就其主流和基本面看，《悲情大地》写出了主人公尚大夫（当然也包括其他一些次要人物）传奇性、戏剧性的命运和社会时代特别是政治制度的关系，但也由

于作者给尚安妍的一生安排了太多的巧合和奇遇，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其悲剧命运的政治性和制度根源，甚至使其苦难经历传奇化、神秘化——当一个人的经历被描写得太不可思议的时候，就会变得似乎是不可解释的了。使得导致人的悲剧性命运的本来非常具体的社会历史原因神秘化，整个小说似乎就是由一系列的奇遇构成。不但尚安妍的经历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因素，就是冬生（东娃子，尚安妍的养子）的经历也过于传奇化：被孟妈救出后带到乡下，恰遇下放那里思想改造的尚大夫；改革开放后到美国后又遇到温尔雅。还有，尚大夫和武正兴正好在结婚的那个晚上出现了温尔雅，太戏剧化了。我猜，作者还深受80年代初期伤痕小说的奇遇化叙事（比如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郑义的《枫》）的影响，总想把故事写的曲折离奇，因此安排了各种各样的巧遇。但过分的奇遇化会导致把政治悲剧改写成命运悲剧，这是必须引起注意的。

其次，过分的奇遇化还会使得主人公的经历失去典型性和普遍性，不再像是发生在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带有普遍性的事件。其实，文革时期像尚安妍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命运，更多情况下可能是：一方面是充满了自己无法控制的荒诞和不可思议，但同时又是长年累月的频繁枯燥生活（这点在韩东的《扎根》和老鬼的《血色黄昏》中写得比较好，它们都写出了下放到农村的知识分子或知识青年群体长年累月的机械重复、无聊之极的日常生活），其写作风格也更为纪实。

其次，《悲情大地》中有不少议论——有作者的，更多时候是作品中人物的——是非常精彩和深刻的，它们其实表达了作者对于文革的理性思考，但作为文学作品，这种议论太多，太不节制，就会导致作品的说教化和人物形象的概念化，失去了小说的特点。小说太多地方作者自己跳出来或者借助人物发表长篇大论，甚至作品人物经常成为作者政治观点的传声筒。这也导致人物语言显得缺少变化（也许几个次要人物除外，如孟妈，武大兴，他们的语言之所以有个性，恰恰由于他们不发表或较少发表政治议论），尚大夫、杜医生、冬生的议论在语言风格上几乎没有区别。这个人说的话也可以换成另一个人的，说到底，它们都是作者自己的语言。

【评论】

《似水流年》——文革浩劫的悲歌 (节选)

何启治

先后任教美国多所高等院校的姚蜀平，4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似水流年》最近由广东花城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以饱含血泪的笔墨，抨击中国文革十年浩劫的小说，是一曲用发自心底的真情，呼唤中国人绝不允许文革悲剧在神州大地重演的悲歌，值得重视和肯定。

知识分子 苦难历程

从姚蜀平为我们讲述的故事中，不难发现一些耐人寻味的特点：

从政治上看，这部小说可以视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史。写文革可以有多种视角，而《似水流年》则是从知识分子经历的苦难和锥心之痛的角度来反映。可以说，它是一部关于中国文革大灾难和大悲剧的故事。

小说给我们提供的第一个惊心动魄的恐怖画面就是梅仲宇、夏晶榕一家的被迫自杀。没完没了的批斗，皮带和拳脚的抽打，剥夺尊严的人身侮辱，对美貌女性的淫邪目光……在被打得皮开肉绽、受尽凌辱之余，梅家三口只能服毒自尽，以死抗争。然而，比起夏晶榕一家，尚安妍的试炼却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更加坚韧的精神。先是被骗奸，而后把她贬到荒寒的“盐城一号农场”；在远离北京的小镇当医生，在生存问题上几乎陷入绝境；武斗现场巧遇被孟妈搭救的梅冬生，从此为了冬生的成长和教育而忍辱负重并放弃真爱。尚安妍回到北京后，为恢复应有的待遇而奔波，为冬生的户口和教育而接受无爱的婚姻，并被迫放下尊严去求告加害者；含辛茹苦把冬生送到美国留学之后，还是孑然一身……。

尚安妍的悲剧人生，她经历的一切苦难，都引发读者对当代中国发生的一切作深刻反思。

角色鲜明 艺术丰富

从审美角度看,《似水流年》小说塑造了一些引人注目、内涵丰富的艺术形象,其中有的可以说是相当罕见的。

女主角尚安妍并不是被极左路线制造出来的什么“分子”,因而她的悲剧人生就具有更大的普遍性和代表性。她的悲剧命运既体现了善与恶、美与丑、人性与兽性的搏斗,也是对极左路线的有力批判。

牛侃养作为高级干部,有好色、自私的弱点,也有人性未泯的一面。作为“走资派”,经历文革的磨难之后,他对历史的反思也相当深刻冷峻。虽然要他完全否定自己的过去也难,但也不能简单地把他归结为坏人或者好人。这说明作者在笔下并没有把人物简单化。

梅冬生是在苦难和折磨中成长的青年,他四次死里逃生,蕴含文革中的四次重大事件(两次武斗、滥杀无辜的“民办枪毙”和天安门“四五”运动)。最后他赴美留学和追寻历史答案,故事铺陈合情合理。

小说中的杜医生和甘先生都是个性鲜明、内涵丰富的人物。前者涉及“托派”及其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学作品中是个独特的艺术形象;后者在早年归国的高级知识分子有一定代表性。

温尔雅是推进小说情节不可或缺的人物,可惜从艺术形象塑造来说却比较弱。冷冰代表的是红卫兵造反派中永不忏悔的人物。

批判文革 有力深刻

从文学的批判功能来看,小说对极左路线的批判是有力和相当深刻的。

小说借冬生给妈妈写信,把文革和二战中的法西斯暴行“并列为20世纪两大悲剧”。又把梅仲宇自杀前老在重复的话“Something is wrong(什么事情错了)”延伸到冬生在《留美学生通讯》中看到留美学生在1950年3月4日提出的12个疑问:“新中国究竟走的哪一条路?有没有言论集会等自由?我们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地位怎样?中国会不会歧视留美学生?是否我们一定先受训后,才有资

格做事？是否我们只能埋头做事而不能对新政权有任何批评和建议？我们在这里学习回国后还有用没有？是否新中国只要大家穷得公平，而不重视新技能、新知识？中共目前固然爱护人民，但在得势之后，会不会把人民一脚踢开？会不会像国民党一样渐渐腐败起来？它会不会出卖民族利益？会不会走上南斯拉夫的路？……”。

小说还借杜医生的口，以肯定语气介绍南斯拉夫人吉拉斯 德热拉斯写的《新阶级——对共产主义的分析》：“它的精髓就是讲革命后的政党，形成一个新阶级，一个政治官僚阶级，官僚特权阶级，他们占有国家资产，他们不仅统治，而且也剥削人民大众。”

小说在研究和表现“托陈取消派”这一重要的历史问题上，提供了新的角度、新的视野和理性地认识新的观点的可能性。这些比较尖锐、敏感的话题出现在小说中，既体现了作者的勇气，也说明了时代的进步。

披露历史 保留信息

从认识价值来看，这部长篇小说的时代感很强，也提供很多信息。在故事情节的发展过程中，诸如“四清”的背景、高层的内情、全国武斗、历年物价、工资的变动情况、国际共运和中共党内斗争史料，以至文革后恢复高考和1980年代留美学生的情况等，都有真实的披露。

读完《似水流年》，掩卷沉思，我的心情可以用“震撼”和“感动”来形容。说震撼，是因为它讲述的一个美丽善良而又勇敢刚强的女性在最美好的年华备受磨难的故事，而尚安妍的人生悲剧，折射出的是时代的悲剧，是海内外的中华儿女都不允许它重演的大悲剧。说感动，是因为尚安妍这个弱女子面对苦难的坚贞不屈，忍辱负重，一诺千金和一往无前，以及还有像冬生那样的年轻人，为了追寻国家民族前途问题的答案而不辞艰辛险阻。

中国在艰难中前进，不断地进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想，《似水流年》的读者，都会很自然地联想到屈原《离骚》中的这一名句。

（原载北美世界日报《世界周刊》2009年5月24日）

【评论】

《悲情大地》读者评论摘选

一位资深编辑对《悲情大地》的评论：

……值得关注的小说还有姚蜀平的《似水流年》（花城出版社 2009 年）。此书讲述的是一个女医生从五十年代到世纪之交的命运。女主角尚安妍文革前被中央高干诱奸怀孕，高干为隐瞒真相把她下放到劳改农场。文革中高干被打倒，尚安妍却以直报怨，没有趁机复仇。尚的儿子获得出国深造的机会，睁开眼睛看世界，一家人从觉醒走向反思。作者是一个高能物理专家，从事专业之余，亦爱文学创作，曾与人合作剧本《李四光》，拍成电影。她对自己同代人的遭遇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数十年呕心沥血，才完成了这部小说，并争取到公开出版的机会。

……坦率地说，最近十几年来，传统意义上的纯文学小说写作，远远滞后于现实，已经很少对中国社会做出有力的回应，很少成为震撼人心、启发思索的精神资源。中国的知识界已经觉悟到：“一个失去记忆的民族，是一个愚蠢的民族；一个忘了历史的组织，只能是一个愚昧的组织；一个有意磨灭历史记忆的政权，是一个非常可疑的政权，一个有计划地自上而下地迫使人们忘却记忆的国家，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心存恐惧的国家。”（朱厚泽语）但这并非主流文学界的共识。文学界的主流基本上沉浸在自娱自乐的氛围之中。恢复文学的记忆品质是重振文学尊严的途径之一。任何真正的个人记忆都是和国家记忆、民族记忆，社会记忆相通相连的。深刻的个人记忆，就是人性的记忆、人类的记忆。有人说奥斯维辛以后没有了诗，20 世纪的极权消灭了小说。诺贝尔奖百年纪念，瑞典文学院以“见证的文学”为题召开了一个研讨会，各国文学巨匠提出，文学应该起到为历史见证的作用，作家应该记录历史的真切感受，用自己的语言对抗意识形态的谎言。在这方面，尽管当今最给力的体裁不是小说，而是散文。但小说在揭示人的内心世界方面的优势也不能抹杀，况且当前出版小说比出版历史可以减少很多程序上的麻烦。

没有一个永远的主流文体，只有失记的作家和不失忆的作家。中国文学如何面对世界文学而问心无愧？是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刘少奇原秘书姚力文谈《悲情大地》（《似水流年》）：

文革中红卫兵的恐怖行为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罕见的暴行，……姚蜀平……下了十年功夫，写得深刻感人。

关于文革历史的写作，长期以来一直被当局严格禁止，在小说中的萎缩也不意外。不过意外的是，这么多年以后，我们会看到这部在文革大背景下展开故事的《悲情大地》，书中对文革历史的描述在真实和深刻方面超过以往任何一部。

……给我的感受是这本小说全面、系统地通过典型事件和人物，把文革面貌展现出来，从结果上反映出文革。用小说勾画文革的真实面貌：中国人民遭受到什么灾祸，特别是知识分子，非常愿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在文革中的遭遇。

……《悲情大地》比《似水流年》增加了六，七万字。改得更集中，更丰满，更充实。提高了揭露文革的广度和深度。最有彩的是第四十二章，559页—571页。有价值……

彭作宏（中国社科院马列所原党委书记）评论《似水流年》：

小说收到，读完了。写出此书，不容易。

作者似只有一般批斗会、较文明的专案组的体会。估计没有接受过真正的专案组斗争的体验，不容许问“你们有什么根据”，这将受到“打态度”的真正打击，估计作者在专案审查中没有受过皮肉之苦，没写出专案组的野蛮、残酷程度。

滔滔（1994年出生）：

五姨外婆：

我已读完整本小说了，谢谢你，五姨外婆，写了这好的一本小说。让我真真切切的经历了一遍那荒唐的岁月带个一个个人，千万家庭，乃至一个国家的苦难，这不仅使我看清的高高在上当权者翻云覆雨的手段，也让我感受了无数小人物对于自身命运的无奈和挣扎。我震惊在我的故土上竟发生过如此的浩劫，同时也在担忧与我一代的青年人对历史的无知和对当下生活的不加珍惜。

美国自由撰稿人陈晋对《似水流年》的评论：

……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是一本非常了不起的巨著，是“70后，80后和90

后”了解文革的最佳途径。原因如下：

- 1、这本书把文革这笔糊涂账算清楚了，写清楚了；让读者充分理解了“控告谁，告什么，去哪儿告？”的发问；
- 2、让我看到久违的、中国真正知识分子的形象：专业精神、敬业精神、职业操守、人品道德等；
- 3、时间跨度大，历史画卷完整而丰富，人物众多、事件重大，无论是市井小民、知识分子、学术权威、还有政府各层官员的思想感情、经历变迁全都包括进去了；
- 4、小说的形式比历史书、政治书更加形象的说明问题，更加震撼人心；
- 5、让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年轻人通过了解近代史，使周围事物和人不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例如，大杂院也曾经是四合院等等）。

历史会证明这本书的价值和地位。

老工程师杨恩煦的评论：

……《似水流年》里不但有许多熟识亲切的身影，更包容了我 20 多年的经历。看时几度溢泪。

姚蜀平的《似水流年》确是一部很难得小说，她映射着中国五六十年代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一灭绝人寰的人类浩劫的历史景象，提出许多令人深思的问题。是谁挑起人的兽性？由于人的兽性无节度张扬，使无辜的善良人们惨死无数，罄竹难书。为什么这一时代悲剧的账从来算不到该承担的人头上？！为什么暴政下的受害者，会把他们的怨气转向更弱者！可是他们却忘记了他们自己也是另一群人加害者？！为什么一个单薄中国知识女性会从六十年代和牛主住及其后面势力的搏斗，转到七十年代和整个社会的抗争……

三力三思的博客：再读姚蜀平《似水流年》

有人见了《读姚蜀平〈似水流年〉》之后，建议我再写一篇。我不是作家，也不是评论家，只是以一个普通读者的身份谈谈自己点点滴滴的读后感。这些年来，在小说和影视作品中有关文革、反右的悲剧，总觉得深度不够。《似水流年》从一个特定的侧面和视角，展示出整个时代的全方位的历史悲剧，这是有良知的中

国人永远不应该忘记的悲剧。巴金老人提议建造的“文革博物馆”是很难见到了，多看看几部像《似水流年》这样振聋发聩的作品，也许能多少弥补一点缺憾。

尚安妍、梅仲宇、夏晶榕是上世纪 50、60 年代中国知识分子遭遇的典型人物。尚安妍在肉体和精神上深受双重摧残，但她始终把祖国的前途、人民的疾苦放在心头，以自己的微薄之力与命运抗争，帮助弱小人群去实现应有的人生价值。人生苦短，一个在苦难中艰难生存的小医生在短暂的几十年里还能做些什么呢？她能见到小冬生茁壮成长，不断上进，追求真理，这对尚安妍就是莫大的安慰了。

作为一个科学家，姚蜀平的爱国热忱和政治敏感，跃然纸上。她笔下的文革、反右背景，大小情节都真实可信。而其理论高度、思辨能力，也为不少专业作家所不及。可惜一部 85 万字的作品，如今出版的只有 40 万字。盼望有一天能看到那 85 万字的又一部新书！

【编读往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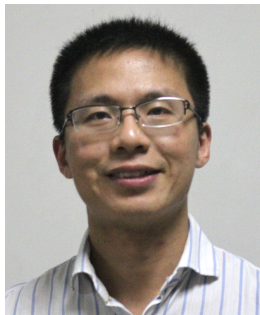
1. 《记忆》编辑部致歉

因为本刊的撰稿人之中，有大小两位邓鹏，大者在美国，小者在广州。本刊 95 期刊载了小邓鹏的文章，但是我们却把大邓鹏的照片和简介错附在小邓鹏的文章之前。对此失误，我们深感抱歉。

特将小邓鹏的照片、简历及来信附后，以补前衍。

《记忆》编辑部 4 月 2 日

2. 小邓鹏的照片及简历



邓鹏，1998 年中山大学毕业，现在广州任职。平日关注国际国内革命史，包括中国文革史，曾写过一些社会、经济随笔，发表在《经略》、《世纪中国》等网刊。

3. 小邓鹏来信

《记忆》编辑部，好：

邓鹏确实有两人，大邓鹏教授是位文革研究专家，我也曾在网上拜读过他的文章。本人小邓鹏还是第一次向贵刊投稿，投稿时没有附上个人的照片、简历，发生错误也不奇怪，只希望没有给《记忆》和大邓鹏教授带来更多的烦扰。我是个年轻人，没有亲历过文革，《记忆》给了我很大的教益和帮助。偶尔写篇小文能被刊用，心里很是高兴，也盼有机会再写稿投寄贵刊。

小邓鹏 4 月 3 日

4. 何志雄谈向前的博论

《记忆》编辑部，你们好：

向前的博士论文我一直高度关注，在地方文革史的研究中，他的著作是第一流的。但是，这是我春节之前的看法。春节的时候，到一位朋友家串门，从他那里看到了谭合成写的《血的神话：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看过之后，我有一种强烈的遗憾——为什么向前先生没把道县的事写进他的论文里呢？

何志雄 4月7日

